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4/95

迁址启事

我杂志社已于 1995 年 3 月由广州市越秀北路 222 号迁至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电话:3815300—246, 3846307, 3846177 邮政编码: 510050, 请各界按新址同我杂志社联系。

目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社长

梁渭雄

主编

张硕城

常务副主编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林有能(兼)

编务主任

黄荣显

· 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 ·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

——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于幼军 张磊(6)

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

——侵粤日军的暴行……曾庆榴 官丽珍(11)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陈登贵(15)

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势力的特点和中共的政策

……卜穗文(19)

“雅尔塔秘密协定”新论……刘 华 杨菲蓉(23)

论抗战报告文学的新启蒙内涵……李 斌(28)

·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研究 ·

“迈向 21 世纪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研讨会”综述

……肖立见(33)

浅议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与对策……朱 江(36)

· 经济 ·

哲学与经济学

——研究经济学的一点体会……张 井(38)

现代企业的发展与管理革命……周小知(42)

论“经理控制”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王新新(45)

国有企业代理阶层激励问题初探……黄群慧 张艳丽(48)

论广东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黄德鸿 黄和平(52)

初级社：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制度渊源……新相木(57)

· 哲学 ·

语言与人类思维的全面性……许斗斗(60)

1995 年第 4 期

录

怀疑：一种治疗术

——希腊怀疑主义对独断论的诊断 崔廷强 (63)

中西文化人我观之比较 戴木才 (6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主体道德价值研讨(续二)..... (71)

关于“个体道德价值”的两个问题(阮纪正) 个体道德
价值观念的选择(陈家义)

· 历史 ·

岭南革命派对确立三民主义的贡献 刘圣宜 (74)

· 语言 · 文学 ·

文化阐释：中国古代语言学之源 申小龙 (79)

海峡两岸开展闽南方言研究之我见 詹伯慧 (84)

“风骨”辨 杨崇生 (87)

论清代诗歌戏曲小说间的联系渗透与互补

..... 沈金浩 (90)

南社诗人古直生平及其爱国思想 罗可群 (96)

· 学者访谈录 ·

萧蓬父先生谈：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

..... 本刊记者 刘斯翰 冯达才 (100)

创建“中华民族学”

——访肖君和研究员 本刊记者 华 生 (105)

· 广东新著 ·

建构 · 阐释 · 召唤

——评刘海涛的新著《规律与技法》 周荷初 (108)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3815300—246

3846307、3846177

邮码：510050

出版

广东人民出版社

排印

佳达电子公司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B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44 号

总第 131 期

The Patriotism of Chinese Nation in the War of Chinese National Liberation against Japan——written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a's victory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	Yu Youjun Zhang Lei (6)
The Japanese Army's Violation to Peace and Humanity in Guangdong, China	Zeng QingLiu and Guan Lizhen (11)
A Primary Discussion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wo Battlefield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7—1945)	Chen Denggui (15)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mediate Forces and the CCP's Policy to Them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u Suiwen (19)
A New Comment upon "The Yalta Agreement (Feb. 11, 1945)"	Liu Hua and Yang Feirong (23)
The Connotation of New Enlightenment in the Reportage about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i Bin (28)
Summarized 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on the Pearl—river—Delta Economic Zone March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Xiao Lijian (33)
The Pattern and Strateg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Zhu Jiang (36)
Philosophy and Economy	Zhang Jing (38)
Development of Modern Enterprises: a Revolution in Management	Zhou Xiaozhi (42)
About "the Way of Control by Manager" and the Autonomous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ng Xinxin (45)
An Approach to the Method of Encouraging the Agent Clas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uang Qunhui and Zhang Yanli (48)
On the Investment of Specialized Person Capital in Guangdong	Huang Dehong and Huang Heping (52)

Primary Cooperative Community: the Origin of Shared Cooperative Economic System in Rural Area	Jin Xiangmu (57)
Language and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Human Thinking	Xu Doudou (60)
Greek Scepticism's Diagnosis of Arbitrariness	Cui Yangqiang (6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Views of Oneself and Others	Dai Mucai (67)
A Continued Discussion by Writing o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Value of Subjective Morality	(71)
The Devotion of the Revolutionists i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to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Put forward by Dr. Sun Yat-sen	Liu Shengyi (74)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logy: a Cultural Explanation	Shen Xiaolong (79)
My Opinions about Doing Research of Min Dialect between Taiwan Straits	Zhan Bohui (84)
Analysis of "Feng Gu" (Literary Character)	Yang Chongsheng (87)
Connection, Osmosis, and Mutual Complement among the Poetry, Traditional Opera and Story Created in the Qing Dynasty	Shen Jinhao (90)
An Account of a Poet of the South Poet Society, Mr. Gu Zhi's Life and His Patriotic Thought	Luo Kequn (96)
Mr. Xiao Shafu Talks about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Advanced Western Culture in China	(Reporters of the Journal) Liu and Feng (100)
Establishment of "a Discipline of Chinese National Cohesion" ——written according to an interview of research fellow Xiao Junhe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 Hua Sheng (105)
A Comment on Mr. Liu Haitao's New Works 'Laws and Skills of Literary Creation'	Zhou Hechu (108)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

——纪念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 50 周年

□ 于幼军 张 磊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迄今已经半个世纪。在此期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复杂而巨大的变化。但是,“前事不忘,后世之师”,重温历史总是颇有教益的。回顾那场空前的浩劫,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必将更为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推动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同时,强化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念与实践。

爆发于 30—40 年代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最持久的反侵略正义战争,也是鸦片战争以来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抗日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人民以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相互联系的双重贡献——一方面,保卫自己的家园祖国,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另一方面,完成了应尽的国际义务,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这场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正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并肩奋战,击溃了猖獗一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从而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础,开拓了民族解放的道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正如江泽民同志的《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浩劫,也教育了世界人民。世界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和平与进步”。

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完全论证了上述的科学判断。中国人民赢得了战争的

胜利,也赢得了社会的进步。在把日本军国主义逐出神圣的国土后,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了条件和基础。

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3500 万军民的伤亡,1000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和 5000 亿美元的间接经济损失。所以如此,固然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同时,国民党政政府腐败统治造成的贫弱和“一盘散沙”的社会状况也为侵略者提供了可能性。因之,只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高扬,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发挥出难以估量的精神动能。人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义无反顾,投入抗战的洪流。但是,这种爱国主义的主流并非历史传统的单纯承继,而是赋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丰富社会内涵。作为激情与理性的结合,它不仅蕴含着炽烈而朴素的对祖国的热爱,并且升华为理性——关切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力求拯救和发展危难和贫弱的祖国,致使爱国主义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才无愧为团聚、引导我国各族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辉旗帜。

—

抗日战争及其胜利的结局,对世界和中

国的历史进程都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毫无疑问,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恶性发展的一种世界现象,它所威胁的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对肆虐于东方的日本法西斯的抗争,必然支持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目标决不限于中国乃至亚洲。在它的贪婪扩张主义方案中,“北进”和“南进”构成军事战略的重要部分。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本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使它袭击苏联的阴谋迟迟未能付诸实现。事实上,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东北地区的局部抗战取得了重要战果,“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战斗,造成日军损失17万人和战费消耗14亿日元。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方不得不把驻扎东北地区的部分关东军调往中国的其它战场。这就使得苏联得以避免两面作战,德、日法西斯夹击苏联的谋略化为泡影。苏联更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刻从东线抽调50万军队,增援了莫斯科保卫战。同时,抗日战争也延缓了日军的“南进”计划,支持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战斗。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共有军力240万左右,其中海军30万人分别投入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而陆军210万人(除去留守本土40万人)中,则有130万人陷于中国战场。大致说来,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独立抗击了日本陆军的90%,1942年底以后的岁月,仍有60—80%的日本陆军留在中国战场。

不仅如此,中国的抗日还支持了周邻国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942年初,包括中、苏、美、英在内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宣言。应英国政府的请求,中国组成远征军开赴缅甸打击入侵的日军。中国军队在持续三年的作战中共投入兵力16万人,解救了被日围困的英军第一师,收复了缅甸北部城镇50余座,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盟军完成反攻缅北的任务。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中国的抗日战争多方位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然,支持总是双向的。正是中国同苏联、美国等盟国密切的配合,彻底击溃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同伙。

二

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近代时期的发端,具有特殊的深远意义。新阶段舞台的帷幕的开启,竟是由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的拉动。强烈的外烁作用迫使近代中国逸出了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轨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种为殖民主义枷锁所桎梏的畸变的社会形态。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往往居于最为突出的地位。严酷的事实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帝国主义采取了各种手段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把它推向贫困落后的深渊。殖民主义者十分迷信军事手段,非常醉心于坚船利炮。而朽败反动的统治者——无论是清朝政府,抑或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媚外卖国和专制独裁,则使得旧中国总是处于“挨打”的地位,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迄八国联军之役,每次都是以丧权辱国为结局。甚至中国在战争过程取得一定程度的、局部的胜利,也不能改变割地赔款的厄运。要之,广大军民虽然进行了英勇斗争,甘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却只能抱终天之憾。

然而,抗日战争第一次赢得了彻底的胜利。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14年的斗争历程可以划分为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两个阶段。大体而言,抗战不断深化与拓展——从分散抗争到团结战斗;由防御、相持到战略反攻。在这期间,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日作战大小约165000次,歼灭日军150万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人数的70%。

中国人民不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赢得了社会的进步。进步的基本内涵和主要标志,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和国民党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的衰朽力量的相互消长：前者不断发展壮大，后者愈益遭到人民的唾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在本质上为后来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必要的准备，使得中国的命运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后的短暂时间中得到了根本解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历经“艰难顿挫”的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至此划下了一个光辉的句号。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开拓了道路。

事实证明，持久的、艰苦的抗击侵略者的过程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逐步发展的过程。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制订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贯彻了科学的战略和策略。从而，最大限度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并把他们汇成抗日斗争的洪流。共产党人无愧为敢于和善于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忠贞战士，因之成为人们的希望和信心。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决非——如同某些出于政治偏见的“学者”所诽谤——“坐大”，而是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成长。这种长足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必然：在备受欺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任何阶级和政党敢于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并且善于把民族解放战争引向胜利，它就一定成为领导人民群众的核心力量。

在那艰苦悠长的战争岁月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人心所向的“圣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民兵承担了对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的作战任务，对敌作战125000余次，消灭日伪军171万余人。“平型关大捷”、“黄土岭战役”、“百团大战”，……都取得了克敌制胜的辉煌战果。正是与这个过程同步并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抗战初期，抗日根据地主要仅有人口不过150万左右的陕甘宁边区，军队则只有30000余人。抗战胜利前夕，抗日根据地已经遍布于祖国大地的东

南西北，区内人口约达一亿，军队和民兵分别为100万人和200万人。正是这种为先进思想所武装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才是真正决定中国命运的因素。

至于国民党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蒋介石统治集团无视日蹙国百里的严峻现实，却仍然热衷于“围剿”红军。只是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加以“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才使得蒋介石们放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不参与了抗战大业，并在初期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其作用是应当给予肯定和估计的。但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片面抗战，实行独裁专制，制造摩擦分裂，乃至酿成反共反人民的“皖南事变”，屠杀抗日有功的新四军，囚禁著名的抗日将领——新四军军长叶挺。蒋介石统治集团虽然极力在抗战中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但人心的背离成为后来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

判明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就不难理解蒋介石统治集团竟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欢庆胜利的锣鼓鞭炮的声音刚刚停歇，便向共产党和人民挥起屠刀。但是，1946年已非1927年，抗日战争中发生的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消长极其有利于人民，国民党政府的800万军队绝对阻挡不了历史的潮流。

没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力量的壮大，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会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力量的壮大。

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又赢得了社会的进步。

三

抗日战争的胜利，归根结蒂是全民爱国主义高扬的结果。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是各族人民的共同的主要精神支柱，是动员广大群众奋起御侮的鲜明旗帜，是激励人们前仆后继奔赴战场的巨大感召。

然而，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的是：为什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民曾在近代

时期多次抗击过侵略者,表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但是,结局大都是悲剧性的——既未赢得战争的胜利,也未赢得社会的进步(当然,屈辱的战争后果促进人们去探索救亡与变革的道路)。只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一洗国耻,爱国主义结出了硕果,不仅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而且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应当对爱国主义进行具体剖析。

爱国主义,大抵是激情与理性的结合。人们总是为自己祖国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多娇的江山和优秀的人民而自豪,并积淀了炽烈的朴素的挚爱。然而,深刻的、丰厚的爱国主义不能局囿于此,它还必须包涵理性的内容——面对备受欺凌的、落后与贫困的祖国,定需寻求救亡和富强之路;对祖国的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体现为把爱国主义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爱国主义由此蕴含了拯救和发展祖国的社会内涵,浸渍了时代精神。

从鸦片战争以迄八国联军之役,中国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在这个历史时期,国家的权力为清朝政府所控制。这个朽败政权主要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随着帝国主义欺凌的深化而逐步与之结成联盟,充当“列强”的“鹰犬”,甘为奴隶总管的角色。他们是卖国主义者,对侵略者表现出一副奴颜媚骨。然而,封建地主阶级与侵略者之间并非没有矛盾。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及其代表确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主张抗击侵略者,甚至积极投入了正义的战斗。但是,除掉少数的优秀人物外,他们的爱国主义并不蕴含着先进的社会思潮,难以较为完满地回答来自外部世界的双重挑战。因之,战争的屈辱结局无法避免。赢得胜利与进步,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卷入抗击侵略者战争的还有广泛的阶级和阶层,主要是农民阶级和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至于无产阶级虽已诞生,却未成为自为阶级。农民阶级无疑是反侵略的主力,从三元里抗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他们保家卫国的情感和英勇,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但是,落后的

生产方式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使得他们不可能把爱国主义与先进的社会思潮与运动相结合,提出科学的民族解放纲领。以致在反侵略的观念和实践中,难以避免种族主义和“笼统排外主义”的倾向。资产阶级的政派之一——维新派也把这个课题作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他们正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把维新运动推向高峰,把爱国主义与维新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确认爱国必需变革——“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只要实行自上而下的温和的变革,“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的祖国即可“由富而强”。然而,由于他们缺乏赖以慰藉的物质力量,又对帝国主义存在着轻信和幻想,所以他们的奋斗未能取得真正的重大成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爱国主义跨出了新的步伐,与当代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潮和革命运动相融汇、相激扬。他们继承了广泛存在于民间和下层社会的朴素“民族思想”,而淘汰了“笼统排外主义”和“宗法”色彩。他们因袭了把民族独立与国家近代化联系起来的维新派观点,而又摒除了其中的妥协主义。他们竭力避免中国惨遭“瓜分”或者“共管”的厄运,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而奔走呼号。严峻的事实是必须从爱国走向革命——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粉碎反动腐败已极的清朝政府和后来的军阀统治,才能拯救中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从未真正建立起全国范围的政权,对帝国主义又曾缺乏深切的认识,以致在整个旧民主主义时期始终未能提出鲜明的反帝口号和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之,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不克得到充分反映和取得重大的成果。资产阶级曾把爱国主义提到历史的新高度,赋予它以时代精神和社会内涵,丰富了爱国主义传统,起了震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只是历史的局限使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彻底胜利,自然也不能真正完成反侵略的首要任务。

近代中国总是处于“挨打”的境地,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伟大胜利根本改变了这种屈辱的历史。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

爱国主义与当代中国最先进的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即附丽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几经曲折与反复,终于完成了近代民主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通向胜利的途径——新民主主义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确解决了当前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诸问题,被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之,也就科学地解决了它所内涵的民族解放的课题。这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历史趋势的社会思潮和运动,把爱国主义深化和拓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人民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高扬的爱国主义,结出了空前的硕果。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这种领导,首先体现为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制订和贯彻。正是共产党最先举起了抗日的爱国主义旗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制订了相应的战略、策略,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共产党确立了抗日战争的军事理论,提出了“持久战”的方针,阐明了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相继阶段的战略,消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干扰,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

人民战争的理论,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思想武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特别是十年内战的经验,把已经形成的人民战争思想运用于民族解放战争,制订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战略和方针,充分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形成势不可挡的抗日洪流。为了贯彻人民战争思想,必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以

之与正面战场的作战相配合,形成人民战争的燎原大火。“兵民是胜利之本”,绝不能仅仅依靠国民党军队实行的片面抗战。

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社会基础。共产党人深知为了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乃至抗日的同盟者,使得全国各族人民聚集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共产党人作了不懈的努力,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个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以及广大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为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民党的爱国官兵不顾军政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谋略和命令,在正面战场上抗击了日寇。

正是这种与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结合的爱国主义,谱写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曲。人民不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赢得了社会的进步。

抗日战争的光辉结局无可置辩地证明,爱国主义只有与当代先进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才能使人们对祖国命运与前途的关怀有所附丽,才得以使祖国获致拯救和发展。从而,也使爱国主义自身发展到极致。

今天,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只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祖国才能成为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也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在写作时曾参考和引用了徐信同志的《浴血的历史 伟大的贡献》一文中的新资料,谨此致谢)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郭林

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侵粤日军的暴行

□曾庆榴 官丽珍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由于广东濒临南海,与东南亚各国隔海相连,日军出于封锁中国南大门和进占东南亚各国的需要,在侵华战争中加紧了对广东的侵略,并一直把广东作为重点控制的地区之一。抗战八年中,日军在广东滥施暴行,残害和掠夺了无数的生命财产,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

一

日军对广东的侵略,是从狂轰滥炸开始的。1937年8月31日,日机6架首袭广州,从此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时止,广州便处于日机连续不断的轰炸之下。从1937年9月22日至27日,广州市德宣、西山、惠福、西禅、东堤、前鉴、黄沙、石牌各区共落弹59枚,其中中山纪念堂落弹5枚,黄沙车站落弹3枚,中山大学落弹16枚。①1938年春季,日机的袭击更猛,并专注于摧毁交通线,轰炸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和沿线各站,郊外许多工厂也遭到袭击。4月10日,日机轰炸西关,位于宝华正中约的大利车衣厂被燃烧弹击中,焚毁楼房三座,次日挖出尸体98具,重伤120多人。②17日又轰炸大北路和小北路一带,省立女中、市立28小学等多间中小学被炸,死伤200多人。日机还用机枪扫射,许多人被流弹射死。5月间进袭广州的日机,一天多达71架(5月28日)。在这个月的一次夜袭中,黄华塘全村被炸平,炸死100多人,黄华塘成为血水塘。后来市民在日机投弹处立下“血泪洒黄华”一碑,以志不忘。6、7月间,日机连续10多天狂炸广州,每天数十架飞机对市区实行地毯式的轰炸,中山大学、岭南大学、

中央公园、新亚酒店、西村电厂、韬美医院等接连被炸,如意坊市场全部被焚毁。③从1937年8月31日至1938年7月17日,日机在广州市20个区内共投弹107次,650枚,毙命1139人,受伤2780人,炸毁民房1551间。④8月8日,日机再次轰炸广州,目标专向住宅区和商业区,广大路、广卫路、西湖路、惠爱西等市区中心地点共落轻重型炸弹36枚,死伤500多人。被炸的还有位于一德路石室的法国天主教堂,当天在这里避难的妇女儿童许多被炸死炸伤。第二天,又有日机48架来炸市区,死伤160多人。10月中旬,为配合在大亚湾登陆日军的进攻,日机又对广州等地实行大规模的疯狂轰炸,出动的飞机每日达100多架,居民伤亡惨重。

日军不但狂炸广州,而且对全省各地实行遍地轰炸。从1937年9月至1939年6月,进袭汕头市的日机803架,投弹804枚,炸死261人,炸伤580人,毁屋484座。⑤1938年7月1日汕头市公立图书馆被炸,东座全部倒塌,损失许多珍贵图书、杂志;市立第四小学中弹3枚,全校成为瓦砾一堆。⑥从1938年至1943年,日机60多次轰炸肇庆(端州),投弹1300多枚,炸死近300人,炸伤600人,房屋店铺被毁560多间;同一期间日机轰炸高要200多次,投弹3000多枚,炸死1150人,炸伤1822人,房屋店铺被毁5000多间。⑦地处东江上游的河源,也受过日机20多次轰炸,炸死50人,炸伤34人,毁屋135座。日机还炸毁龙川大桥,使粤东交通受到严重的破坏。⑧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日机空袭粤

北有记录可查的共 20 次,出动飞机 253 架。1938 年农历 6 月 26 日一枚重型炸弹击中韶关关帝楼,炸死 107 人,重伤数十人。^⑨在惠州,空袭也很频繁,甚至连挂有意大利国旗的天主教若瑟医院也被炸毁,在此避难的群众伤亡 200 多人。全省 97 个县,几乎都受过日机的轰炸,连阳山、连县这样边远的山区都被日机轰炸过;地处西北角的连山,也于 1944 年 10 月 23 日遭受过日机的袭击。

据 1941 年《广东年鉴》的统计,从 1937 年 8 月 31 日至 1941 年底,日机袭粤损失情况是:

年份	进袭机数	投弹数	死亡数	受伤数	毁屋数
1937 年	1425	2362	327	578	851
1938 年	7862	1446	2272	4530	3654
1939 年	7338	8065	2089	3089	6939
1940 年	1461	4953	1328	2082	5681
1941 年	1195	4016	1137	1559	2906
合计	19281 架	33857 枚	7153 名	11838 名	18021 栋

广东尤其广州市是全国受日机轰炸最严重、受害最大的地方之一。必须指出,日军的狂轰滥炸绝非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纯粹是对无辜平民的残杀,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永远掩盖和洗刷不了的一笔罪行。

二

在对广州等地作了 14 个月连续不断的轰炸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组织日本南支派遣军,于 1938 年 10 月 12 日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在此之前侵占了广东沿海的三灶、南鹏、南澳等岛屿),开始了对广东陆地的侵略,并于 21 日占领广州,随后向广州周边各县扩张。1939 年 2 月,日军发动了对海南岛的侵略,先后占领了海口、崖县、儋县、文昌等地;6 月,日军从粤东海上进攻潮汕,占领了汕头、潮安、澄海,然后向潮汕各县进犯;11 月 15 日,日军又在钦州湾登陆,占领了防城和钦县,此后,日军还多次在沿海各处登陆。日军控制了广东中部和东西两翼之后,以扩占战略据点、打通交通要道和夺取经济资源为目的,在几年间向全省各地发动了无数次军事进攻或“扫荡”。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

1945 年 1 月,日军一部由湖南南下,占领了乐昌、坪石;另一部由清远、英德北犯,占领了韶关,粤汉铁路南段终为日军打通。侵略广东的日军,总数不下 20 万人(1945 年日本投降时在粤日军仍有 13.73 万人),除少数地方(如兴、梅几个县)之外,全省大部分市县都被日军占领或侵扰过。日军铁蹄所到之处,任意烧、杀、强奸,无恶不作,暴戾恣睢,犯下了罄竹难书、灭绝人性的罪行。

日军在广东屠杀了无数平民。每到一地,他们都要狂屠虐杀。在三灶岛、南澳岛、东江惠(州)博(罗)地区、粤中西江各县、海南岛、潮汕各县、雷州半岛和粤北地区等地,都发生过一次惨杀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事件。1938 年初,日军占领三灶岛,在岛上修建飞机场,为保守秘密,共杀害劳工和居民 2000 多人。^⑩同年 6 月日军入侵南澳岛时,在前江一次就杀害了 334 人。^⑪日军从 1938 年 10 月至 1945 年 1 月曾 4 次入侵惠州市,每次都大肆烧杀,先后被残杀的有三、四千人。惠属各县也被血洗,1938 年 11 月在博罗下垳村,日军一次就打、杀、烧死村民 108 人。在广州及周围各县,日军暴行累累,仅 1939 年农历正月初一就在黄埔残杀平民 280 多人。1940 年 7 月,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在广州市内秘密枪杀所雇佣的军事工程建筑人员 900 多人。日军还将在市区、郊区及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地抓来的人拉到黄埔牛山集体屠杀,抛尸炮坑,埋身此处的约有 1.7 万人之多。^⑫在海南岛,日军在三亚登陆后几天,就在榕根坡杀害 200 多人,榕根坡被称为“杀人坡”。岛上许多地方,如崖县乐罗村、海口儒显村、琼山长泰村等,都发生过大批无辜平民被戮杀的惨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海南实行疯狂的“扫荡”、“蚕食”,海南平民被杀害的达 10 多万人,被焚毁屋宇 5 万多间。1939 年 6 月 21 日日军占领汕头,窜至金沙乡,见人就杀,当天至少有 300 名乡民被杀死;同一天日军在潮州庵埠残杀几百人。随后,日军肆虐于潮州、澄海、揭阳、潮阳各县,烧杀不已。1939 年澄海各乡被杀

有姓名可查者 700 多人；从 1940 年至 1942 年，潮州古巷、登塘两乡被杀 1098 人；1944 年 10 月至 1945 年 1 月，日军三次进犯揭阳，杀人 1500 人以上；在潮阳海门，仅被日军当靶子刺杀而死的平民就有 140 多人，被打死、烧死、活埋的不计其数。1942 年冬日军在遂溪岭头村修建飞机场，也屠杀了大批劳工。

日军对平民的屠杀，除了用机枪扫射、大刀斩首之外，还有淹死、烧死、毒死、活埋、生剖等等，手段残暴至极。1938 年冬，日军侵扰高要，禄村有二、三十名老年妇女被日军赶至一间大宅，放火烧死。1941 年农历 6 月 11 日，日军在东莞道滘用毒气熏死 61 人。1944 年农历 6 月 4 日，日军在中山石门活埋村民 41 人。1939 年冬，日军入侵英德，生剖了洋高乡长谭有举和乡民谭子运、谭宜省。^⑬令人发指的是，日军以杀人取乐，经常用刺刀挑死婴儿，用开水烫死活人，灌水踩杠致人于死；对被剖的人，还要饮其血，分食其肝脏，等等。日军的报复性屠杀，手段尤为凶残。1944 年 7 月 1 日，几名日伪宣传员在台山三社被歼，日军为实施报复，杀了三社 700 多人。^⑭1945 年 7 月日军进犯开平，司行煦等七勇士坚守南楼，日军攻破南楼后，竟然对七勇士实行肢解！

日军的另一暴行是强奸，在其占领、侵扰之地狂虐摧残妇女，使无数妇女深受其害。1938 年初日军侵占三灶岛时，岛上 35 岁以下的妇女被日兵强奸者，达十分之七以上。^⑮在江门、四邑地区，日兵常常三五成群，四处搜索妇女，被其蹂躏者数以百计。一名日兵还乘醉闯进一家商店，索笔大书：“山川土地皇军所有，子女玉帛予取予携”。日军占领香港时，强奸事件也不绝于闻，有一次日兵还进入一家医院，强奸了那里的医生和护士。各地被日兵强奸的，有老嫗、幼女、病妇、孕妇、产妇等等；有的遭到十几个人的轮奸；有的被轮奸致死；强奸之后，往往还要施以枪杀，或投之烈火、江河之中。日军还把从各地抓来的妇女送往“慰安所”，强迫她们当“慰安妇”。日军强奸事件举不胜举，仅潮安一县，被强奸的就有 3000 多

人，轮奸致死的有 100 多人。

侵粤期间，日军还在广州组建细菌部队——波字 8604 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进行细菌战。1942 年间，这支部队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秘密用细菌杀害了大批难民（其中大部分是香港沦陷后由水路返穗的香港居民）。^⑯日军还在沦陷区遍设烟、赌馆，用日机空运、兵航海运、日军押运等手段从热河、大连、广州湾（湛江）各地运来大批鸦片烟土，由所谓“禁烟局”公开招商制售（在广州由“福民堂”承办），并发给烟民“吸食证”，毒害广大平民。^⑰

三

日军侵粤，不仅在狂炸、狂杀之中夺去了无数平民的生命，而且对广东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日军在粤时，曾派出许多“调查班”，调查广东矿产及经济资源状况。昭和 14 年（1939 年）5 月，日本南支派遣军派出以白鸟胜义为班长的，由理学士大井上义道、住友实等为成员的调查班，到东莞县竹溪水口长山作重石矿资源调查；同年 6 月，又派出以中野英光为班长，由理学士吉野植三、工学士吉原重威为成员的调查班，到番禺县黄埔长洲岛作金矿及其他矿产物储藏情况的调查，分别写出《东莞县竹溪水口长山重石矿调查报告书》和《广东省番禺县黄埔长洲岛矿产调查报告书》。^⑱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经济资源的野心。日军入侵广东陆地之前，于 1938 年 5 月占据了阳江南鹏岛，抓来大批劳工，并运来机器，大量开采岛上的钨矿。采掘数年，将南鹏岛钨砂挖得一千二净。1939 年日军登上海南岛后，更是大规模开采石碌及田独铁矿。1944 年 3 月八所港部分建成，即开始装船运送，将一船又一船的战略物资铁矿石抢运到日本。同时，日本还派出许多商社，“开发”海南岛的矿业、橡胶、渔业、畜产业，等等。1940 年进入海南的商社，在矿业方面有 5 个，农林业 33 个，畜产业 3 个，渔业 4 个，其他方面 30 个。^⑲谁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开发”，实质就是掠夺。

在日军长期疯狂的摧残之下，广东经济

损失惨重。许多重要的产业被破坏或摧毁,有几十年历史和相当生产规模的西村土敏土(水泥)厂,1938年被日机轰炸9次,受弹70多枚,损失不计其数。^⑩1936年投产的广东省营市头糖厂,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大型甘蔗糖厂,1938年被日机轰炸三次,受弹17枚,^⑪日军入侵后,又拆毁运走了糖厂的机器设备,全厂被废;其他几间糖厂也被炸,新造糖厂受弹16枚,顺德糖厂受弹26枚,揭阳糖厂受弹9枚。^⑫在佛山,纺织业抗战前有600多家,有铁木织布机10000多台,沦陷后仅余织布机20多台;有悠久历史的石湾陶业,原来有100多座龙窑,沦陷后减少至17座,从业人员从60000人减少到1000人;铸造业从30多家减为四至五家。^⑬至1943年,粤中的“丝业不及战前十分之一、二”,“广东四大镇之一陈村已成死市”。^⑭潮汕铁路为我国第一条商办铁路,由华侨集资修建,1906年竣工,通车30多年。从1937年9月至1939年潮汕沦陷,这条铁路被日机轰炸50多次,“公司董事局、车站、宿舍、机厂、车厂及其他建筑物先后悉遭炸毁”。^⑮日军后来又拆走全线铁轨,将路基改为军用公路,潮汕铁路的历史至此结束。广东另一条商办铁路——新宁(台山至新会)铁路,也受过日军的轰炸、破坏。向来比较富庶、发达的广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统治之下,成为一座恐怖、悲惨的人间地狱,百业凋敝,饥馑千里,人民颠沛流离。

日军祸粤的暴行是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对人类文明的摧残。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抗战,于1945年8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粤日军的祸首终于受到正义的惩罚,落得可耻的下场。

①广州市政府关于本市民房被敌机轰炸损失的调查,1937年9月22—27日。

②广州市社会局关于战时物资损失的调查,1938年4月11日。

③《广州百年大事记》1964年9月。

④广州市护卫队关于敌机空袭本市各区损失情形的报告,1938年。

⑤汕头市警察局关于汕头市遭敌机空袭损失情形的报告,1946年2月27日。

⑥汕头市政府致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会函,1938年8月15日。

⑦中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

⑧中共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

⑨《韶关文史资料》第10辑。

⑩中共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日寇血洗三灶暴行纪实》,1995年。

⑪郭少音《南澳血战记》,1938年。

⑫中共广州黄埔区委党史研究室《血雨腥风活见证》,1995。

⑬《抗战时期的英德》,见《韶关文史资料》第11辑。

⑭《抗战八年的台山》,1946年印。

⑮《国华报》,1938年3月11日。

⑯沙东迅《日军波字8604部队在穗进行细菌战揭秘》,见《广州文史》第48辑。

⑰广州市税捐征收处关于敌伪毒化罪行的调查,1946年11月7日。

⑱(日)南支派遣军调查班报告书,昭和14年5月12日,6月14日。

⑲王伯符译编:《日本侵略军在琼岛的垂死挣扎》,见《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1986年10月印。

⑳西村土敏土厂被炸损失调查,1938年。

㉑广东省营市头糖厂厂长王肇光关于本厂被敌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报告,1938年3月18日。

㉒新造、顺德、揭阳糖厂被炸损失调查,1938年。

㉓中共佛山市委党史办公室《佛山革命斗争志》,1990年印。

㉔中共广东临委关于中路敌后具体环境的简报,1943年3月。

㉕商办潮汕铁路公司董事长张福英关于本路抗战损失情况报告,1946年5月23日。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郭林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 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

□陈登贵

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存在着两个战场：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这两个战场在战略上是相互配合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战场都为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抗日战争时期两个战场的出现及相互配合，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进

行的。没有国共合作就不可能有两个战场的相互支持和配合；而没有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要战胜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亦是不可思议的。

自从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共两党就处于敌对状态。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渐渐降为次要矛盾，这使国共两党逐步变化各自的政策，走上再次合作共同御侮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开始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对抗日民主运动进行镇压，对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国民党政府还于1933年5月31日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这为日本侵略者控制华北开了方便之门。

与此同时，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正义要求，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4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作战。1933年1月17日又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队，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①

至1935年下半年，华北局势更为紧张，日本积极策动亲日派汉奸在华北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制造了一系列侵略华北的事件，并加紧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使华北的民族工业遭日本排斥或吞并，大批工人破产、失业。这使中日矛盾更加激化，中国的工农大众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深感唯有反抗日本侵略，再没有别的出路。

1935年12月20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

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肯定了共产国际七大确立的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的重大改变。虽然当时仍采取抗日反蒋的方针，但已不再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把反蒋斗争主要放在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的政策上。后又从“抗日反蒋”逐步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转变。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的号召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创造了条件。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扩张，也严重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因此，美国国务卿赫尔于1935年12月6日发表文告，声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这对国民党改变对日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时，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国民党部分将领也主张抗日，除“九一八”事变后一些爱国将领在部分地区抗战外，1935年五六月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了一场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等也主张抗日。尤其是在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推动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转变其政策。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已反映了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是在从不抵抗政策向准备抗日转变。

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为其接触和谈判提供了可能性。从1935年冬起，两党便开始秘密、频繁接触。“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国民党亲英美派也作了许多努力，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第29军奋起抗战，中华民族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的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

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代表又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17日，国共两党再次谈判。8月13日，日本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这加速了国共两党的谈判进程。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接受了共产党关于第二次合作的主张。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②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同意国共合作抗战。这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奋战，形成了全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新局面。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因此抗战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由国共两党原有的武装队伍作为主体。国民党的军队过去多是驻在城镇和交通要道处，而日本侵略中国开始是主攻城市和交通干道，这就使国民党军队担负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在大革命失败后主要分布在山区和乡村，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军队和其他武装担负的也多是敌后战场的斗争。两个战场在战略上既相互配合、又独立作战，均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二

“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③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还是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都能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曾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④

抗日的正面战场，大部分的仗是国民党

军队打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有1937年8月至11月的淞沪抗战,我国官兵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英雄气概,挫败了日军妄图从中央突破、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粉碎了日军三个月要灭亡中国的梦想。这是我国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的转折点。另外,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昆仑关会战、滇缅之战、湘西会战等,也都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8年3月至4月,为保卫徐州,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山东南部台儿庄进行激战。战前,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白崇禧曾与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商讨作战方针,周恩来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中肯的作战意见,深得白的赞同而基本采纳。由于我军作战方针正确,官兵奋勇异常,使台儿庄战役获得胜利,歼敌1万余人。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也是两党相互协助、集中聪明智慧的胜利。又如1937年10月1日至11月3日的忻口会战,在国民党将领阎锡山、卫立煌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共同指挥下,歼敌2万多人,创华北战场大举歼敌的记录。忻口会战的胜利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战成功的范例。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大规模的会战,打击并牵制了大量敌军,对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起了支持和掩护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⑤共产党军队和其他人民军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又有效地打击、钳制和吸引敌军,这对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也是最大的支持和配合。如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一仗,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振奋了我国军民的士气。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为打破日军进犯威逼重庆的企图,在华北敌后发动了105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300余次,毙伤日军

2万余人,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显示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的伟大力量,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百团大战实为我抗战以来空前未有之大创举,敌后方游击战争空前未有之创举!”“百团大战的意义,不仅取得军事上之伟大胜利,亦更取得政治上之伟大胜利。它是抗战中最光荣的一页。”^⑥

自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仍坚持作战,但战略作用相对下降。而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的战略作用日益上升。在这个阶段里,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逐步增加了敌后的兵力,把重点放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日军对敌后战场采取了“扫荡”、“蚕食”、“清乡”等政策,给抗日根据地带来了重重困难。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艰苦抗战,不断粉碎日军的进攻,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当时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华南抗日根据地等,都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斗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国民党军队也开展过敌后游击战争。在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对日军在实行正面防御为主的同时,为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便先后在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省的敌后,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至1938年底,国民党政府在敌后的正规军已达10万人左右。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改变了对日政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制定了新的作战方针,提出了“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与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⑦为此,国民党派出军队在敌后建立了冀察、苏鲁游击区,有效地打击了日军。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

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尔后4个多月，美英法等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许多殖民地大多沦入日军手中，使美英与日本的矛盾激化。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美国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在援助国民党的同时，也日益注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地位和作用，从过去只承认国民党不承认共产党的政策，逐步转变为联合国共两党。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国民党不得不正确对待共产党。这客观上对缓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磨擦，坚持一致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两面夹击之下，日本侵略者首尾难以相顾，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在太平洋战场上，英美联军攻占冲绳岛，击溃日本的海空军，并向日本本土逼近。此时，在中国战场，解放区日益扩大，中国军队开展局部反攻。侵华日军被压到中心城市和交通沿线，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百万苏军向东北挺进，迅速击溃日本陆军主力关东军，解放了东北，这对加速日本投降起了重要作用。在苏联、美国等盟军的密切配合下，中国军队举行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美舰米苏里号上举行

投降签字仪式。9月9日，中国战区在南京签署了日军投降书。至此，中国人民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的胜利，是全国军民团结御敌的胜利。它粉碎了日本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阴谋，说明了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无比的凝聚力，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动力。

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631页。

②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第590—591页。

③《廖承志致蒋经国信》（1982年7月24日），载《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62页。

④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38页。

⑤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1939年1月2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32页。

⑥见《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期。

⑦引自杨世兰等主编《国共合作史稿》第35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

**作者单位：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
责任编辑：郭 林**

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势力 的特点和中共的政策

□卜德文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抗日阵营存在着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三种政治力量。什么是中间势力呢?“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①“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②

在抗日战争中,中间势力在政治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动摇性。毛泽东指出:“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在抗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抗日的参加者”。③中间势力的所谓动摇性,是指在重大问题上所取的态度是更接近顽固势力,还是更接近进步势力。

中间势力产生动摇性的根本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顽固势力比较起来,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很软弱,缺乏独立性,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另一方面,中间势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处于各种矛盾中,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常影响着它摇摆不定。而各种矛盾主要指下面三种。

第一种矛盾,中间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不可调和

的敌我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直接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受到毁灭性的损害,地方实力派的地盘沦为日寇的占领区。因此,中间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有着抗日救国的愿望。

第二种矛盾是中间势力与顽固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从阶级实质上看,属于剥削阶级内部的矛盾,但它是尖锐的,某些时候还是势不两立的。中间势力长期处于被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统治集团排挤的地位。因此,中间势力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不仅可以与中共一起共同抗日,并且有部分人还可能站到进步势力一边,反对顽固势力;有部分人在顽固势力进攻进步势力时保持中立。但有些中间势力想利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矛盾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

第三种矛盾是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从实质上来看,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中间势力不可能在一切问题上和进步势力保持一致的立场,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偏向顽固势力。1938年12月,中间势力的右翼人士张君勱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容许有“任何特殊的政治路线”,必须将军队交出来;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必须宣布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不合“时宜”,必须搁在一边。有些民族资产阶级的

头面人物在国、共两党之间标榜中间立场，既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政策，又不赞成共产党独立自主发展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而主张“国权统一”，在国民党政府统一领导下抗日；既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排挤异己的政策，又不赞同共产党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武装自卫，而主张“反对一切暴力斗争”，消除阶级斗争；既反对国民党“一党垄断”，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而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中间势力各派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使中间势力成为一个极不稳定的政治力量。历史证明，中间势力本身的软弱性是较稳定的，变化极少。而三个矛盾的发展变化，却影响着中间势力的动向。在三个矛盾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稳定性较大，因这个矛盾的尖锐性超过后二个矛盾。所以，中间势力的动摇，主要表现在后二个矛盾上。著名学者何干之指出：“他们之所以成为中间势力，是因为他们对国共两党所采取的立场是动摇的。正因为动摇，他们在抗日过程中，随着抗战形势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也有所变化，有所偏向，或偏于左翼或偏于右翼”。④

中间势力站在哪一边，主要决定于顽固势力和进步势力与他们的矛盾发展状况。他们考虑问题往往从三点出发：第一，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哪一种力量大；第二，哪种势力与他们矛盾大些；第三，两种势力对他们的政策如何。

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是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⑤在抗日战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间势力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能否争取他们站在进步势力一边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

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⑥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一份通知中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对日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的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⑦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上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一文中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三个有利条件：“（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⑧实践证明，中共正是具备了这三个有利条件，所以在争取中间势力，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共当时的主要方针政策主要有下列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坚持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周恩来指出：“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很广泛的统一战线，参加统一战线的成份复杂，每个阶级及其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大家都要求抗日，这是一致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如何抗日、抗日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如何，以及抗日胜利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则是不一致的。于是，发生了谁影响谁的问题，即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主要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为了借助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打倒外国侵略者，同时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它一方面要利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因此，国民党力图控制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不超出它所需要和允许的范围，服从它的阶级利益。而中间势力是软弱的，在政治上是动摇的，其右翼分子还想与中共争夺领导权。故不能由它把持领导权。中共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所以，争取和坚持中共的领导权，

才能发动占全国人数 90% 以上的工农群众参加抗战,克服中间势力的动摇性,不让他们的动摇性影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是共产党领导、争取中间势力的基本条件。

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以保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为基础和前提的。毛泽东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⑩共产党没有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阶级的权益,而是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保持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在抗日战争初期,中间势力阶层中的一些人对蒋介石作了过高的估计,不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希望中共对国民党作出更大的让步。在共产党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者也主张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中共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更不被中间势力的动摇态度所左右,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工农红军和南方游击队虽然名称上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但在本质上与国民党的军队是根本不同的,它是中共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陕甘宁边区只是形式上属于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在边区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政权。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后,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积极抗击日军,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根据地。1938 年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逐渐将主要军事力量转移到对它威胁最大的解放区战场上,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这个战场抗击了日军的大部分和伪军的绝大部分。到 1945 年春,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已发展到 120 多万人,还有民兵 220 万人。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共有 19 个,面积 95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9950 万。

因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发挥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始终注意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相反,如果共产党不能独立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

提出了政治主张不能够贯彻实行,就不能有效地团结、影响中间势力,甚至会丧失政治上的独立性,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

第二,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总结了大革命后期“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土地革命后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两种极端政策而提出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

每一阶级都是从本阶级利益出发表明其政治态度的,所以必须尊重并给以一定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毛泽东特别强调尊重中间势力的利益,在政治上,中共公开表示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改变“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代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统一战线政权时,政权领导成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占三分之一,这就是“三三制政权”。这样,反映了中间势力的政治利益,使他们相信党的政策,有利于进一步团结他们共同抗战。

在经济上,中共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实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使他们有利可图;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在私人经济中,要求适当改善工人生活。中共还停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武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代以减租减息和保证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些政策是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害怕土地革命的特点而采取的让步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让步政策有力地争取了中间势力。

联合中间势力时,共产党人注意到两个区别:其一,同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争取相区别,前者是作为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而后者是作为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其二,对中间势力中的三部分人也要加以区别。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与工人有阶级矛盾,但在沦陷区受日本侵略者压迫,在国统区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限制,因而主张抗日,赞

成宪政运动,并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带有资产阶级色彩,他们与农民有阶级矛盾,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的政治态度略同于民族资产阶级。这两部分人虽然害怕土地革命,但可以与中共一起建立民主政权。而地方实力派,其领导成分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本质是反动的。这一部分人虽然可以共同抗日,却不愿意同中共共建民主政权。但他们与国民党中央派损人利己政策有矛盾,也想利用中共与顽固派的矛盾达到其政治目的。中共正是抓住地方实力派这一特点进行工作,争取他们在对顽固派的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

但是,中共没有忘记中间势力动摇性的特点,对他们的动摇立场,进行了坚决的批评斗争,对他们的让步也有一定的限度——就是让步不能妨碍团结抗日,不能妨碍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不能妨碍民主、民生的适当改善。如对山西军阀阎锡山,中共既与其保持联系,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又对其重兵进攻予以有力的反击。正是由于对中间势力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避免犯“左”或右的错误,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故中共能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把中间势力中的大部分人团结在抗日阵营内。

第三,对顽固势力实行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指出:“如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就无从发展”。^①对顽固势力的反动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会使顽固派的反动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有利于进步势力的存在和发展,也会使中间势力鼓起勇气,靠近进步势力,不为顽固势力所吓倒。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蒋介石集团的片面抗战路线和积极反共、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政策进行了揭露和斗争。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

潮,中共一面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一面在军事上给予彻底的还击,从而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包围攻击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9000多人。中共立即进行坚决的斗争,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提出惩办祸首等12条解决办法。在全国同胞中披露事变真相,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因此,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国共以外的各党派均纷纷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执政当局制造“皖南事变”,要求停止“剿共”部署。2月22日,参加国民党参政会的各民主党派集会商讨,一致决定致函蒋介石,提出实行民主政治,党派公开合法存在等要求,并决定如果蒋介石不接受,各民主党派同意此纲领者将不出席国民党参政会。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保证”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从1944年起,中共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和国民党进行了谈判。虽然国民党始终抱住其一党专政不放,但中共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也得到国际上民主人士的拥护。从而更有效地开展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

总的看来,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间势力的政策是十分成功的,保证了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

①②③⑤⑥⑩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44、746、747、745、748、394、74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

④何干之:《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第2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

⑦《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的好转的指示》(1939年12月1日)。

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47页。

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0页。

作者单位: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责任编辑:郭林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战时第二次三国首脑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反法西斯联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对加速大战的结束和对战后的世界秩序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同时,在这次会议上,却产生了一个包含着强权政治色彩,无视和践踏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中国神圣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雅尔塔秘密协定虽由美苏英三国首脑共同签署,但实质上是罗斯福与斯大林私下交易的产物。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说:“我虽然代表大不列颠参加这个协定,但不论我还是艾登都完全不曾参加这个协定的拟定”。①

1945年6月,为了使这个秘密协定中有关中国的条款具体化、合法化,在美国的敦促下,中国政府派出以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赴苏,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僵持、反复,终于达成最后谅解,于8月14日日本投降的当天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

雅尔塔密约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涉及中国主权的大致有如下几项:

1. 关于大连、旅顺港。秘密协定规定:“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以恢复”。中苏条约的附件则更具体地规定了港口的性质、管理、使用及关税等一系列条款。它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在该自由港指定码头及仓库

租与苏联;”“港口主任由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在苏籍人员中遴选;”“由国外进入该自由港,经中国长春铁路直运苏联领土之货物……均免除关税”;“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联,租期定为三十年”。关于旅顺港,它规定:“旅顺口作为纯粹海军根据地,仅由中苏两国军舰及商船使用”;“关于上开海军根据地共同使用之事项,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处理之,……委员长由苏方派任”;该港防护由“苏联政府办理之”;等等。

2. 关于满洲铁路。秘密协定规定:“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中苏条约的附件则具体将之兑现为:将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之”;“组织中苏合办之中国长春铁路公司”,“公司设理事会,由一华籍理事担任理事长,公司设监事会,监事长应在苏籍监事中推选”;“长春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联人员中遴选”;“经上开铁路由一苏联车站至另一苏联车站过境运输,以及由苏联领土至大连、旅顺港口往返直运之货物,应免中国关税或其它任何捐税”。等等。

3. 关于外蒙古。秘密协定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在中苏条约中进一步主张外蒙独立,它规定:“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

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当然,与获取上述权益相对应的,是苏联承担对日作战的任务。“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事结束后的二至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

「雅尔塔秘密协定」新论

□刘 华 杨菲蓉

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②

二

“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及历史原因。

德国被打败后,罗斯福政府特别渴望苏联出兵抗日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美国在太平洋作战的目标是集中陆、海、空军力量,扫除太平洋诸岛屿上的日军,进攻日本本土的心脏地区,对亚洲大陆的日军则希望通过中国军队来击败。然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使美国对蒋介石的指望化作了泡影。因而,罗斯福将其战略目标部分实现的希望转而寄托在了苏联红军身上。第二,据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在德国战败后仍需18个月才能打败日本,而且要在东京平原作两栖登陆,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死战斗,须付出伤亡达100万人的代价。③他们还对日本在满洲的军队甚至可能在其本土已被征服之后,仍然保存下来继续顽抗的危险深为忧虑。④因此,罗斯福认为,苏联参战对减少美军伤亡和加速战胜日本是至关重要的。第三,在罗斯福看来,日本是俄国的宿敌,苏联最终总是要对日宣战的。与其让苏联到时来“摘桃”,倒不如及早把苏军在远东的军事行动纳入美国制定的进攻日本战略部署,让苏军在限定的范围内和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条件下参与远东的活动。这是最符合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目标和政治利益的。

为达上述目的,罗斯福指示美国官员一再与苏联官员特别是斯大林本人进行联系,争取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斯大林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

斯大林远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苏联远东地区海陆边疆的安全,进而称雄东北亚。而阻碍其达此目标的最大障碍便是侵略性极强、野心极大、且与苏联旧恶颇深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德国希特勒侵苏期间,为了全力对付德军,避免两线作战,苏联不得不主动向日本多次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在有关森林、渔业、原油贸易等方面作了不少让步,并于1941年4月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暂时的妥协,苏日宿怨并未消除,正如斯大林说的:“我

们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们国土上的胡作非为”。⑤我们“有一笔帐要同日本清算”。⑥这笔帐就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败日胜。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从俄国手中夺得了库页岛南部、旅顺和大连港口以及通向该港口的南满铁路。这些地方和日本的千岛群岛一起,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封锁了俄国通向太平洋的所有出海口。十月革命后,日本仍屡屡进犯。1938年在海参崴的哈桑湖,1939年在外蒙的哈勒欣河附近多次进犯苏联,企图截断西伯利亚铁路干线。这其中尤使斯大林耿耿于怀的是1904年日俄战争的耻辱。他认为那是俄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污点”。“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因此,俄国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打败日本,清洗“污点”,夺回失去的权益,使它们不再是使苏联与大洋隔绝的屏障,而是苏联同大洋连接的桥梁。⑦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5年,德国已被打败,日本也只剩垂死挣扎之能力时,苏联清洗“污点”,夺回权益的良机就摆在眼前了。而恰在此时,美国为自身利益计,迫切希望苏联出兵抗日,这对斯大林而言,真可谓天赐良机。斯大林紧紧抓住了这一机会,和罗斯福秘密磋商通过对日作战获得中国东北的某些权益。虽然罗斯福并不能直接出让中国的权益,但斯大林深信亲美的中国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压力和敦促及苏联的某种友好表示下,是能够就范的。而且,苏联战后东北亚独占地位的最终确定,也必须得到美国这个战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头号霸主的首肯。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各自利益的基础上,美苏两国开始频繁接触和协商,并通过谅解和妥协,终于各取所需,炮制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并进而在稍后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得以兑现。

三

使外蒙彻底脱离中国而独立,并进而将外蒙纳入苏联拱卫其在战后称雄东北亚的军事战略之轨,为苏联远东地区的和平建设提供最优国防条件是斯大林签订雅尔塔密约的又一重要原因。

的确,战争给苏联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据估计,战争期间,苏联牺牲2000多万人,德国法西斯把苏联的1710个城镇,7

万多个村庄夷为废墟,使近2500万人流离失所,摧毁了约32000个工矿企业,破坏了65000公里的铁路,把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农机站洗劫一空。战争使苏联遭受的直接损失达6790亿卢布。⑧对战后重建家园,建立起巩固的国防体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斯大林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在未来许多年内,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来为苏联的国内经济准备一切”。⑨他还说过:“苏联政府的意图是在今后的50年内使西伯利亚工业化”。⑩为达此目的,“中国和苏联必须合作”。⑪这种“合作”就是:经济上要从中国东北获得铁路、港口的权益;军事上则必须要外蒙彻底脱离中国而独立。

在这里,简单地回顾一下外蒙历史对我们理解斯大林一定要外蒙独立的意图是有帮助的。外蒙在地理上位于我国正北面,北界苏联。早在1911年12月,沙俄就曾利用辛亥革命使清王朝下台之机,策动了外蒙封建王公脱离中国而“独立”。1915年,中俄蒙缔结《关于外蒙自治之三国协定》。协定确认了沙俄此前在外蒙获得的各项侵略权益。十月革命后,沙俄政权覆灭,外蒙王公失去了庇护,遂又放弃“自治”,回归中国。1921年初,在白俄残匪的唆使下,外蒙封建主再次宣布“独立”。同年7月,蒙古人民军在苏俄支持下击溃白俄残部,成立了外蒙的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5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仍规定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⑫同年11月,外蒙在苏联支持下,废除君主制,成立了人民共和国。此后,苏联的势力不断渗透到外蒙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雅尔塔密约关于外蒙问题除了要求“承认现状”即:“大约三十年来,这个原属中华帝国的地区一直是在俄国保护下处于自治状态”⑬之外,斯大林仍嫌不足,更进一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独立。在兑现雅尔塔密约内容的中苏谈判中,蒋经国问斯大林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回答说:“老实告诉你,站在军事战略的观点,我需要外蒙古”。斯大林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队,由外蒙向苏联进攻,切断西伯利亚铁路,苏联就完了”。尔后更进一步表示:“我若拿不到外蒙,

是不能甘心的”。⑭这就充分暴露了斯大林在“外蒙独立”上的真实意图。

四

“雅尔塔秘密协定”是一个极不光彩的条约,它既违背了诸项国际法准则,又背离了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无视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阵线中的杰出贡献。

国与国之间处理相互关系,应当遵循各国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惯例。而雅尔塔密约在诸多方面违背了国际公法。首先是违背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与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这一国际关系中最根本的原则。雅尔塔密约是大国强权政治的表现与产物,这是不争的事实,勿需赘述。其次是违背了国际法关于国家领土变更的原则与惯例。国家领土有各种形式的变更方式,但自从人类迈入工业文明社会以后,国际公认,领土的变更只有在严格遵守国际公法和国家主权原则的前提下,才被认为是合法的。20世纪以来,由于民族自决原则被强调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新的领土变更方式——公民投票,即由居民以投票的方式决定土地的归属。这是表达人民意愿的一种方式,但有时也有可能被用来作为蒙骗国际舆论的手段。中国外蒙地区的独立,就是在苏联操纵下经过“公民投票”而脱离中国的。再次,是违背了一系列国际条约。(1)违反了1941年英美首倡发表而后苏联也参与同意了的《大西洋宪章》。宪章规定:“不追求领土和其它方面的扩张”。而雅尔塔密约充分表明了斯大林追求的正是“领土和其它方面的扩张”。⑮(2)违反了中美英1943年及1945年订立,后来苏联也加入了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规定:签约国“决不自身图利”。⑯而秘密协定恰好是美苏各自图谋自身之利的见证。《开罗宣言》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等,归还中华民国”。⑰而秘密协定不仅把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转让苏联,还进一步把“中国之领土”的外蒙也从中国割裂出去了。可见秘密协定与宣言和公告是背道而驰的。

雅尔塔密约还违反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国际主义无疑是苏联外交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但事实是,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党和政府在雅尔塔密约出笼的前前后后,均将这些原则抛在了一边。其一,斯大林违反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外交工作中杜绝“秘密外交”的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首脑人物大搞不光彩的秘密外交。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指出:秘密外交是各国资产阶级外交的重要特色之一。秘密条约是他们玩弄外交骗局,图谋瓜分世界的产物。1917年11月8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由列宁亲自起草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就宣布:“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无条件地废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全部秘密条约”。^⑮翌日,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发表的《关于公布秘密外交文件的声明》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秘密外交是少数有产阶级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他们不得不欺骗大多数人,以便于使后者服从于他们的利益”。“工农政府现在把秘密外交连同它的阴谋、密码和谎言一起铲除掉。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瞒的”。“废除秘密外交是人民的真正民主的对外政策的真诚性的首要条件。苏维埃政权事实上以执行这样的政策作为自己的任务”。^⑯

可斯大林却把这些置之脑后,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搞“秘密外交”,订“秘密协定”。在雅尔塔密约中,他们出卖了中国的权益,却对中国闭口不提,直到1945年6月需要到中国兑现了,才通知蒋介石政府。而当时需要保密的最大理由是美苏都不相信国民党政府能够保守住秘密。斯大林认为,当时苏日仍处于和平状态,在苏联的部队未调到远东之前,如果宣战意图被泄露出去,日本可能先发制人,进攻苏联。事实上,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时苏联对日态度已趋明朗。1944年11月6日,斯大林在演说中已经公开把日本和德国一起谴责为侵略国了。连外国的观察家也认为:“我不相信战争到了那个阶段,日本还敢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⑰可见,所谓的保密理由不过是美苏为了掩饰其背着中国搞交易的不光彩行为而杜撰出来的借口而已。

其二,斯大林的做法违背了列宁一手制

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三次对华宣言,充分阐明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对华政策。表示:要“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⑱“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⑲正是在这种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对华政策指导下,苏联政府主动地与中国政府于1924年5月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宣布:前俄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行废止”;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国所订立的一切有损于中国主权与利益的条约“概为无效”。并郑重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和协定”。^⑳列宁所主持制定的苏俄对华政策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交口赞誉,他所领导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因此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敬仰,激发起先进的中国人“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革命热情。然而,斯大林却背离了列宁的对华政策,为自身利益计,不惜背着中国人民大搞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外交,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民族自尊心。斯大林在和罗斯福磋商密约的过程中一再表明,如果他开列的参战条件不能满足,他就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必须同日本人作战。甚至到欧战结束后,他还多次强调,何时对日开战,“将视他和罗斯福的秘密协定的执行情况而定”,^㉑将视“同中国代表们尚未结束的会谈结果而定”。^㉒由此足见,斯大林显然是把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当成了他为攫取相应权益而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雅尔塔密约还是一个轻视中国主权,抹煞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杰出贡献的条约。

众所周知,自从1931年以来,中国人民就一直不屈不挠地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种斗争,极大地援助了各盟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连苏联自己的史学家也承认:“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具有巨大

的国际意义。它制止了太平洋地区和亚洲战争的进一步扩大”。^{②⑥}“中国人民给予苏联人民很大的帮助,使苏联人民易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进行巨大的斗争”。^{②⑦}因此,打败日本后,日本在华权益的接收者,天经地义地只能属于这些权益的真正主人——中国,而决不是苏联或其它任何国家。对日参战时间甚短(仅仅6天)的苏联,却要价惊人,不仅要攫取战败国日本的领土和权益,而且还把触角伸向了自己的同盟国——中国。对日参战时间最长(长达14年),牺牲最大(伤亡人数3500万,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1000亿美元以上)的中国,^{②⑧}不仅没有收回自己应得的权益,反而还失去了它们,且失之于社会主义的苏联,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沙俄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又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复活。1945年11月6日,莫洛托夫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的演说中,公开声称:“……还要提到的,便是我国对于满洲铁路权利的收回,还有我们对于满洲南部旅顺港区域和大连区域权利的收回。我们对于所有这些地区,都必须予以适当的注意,因为这些都是新的苏维埃领土”。^{②⑨}(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这段话,不啻是雅尔塔密约泡制者之一——斯大林最好的自我表白。

在美苏英三巨头拟定雅尔塔密约期间,丘吉尔曾对自己签署事前一无所知的雅尔塔密约大发议论:“在战争中,真相是这样的宝贵,以至它甚至总由一个谎言保护着出场”。今天,撩开历史面纱,斯大林签订雅尔塔密约的真实战略意图就昭然若揭了。

①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第342页。

②“雅尔塔秘密协定”全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文及其附件均见《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

辑》(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威·艾·哈里曼:《哈里曼回忆录》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④迪恩:《奇异的同盟》,转引自《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07页。

⑤别列日科夫:《三国同盟的诞生》,上海师大《外国史摘要》1978年第6期。

⑥⑦《斯大林文选》第437页,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本。

⑧加琳娜·米哈依洛娃:《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资料》,《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3期。

⑨⑩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50页。

⑪⑫⑬⑭《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第437、536、524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北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243、316、62—64、87—91、157页。

⑳《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5页。

㉑《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

㉒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7页。

㉓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16页。

㉔贾比才:《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32页。

㉕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32页。

㉖《中国革命史教程》,广东高教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㉗《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庆贺十月革命胜利演说词》,《大公报》1946年2月16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社科部
责任编辑:郭林

论抗战报告文学的新启蒙内涵

□李 斌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由近代梁启超“新民德”、“启民智”的“新民”主张,到五四时期鲁迅唤醒国民的呐喊,都贯穿着启蒙的文学母题。抗日战争的爆发,将中华民族推向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战争历程,同时也掀起了五四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次启蒙高潮。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面前,唤起全民奋力抗争的民族精神,已为抗战文学所急需。广大文艺工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要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唯有最普遍地激励人民的敌忾心,最大限度地发挥大众抗敌报国的精神潜力。因此,在文学的商业关系被打破,消遣文学衰落的抗战时期,报告文学这种体制短小而极具战斗性、时代性和唤醒民众效用的年轻文体,便顺应时代的召唤,被赋予了新的启蒙使命。

一、反帝意识、民族意识的高扬

抗战报告文学的新启蒙精神,是与五四报告文学的启蒙精神相对而言的,而且是后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五四文学启蒙的对象,主要在于“个人”。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报告文学,它的启蒙重心也在于社会群体中的个人。20年代初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或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①或是“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②都是对个性精神的大力张扬。这些早期报告文学的创作旨归,均在于通过启蒙个人精神、个性意识来争取民族群体的最后解放。虽然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启蒙,也是五四报告文学创作的内容之一,特别是产生于五卅运

动的报告文学,其反帝爱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色彩更显强烈。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愈演愈烈,也由于革命文学运动中左倾思潮的泛滥,使得以后的报告文学过分强化了阶级意识的启蒙,而相对淡化了对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启蒙。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左联报告文学才开始强调“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③才提出报告文学的创作应服务于“民族革命”的斗争,在抗战前夕,反帝反侵略,弘扬民族意识的报告文学,在整个报告文学园地里只占少数。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由潜隐状态跃升到激烈状态,似火山熔浆般喷发出来,民族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奋涨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④当时民族矛盾已居主导地位,反侵略的群体利益刻不容缓地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个人的价值应从属于群体价值,唯有达到整个民族的觉醒,争取到整个民族的解放,才谈得上个性的觉醒与解放。因此,抗战文学必须强调和突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召唤下,抗战报告文学乃至整个抗战文学新的启蒙重心已不在单纯的个人,而是涵指整个民族群体。

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生命力中原始强力的勃发,依赖于传统的民族忧患精神的发扬。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以最严肃的态度,迅速报告了敌人的暴行及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祸殃,传达出了中华民族危难的

时代信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患。这首先是一批摄录日军狂轰滥炸下中国人民血肉横飞惨状的报告文学,如再现广州遭受空袭后真实情景的《广州受难了》(燕军)、《遇难者的葬礼》(草明),反映长沙被炸后情形的《十月十九日长沙》(王西彦)。还有些作品,如汝尚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屠杀我平民百姓的种种暴行。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记述了华北妇女“遭遇了而且正在遭遇着历史空前、举世无比的悲运”,都强烈谴责了日军不分老幼、不分死活的奸淫罪行。另外,一些报告文学还着重反映了日军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上海一日》中反映难民痛苦凄惨生活的《悲惨世界》、《覆巢》、《露宿街头的人们》和《一个精神病者》,司马文森倾诉难民有家难回痛苦心理的《野火》,描述疏散女壮丁不幸遭遇的《三个女壮丁》,以及丘东平痛惜一个美满和谐的中国家庭在战火中破碎的《吴履逊与季子夫人》……这些作品,或是揭露、指斥敌人的残暴,或是哀诉战乱岁月生离死别的苦痛,真可谓是用血肉凝聚成的文字,是为我们民族的厄运发出的深长嗟叹。

在国家危难,生灵涂炭的时刻,不少报告文学作品提醒国人要对自己的民族弱点进行反省、批判。只有扫除国民劣根性,我们的民族意识才能得以大力张扬,抗日战争才能赢得最后胜利。在抗战报告文学的历史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幅睡民图:农民张金宝冬夜替日寇巡逻,被俘后问他投敌缘故时,他答道:“我不知道”(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被中国防空部队击伤的日机被迫降落在大同城外,而“附近村民都围着看新奇,看着日本飞机师从容把飞机修好,安然飞去”(范长江:《吊大同》);“诗人”叶绿菊身在抗日军营而心在“亭子间”,始终视己高出普通士兵一等,终日只知道吟诵古诗句,哀叹“孤独”(骆宾基:《诗人的忧郁》)。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时尚有一些国人自私、卑怯,对民族的抗战冷漠置之,毫无民族意识可言。曹白的《这里,

生命也在呼吸》,揭露了电影院主对难民毫不同情、苛狠如敌的丑恶行径。溪映的《未死了的英雄》写道:伤兵医院“房子三百间,一百几间为医院人员所占有,……剩下的才让给一千以上的伤兵”,而为国负伤的伤兵们却在那儿无人照顾,无饭可吃。某城县长风闻五十里外的徐州遭到空袭,竟置全县人民生命于不顾,“身先士卒”躲进防空洞三天不敢出来(陶雄:《某城防空纪事》)。更有甚者,便是我们民族劣根性中奴性思想的恶性膨胀。范长江等人的报告文学集《西线风云》,就曾着重指出了汉奸的卖国给中国抗战带来的恶劣影响。以上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民族直至全民抗战时期,仍有一些人缺乏团结一致、自尊自重、清醒而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时代需要报告文学给他们注入唤醒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的清醒剂、兴奋剂。

抗战报告文学对民众反帝意识、民族意识的启蒙,除了激发民众的民族忧患精神,以及自省民族的落后心理,针砭现实生活中少数缺乏反帝意识、民族意识的事象之外,还发掘和肯定了绝大多数民众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所表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司马文森的《漓江的水流》写道,日军的奸淫烧杀促使世代为仇、械斗了六百余载的漓江两岸的陈家大姓的子孙们,从极度痛苦中进行深刻的反思,“勾销了六百年来传统的仇恨”,从此揭起了团结反抗的救亡战旗。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则选择典型材料反映了边疆人民为打通“国防大道”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整个施工过程中,由于生活困苦、瘴毒流行而病死的,“因昏晕而堕下江的”,“误踏到炮眼上,崩成粉末的”,不计其数。民工们“铺土、铺石,也铺血肉”,终于完成了这项对坚持抗战至关重要的伟大工程。从中可以看到,抗战时期绝大多数民众已经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正在竭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以奉献抗战事业,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涨程度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鲁迅一生致力于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那杀人场上将脖子伸得象鹅颈似的

“看客”，一直为他所深恶痛绝。相比较而言，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的觉悟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大多自觉地将自我情感、个人利益融入了全民族的情感和意识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不再是冷漠而无聊的看客，而是投身抗战洪流的战斗者。当时解放区的许多报告文学，就反映出边区人民牺牲小我以成全大局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风貌。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报道了一个老头送四个儿子参军的动人故事，感慨这老头子“懂得有国比有儿子还重要”的道理。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这样描写了八路军过村时的情景：

作烧饼的老头子把正在做出来的烧饼全部交到我们营长手里。一个七十多岁的妇人，含着泪，把两个煮熟了的鸡蛋塞给我们当中一名年青的战士，“这是去年的鸡生的，”她说，“我穷人家就没有别的什么了！”……有个壮丁抱着一头白色的兔子，说这是他父亲临死的时候给他剩下的、唯一的财产，他现在虽是贫苦到顶了，但还希望八路军能够收下它：它是能够做一味美菜的，……

这和当年百姓视兵如匪，兵到民逃的兵民对立景象，显然有天壤之别。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动人的场景，是因为抗战时期血与火交炽的现实，使得广大民众之间升腾起一股融融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感情，民族意识的觉醒，已使军民关系变得十分融洽，使得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感情维系。《平原上》（葛陵、朱寨）、《谁是区长》（林采）等作品，就细致描述了边区人民在敌人屠刀下“认亲”的感人场面。他们和当年鲁迅笔下的无聊看客相比，思想境界有多么巨大的差别！

农民，向来被视为“散漫”、“自私”、“狭隘”、“目光短浅”，而上述作品正反映了中国众多普通农民在抗战时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赤诚，体现出农民思想上的巨大飞跃。此外，那些抛家别雏、北上抗日的南国知识分子（杨朔：《潼关之夜》）；那些虽精疲力竭，却仍毫不畏惧地与敌展开殊死拼杀，直至为国捐躯、遗尸沙场的普通士兵

（骆宾基：《一星期零一天》）；还有那些“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破除了杀戒，用钢刀来保证‘如来’之爱”的和尚与喇嘛（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在这些国人身上，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自私、麻木、奴从的国民劣根性，他们经过战火的淬炼，成了勇于抗争的倔强者。他们是抗击侵略者的主要力量，是肩负着时代重任的“阿脱拉斯”型的人民。抗战报告文学塑造了一组抗敌保国的英雄群像，以此对民众进行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的启蒙。它们炙烤着当时每一个具有爱国良知的中国读者的灵魂，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抗敌激情，坚定了他们奋勇抗敌、保家卫国的决心。

必须指出，抗战报告文学在启蒙反帝意识、民族意识过程中所发扬光大的爱国主义，不是传统的忠君保民的爱国主义，而是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将国家尊严、国家利益与人类总体尊严、总体利益相结合的广泛的爱国主义。同样，抗战报告文学所弘扬的民族主义，也截然不同于30年代和40年代初国民党御用文人所鼓吹的实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而是将反对日本侵略者与反对世界法西斯主义，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独立与争取各国人民的自由、解放相结合的广义的民族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正契合抗战时期的现实需要，是抗战报告文学启蒙意识的重要内涵。

二、反封建意识、民主意识的呼唤

历史经验表明，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不仅有赖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最后胜利，也有赖于继续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在这一点上，抗战报告文学继承了五四报告文学的优良传统，担负起了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的启蒙主义任务。

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中国人民从未真正享受过民主的权利。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并未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资本主义民主，辛亥革命后的一连串政治事件，诸如袁世凯窃国、独裁、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的军事独裁等等，都只是不断变换的专制统治，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直到全民抗战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政府实

行蒋氏王朝专制,使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举步维艰,同时也大大阻碍了中国抗战的进程。著名作家沙汀曾指出:“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这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出乎情理之外的幻想。”^⑤具体到抗战文艺上,则如茅盾所言:“我们需要激昂慷慨、悲壮英武的内容,但我们也需要嘻笑唾骂的内容。抗战文艺的题材应当广博而复杂,什么都有。”^⑥抗战报告文学在弘扬民族整体意识的同时,也应通过揭露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反民主、反自由的丑恶现象,将“吃人”的罪恶与淋漓的鲜血展示给广大读者,以唤醒广大民众的反封建意识和民主意识,踏上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道路。

首先,国统区的报告文学,反映了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黑暗社会状况。野渠的《伤兵未到以前的一个后方医院》,以浓墨重彩披露了国统区医疗卫生部门的黑幕。这个医院一百多人中,只有一个医生是正式医生,其他从官长直到伙夫,大部分是院长的亲属——宛若一个“后方家庭医院”。而院长及医务主任之流,就在这个封建小王国里假抗战之名,行大发国难财之实。整个医院在伤兵未到以前已是腐败不堪、黑暗透顶,可想而知伤兵到后又会是何种景况。唐其罗的《沙喉咙的故事》,揭露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政权假借征兵抗战的名义,向农民肆意敲榨勒索,造成了广大农民家破人亡的滔天罪行。萧乾的《林炎发入狱》,控诉了国统区保长私卖公田、滥派爱国捐税,并诬陷、拷打爱国人士的恶行。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大后方的现实生活中,虽然也出现了抗战的条文与命令,抗战的组织等等,但那一切只不过是封建旧势力进行压榨和掠夺的新手段而已。在抗战时期,中国社会仍然活跃着代表封建时代的人物,仍然面临着反封建斗争的艰巨任务。大后方的这种种“卑污”、“阴私”和“贪婪”,是销减民族斗志的鸦片,是破坏民族凝聚力的毒剂,是夺取抗战胜利的绊脚

石。上述暴露性作品与抗战初期“讴歌”、“赞颂”性质的报告文学虽有不同,但它们陈列种种反民主、反自由的丑恶与黑暗,是希望摘除长在民族肌体上的毒瘤,扫除抗日道路上人为的障碍,表达广大民众要求民主自由的意愿。因而,它们同样具有重大的新启蒙意义。

其次,国统区的一些报告文学,还反映了广大国统区人民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非人生活。李乔的《饥寒褴褛的一群》,展示了国统区兵役制度的黑暗:300多名壮丁被抓去,即将走上杀敌的战场,他们是光荣而值得尊敬的,可是那个押送壮丁的军官却将他们视为草芥,竟把他们的生活费买了鸦片做生意挣大钱,壮丁们每天只能喝上“两碗清得象米汤似的稀饭”,最终“愁苦的闭着两只眼睛,躺在路上、草丛中,正在给野狗、老鸦贪馋的饱餐着”。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和《“活魂灵”的夺取》,反映了广大难民在国民党官僚榨取下的痛苦生活。“互颂收容所”名为500人,实际不过300人,有200人的缺额可以贪污;难民们一日两顿,每天的“十六两”被减成“十四两”,而且“要比囚饭吃的少三两”。正如鲁迅先生曾经沉痛指出的,“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⑦即使是在全民抗战时期,千百万中国人民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不但不被当作人,甚至不及牛马。在灾难深重的抗战中,要争取民主,首先要争得做“人”的权利,如果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民主不过是空谈而已。上述作品,正是为奋力搏杀中的中国人民,展示了自己被奴役和被“吃”的悲惨遭遇,启发他们争取做一个人的觉悟,进而激励他们走上了继承五四传统,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之路。

与上述暴露性报告文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如周而复的《晋察冀行进》、《冀中一日》中的部分作品,沙汀的《敌后琐记》,以及李公朴、黄炎培、赵超构等的延安访问记,都热情地介绍和赞颂了解放区的民主建设成就,表达出解放区民众在民主意愿实现后的欣喜之情,在客观上

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民主建设树立了先进的典范。

周而复在《晋察冀行进》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晋察冀边区的民主政治。他认为“象这样以人民为主的政治生活,孙中山先生追求了四十年都没有成功,……经过八年的抗战,……全国人民的希望,孙中山先生的理想,首先在解放区实现了。”文中还以“地方性的联合政府”为题,报道了1943年1月15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员的选举,盛赞这是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选举”。《冀中一日》中的《我和县长》(王宝顺),描述了一个在边区民主政治下产生的新型县长的形象。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历来是官僚地主统治平民百姓,官僚地主是老爷,平民百姓是奴仆。而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干部却是民众选举出来的,他们奉公守法,热心公务,与群众平等一致,堪称人民公仆。

除了反映边区的民主政治成就外,解放区的报告文学还从家庭关系、婚姻关系的角度,反映了民主思想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深入人心。《小夫妻》(宋之的)写的是抗战前后一对夫妻家庭关系的转变。战前,丈夫铁蛋夫权思想严重,妻子大姐自从嫁到铁蛋家就没有地位,没有爱情。抗战开始后,大姐积极参加妇教会,热心于各种抗战活动,终于赢得了和丈夫平等的家庭地位。《冀中一日》中的《小翠也自由了》(杨林)、《淑清》(洁卿)和《冲出了重围》(齐诺),也都真实地勾画出边区妇女勇于砸碎封建婚姻枷锁,积极投身抗敌洪流的战斗英姿。这些作品,是继五四之后对民主、自由意识的再启蒙,它们对那些正极力摆脱封建旧习俗、旧道德的束缚,争取婚姻自由、人身自由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既使中国民众经受了一次大劫难,也荡涤了全民族的思想灵魂,使民众空前地团结一致,民众反帝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对于我们民族的这一自我觉醒,抗战报告文学是作了很大贡献的。它在战时状态下,为时代和人民而写,继承了五四报告文学启蒙主义的优良传统,发挥了巨大的新启蒙效用。那外族入侵的烽火岁月尽管早已逝去,但中华民族所焕发出的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却已做为一种精神遗产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由此,启蒙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抗战报告文学,便具有了永恒的价值。

①瞿秋白:《饿乡纪程·跋》,见《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②瞿秋白:《赤都心史·序》,见《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③见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转引自马良春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自序》,见《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三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⑤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见《沙汀文集》第十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⑥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载1938年3月9、10日广州《救亡时报》第154、155号。

⑦鲁迅:《灯下漫笔》,见朱德发、韩之友编《鲁迅选集·杂文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单位:《山东人口》杂志社
责任编辑:陶原珂

“迈向 21 世纪的珠江三角洲

经济区研讨会”综述

□ 肖立见

由广东青年经济研究会和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办的“迈向 21 世纪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研讨会”，于 1995 年 4 月 26 日—28 日在东莞市召开。100 多名青年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迈向 21 世纪的发展战略，重点讨论了下列问题。

一、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总体战略

去年 10 月，广东省委和省政府提出了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目标。与会者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1. 珠江三角洲在实现高增长的背后，潜伏着外延粗放增长、技术素质偏低和投资效益不理想的隐患；2. 在产业结构迅速上升的同时，出现了产业结构失衡、空间布局重复、区域分工不明的倾向；3. 各自为政、行政割据、导致区域协调受阻；4.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够协调。

与会代表认为，建设珠江三角洲的总体战略，既要有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亦要有助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持续发展和目标的实现。会议提出有几种战略：1. “三大转变”战略。即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应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从经济上的“小”、“粗”、“低”、向“大”、“优”、“高”发展，从着眼于小经济区到大经济圈的转变；2. “三高化”战略。即高外向度、高科技、高综合效益和资源环境整体优化战略；3. 可持续发展战略。即坚持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逐步实现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大模样、全

面成长和全面现代化的战略；4. 整体协调发展战略。即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劣势互消、整体优势和规模效益提高的发展战略。

与会代表还进一步讨论了实施总体战略所应采取的一些措施：1. 创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调度、指挥、协调系统，对该经济区进行统一规划、调度指挥和条块协调；2. 对区域内公共基础设施、环境资源、城市和经济布局整体规划、合理开发；3. 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和方式，培育资源整体优化的经济机制；4. 突出广州的中心城市作用，发展区内的中小城市，形成区域内功能各异的城市群体；5. 区内协调、区外开发，发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辐射影响作用和聚集作用；6. 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注重环境保护，合理使用资源，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同步提高；等等。

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分工协作

按社会分工原则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优势互补的分工体系，是实现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基本保证。怎样建立有助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整体优势和规模效益提高的分工体系呢？与会者认为：1. 必须重新确定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产业成长的思路和原则，以改变目前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大多数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水平的产业格局。在具体操作中还应遵循“分工协作、规模经济、三高两低（即高附加值、高技术、高创汇和低

消耗、低运量的产品)、注重环保、循序渐进等原则;2. 统一规划,突出特色,形成区内分工合理又各具特色的经济布局;3. 对生产工艺、产品相同的企业可组成跨行政区域、跨部门、跨所有制的企业集团,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形成一批力量雄厚的大型企业、支柱产业和拳头产品,以形成区域合力,增强竞争力;4. 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建立主导产业群,使传统的“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格局尽快转轨、变型和升级;5. 在引进资金技术的同时,以高科技为导向,生产和开发有区内优势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促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6. 建成区内和区外联系的高质高效、便利发达的交通、通讯、信息等网络系统;7. 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分工合作的宏观调控体系,打破行政割据、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自我封闭发展的经济格局;8. 考虑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和受国内外政策和市场变化的影响较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不仅要强化发展农业,而且必须建立一个高效率、持续协调发展的农村和农业经济系统。9.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中应主要发展交通运输、内外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和旅游服务等。

三、珠江三角洲与城市化

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是伴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而兴起的。由于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主要是得力于外力的推动,因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超越了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进程,是一种超常规、高起点的发展。由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兴起到一个以广州为中心城市的巨大城镇群体的产生,前后仅用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基于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珠三角的城市化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有:1. 城乡建设缺乏科学的总体规划,因此无论是在城市硬环境的建设还是在城市软环境的建设中,都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2. 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现有特大城市只有广州,大城市仅有深圳,其余绝大多数是10万人左右的小城市,缺少50—100万人的中等城市。3. 产业结构转换滞后于城市化水平。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内除广州、深圳、珠海等市以外的大部分市,第三产业比重都很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也大都有待于上档次、上水平、上规模。4. 中小城市林立,并都以大都市为发展目标,造成资源尤其是土地的严重浪费和对周围环境的破坏;5. 城市群体内分工不明,各市没有鲜明的特色;6. 城市群体的核心或中心的作用不突出;7. 城市化区域扩张与社会发展未能同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较低,城市居民的城市意识淡薄;8. 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缺乏有效的指导和宏观调控,没有形成合理有效的保障约束机制。

针对上述问题,与会者提出如下建议:

1. 在统一规划时,对整个城市群体的工业、交通、产业结构、人口分布、大型基础设施以及各城市的性质和功能定位等要有近期的和长远的不同层次安排,统筹安排全区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杜绝重复浪费现象;2. 调整城市规模结构,大力发展中等城市;3. 突出广州的中心城市作用,使其真正担当起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龙头”的角色;4. 强化民众的城市意识,推动人的现代化;5. 以广州为中心,比照长江三角洲,建成既突出岭南特色,突出各市个性又体现统一布局、风格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如花园城、海滨城、电子城、汽车城、旅游城、陶瓷城、港口城、科学城、纺织城、高新技术城等;6. 采取必要的政策法规保证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管理的现代化。

四、珠江三角洲与外部关系

与会代表指出,位于珠江流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有着得天独厚的经济地理优势。即毗邻香港西接澳门,与相邻的东南亚各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史缘、血缘等关系。沿珠江流域而上,背靠的是自然资源丰富的湖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受资源条件的约束,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显著经济特征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因此,如何利用好区位优势,加强外部经济合作,建设共生型的经济体系,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必须考虑的问题。

经过讨论,与会代表达成下列共识:

(一) 重塑珠港澳经济新关系是当前客

观环境发展的必然。主要有：1. 互相依托，走国际化的道路，加快珠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步伐；2. 发挥区域优势，加强要素流动，建立健全新的融合功能；3. 继续加强互补，同时开拓合作新领域，逐渐从松散性的互补性合作转变为较全面的结构性合作，以推动珠港澳经济内涵型的联动发展；4. 内外辐射，起经济“龙头”作用。一方面，港澳将会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势，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在经济技术及对外贸易等诸方面起更大的辐射作用，有效地带动和推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可以更好地发挥现有的人力资源、经济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基础条件，与港澳经济融合，促进港澳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稳定繁荣。

（二）确定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在亚太经济区域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世界经济由“大西洋时代”进入“太平洋时代”，位于亚太地区中心地带的大珠江三角洲（含港澳）经济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会日益密切，在拟议中的“亚太经济圈”中也将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因此，如何抓住并利用这一机遇，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是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对此，与会代表提出：1. 争取由亚太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基地进而发展成为亚太区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及高科技产业中心；2. 在产业政策和

对外经济政策等方面与亚太各国（地区）协调和合作，以发展互惠的经济关系；3. 侧重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东南亚各国相近，甚至已超过一些东盟国家，东盟各国目前大量需要的机械制造技术、电子通讯、发展农村工业的技术和产品等，恰恰是珠江三角洲已进出口成长阶段的技术和产品，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应利用东盟的广东海外华侨渠道，通过直接投资办厂、发展其所需的适用技术产业。

一种看法认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框架应该是：立足于全国，以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内地为腹地，以港澳地区作为主体经济伙伴，拓展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品市场，借鉴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各国的发展经验，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辐射带动作用，对亚太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发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应有的作用。

此外，与会代表还就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政府角色的定位、珠江三角洲生活方式、“珠江三角洲地区文明人”的构建、人才素质的提高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论证。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三角洲经济模式是海洋经济模式的一个特殊部分,这主要是由三角洲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工业化的进程导致了近代海洋发展模式的出现,而三角洲则是条件最优越的前沿地区。一方面三角洲地区是流域经济和内陆地区对外联系的据点,另一方面在河流入海口处易形成良好港口地质条件,因此三角洲地区往往具有方便的海洋运输条件,正是由于这些地理优势,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比一般沿海地区更要优越,往往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模式。珠江三角洲地处本世纪出现的最大和最有活力的经济圈——环太平洋经济圈与中国南方大河——珠江的结合部,珠江三角洲模式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它不仅具有沿海地区的共性,而且还具有浓厚的地区特点。

1. 流域经济的龙头。珠江流域是一个大流域经济区,它包括了广东、广西以及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珠

江三角洲地处这个区域的最前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珠江流域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首先是能源资源,贵州号称“南方煤海”,煤炭贮量丰富;水力资源更为可观,桂、黔、滇三省是全国水能较为集中而丰富的地区,河流落差大而建坝条件好。其次在流域中上游蕴藏着丰饶的有色金属矿产,广西的铝土矿、云南的锡矿、贵州的硫铁矿都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珠江三角洲得改革开放之先,拥有资金、技术、人才上的优势,而

恰恰是资源匮乏,因此应充分开发流域内的自然资源,并以此带动整个流域经济的发展,当好“龙头”,促动“龙身”、“龙尾”。

在具体方式上,可采用资金投入,技术参股的方式,与内地组成合作股份制企业,合资开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同时利用三角洲在技术、信息上的优势,对内地进行人才的对口支援、技术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这样可使开发的起点更高、效益更好,而珠三角也因此可获益更快、更丰。

2. 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深刻影响。现代工业文明的出现伴随着海洋的发展,随着现代造船技术的日益先进,使得超大运量的海洋运输成为可能,海洋对陆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沿海地区经济超前快速发展几乎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便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和海洋这种自然条件结合起来产生的巨大力量使然。

珠江三角洲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环太平洋经济圈,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圈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亚洲、美洲、大洋洲地区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20多亿人口,有世界上的老牌经济

强国美国、日本,有新兴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以及发展正日新月异的中国等。广东省地处我国南部沿海,拥有广阔的海域和沿海地区,大陆海岸线长达4314公里,约占全国大陆岸线的1/4,是全国大陆岸线最长的省份,珠江三角洲位于这段海岸线的中段,汕头、湛江为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两翼,海上联系便捷,珠江三角洲应充分利用濒临海洋的地缘优势,加快港口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大力发展“大出大进”

浅议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与对策

□朱 江

的海洋运输业、加工工业和转口贸易,将海洋作为一个开展国际经济活动的大舞台,使珠江三角洲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圈,更全面地参与国际竞争,同时珠三角还应积极开发现有近海资源,发展海洋产业;对海岸线的利用也应作出切实可行的岸线规划,将旅游业的发展作为岸线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

3. 毗邻港澳的传统优势。珠三角与港澳历史上便有着传统的紧密联系,讨论珠三角经济区的发展不能轻视其与港澳地区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关系,不能忽视珠港澳关系中的传统优势。二战以后,香港利用其在远东政治、经济、贸易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之机,迅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信息中心。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交通方便,两地居民生活习俗相似,语言相通,这些都是珠江三角洲与港澳交流的天然优势,它地无法取代,珠三角河道纵横,相互沟通,据统计天然水道有 823 条,总长 6200km,主要水道 50 多条,长 1490km,大小港口 63 个,许多县市可以有海港或河港直接联结港澳,陆上更有广深高速公路、准高速铁路和正在建设中的广珠高速公路,今后更有京九铁路直通九龙。陆、海、河、港这些地域要素组合十分有利于珠三角与港澳的贸易交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每年珠

三角进出口贸易的 80% 左右来自港澳。珠三角应进一步利用港澳的窗口作用,通过香港这个大转口贸易港来出口产品,增收创汇。

珠三角各级政府应将对港澳关系提到一个高的层次予以重视,在制定各个大大小小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对港澳关系要进行充分考虑与研究,随着 1997 年和 1999 年香港澳门回归日期的临近,香港将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存在。那时港澳与珠三角的交往联系将更加方便,更加频繁,各级政府宜未雨绸缪,超前规划,研究制定未来对港澳策略与措施,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这样到时才能应对自如,处变不惊。

综上所述,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应是流域发展模式与海洋发展模式的有机结合,同时又应当具有自己独有的地方特色,珠三角的发展优势是明显的。广东省政府在全国率先提出了“20 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宏伟目标,广州市政府也制定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锦绣蓝图,珠三角作为广东省和全国的先进发达地区,完全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只要我们按照既定策略一步一步实施,可以想见,珠三角必将成为珠江流域的“龙头”,太平洋彼岸的一颗耀眼新星。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资源与城市规划系
责任编辑: 郑英隆

哲学与经济学

——研究经济学的一点体会

□ 张 井

哲学永远繁荣

有人说，现在是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我却认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哲学都不会贫困，而很富有。只要经济学和其它科学繁荣，哲学也一定是繁荣的。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的繁荣，并不表现在报刊文章的篇数、专著的本数和讲课的节数上，而是隐形于运用中。哲学之富有，表现在它蕴藏着无限智慧源泉，对于渴求而又理解它的人们是无限量供给的。它的抽象，即一般本质，无限深邃广袤；它的具体，即特殊现象，却又无比丰姿多彩。无论深邃广袤，还是丰姿多彩，经济学都无法与之比拟。经济学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和每一个国度中所认识的经济原理都相对地贫困，更不要说由斯大林建立的计划经济学只有几块没有生命力的骸骨。经济学只有依靠正确哲学的驾驭才能远征，开辟从有限走向无限的道路。君不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仅仅十数年，经济学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就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到计划和市场都覆盖全社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也许有同志说，许多出色的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的经济学家，并不认识和掌握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而在经济学的发展上却很有成就。这确是事实，但他们是在前人科学理论指导和自己带有盲目性的实践中探索，迂回曲折地接触到真理的，而且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往往有局限性，常常留下了许多属于特殊性的缺陷。例如对于“市场经济”，

他们虽然已经实行和研究了近400年，但是对于“市场经济”概念的内涵，还与私有制紧紧联系起来，即限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理论上的陷阱。这个错误终于由懂得一般与特殊这个辩证法精髓的马克思主义者来纠正。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不姓“资”，也不姓“社”，它的特殊性才区分姓“资”姓“社”。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研究，被禁锢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牢笼中，只有我们才懂得将它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领域。

一般和特殊的对立统一 是研究经济学的金钥匙

我在经济学研究中，深深体会到一般和特殊这对哲学范畴的重要指导作用。我把它称作研究经济学的金钥匙。列宁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①既然一般和特殊相联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当然也存在于一切经济范畴、经济规律和经济运行机制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经济学的一般性与生产力、社会分工等相联系，特殊性则与所有制、生产关系、阶级、社会形态等相联系。

经济学本身（一般）没有阶级性， 经济学论著（特殊）才有阶级性

传统的教科书，笼统地、抽象地说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这有悖于一般与特殊对立统一的原理，也有悖于管理两重性的原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应作具体分析。它作为一门科学，其任务是揭示和寻求经济规律。而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人、任何社会集团、任何阶段和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是没有阶级性的。但为不同阶级服务的经济学家，从维护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对于经济理论，用不同思维方式理解，用不同语言阐述，而且务求它对本阶级有利，于是形成了不同阶级的学派，甚至同一阶级的不同社会集团的学派。所以经济学家是分阶级的，各种经济学的论著和观点是有阶级性。这就是经济学的特殊性。正因为经济学的一般与特殊的对立统一，无阶级性与有阶级性的对立统一，所以不同经济学派之间才既互相批判又互相借鉴继承，使经济学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既批判又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建起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他们肯定和继承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对剩余价值来源及其具体形式的研究成果，吸取了斯密等人的经济思想，受到了魁奈《经济表》及其中运用科学抽象法的启示，创建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并确立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性的表现）逐渐取代了古典经济学而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流。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剥离了其资产阶级性的表皮，吸取了其中无阶级性的一般真理，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深刻研究了商品及其规律的理论基础，这是一般性，又深刻研究了它在资本主义前期的特殊表现。但没有预见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的社会，所以没有研究商品及其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也没有研究商品

及其规律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表现。西方现代经济学，虽然是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但它广泛地研究了商品及其规律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其中有特殊性也有一般性。我们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扬弃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特殊性，吸取其对商品市场及其规律在现代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条件下一般表现的研究成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卓炯根据马克思商品一般与特殊理论，最早得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结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教导人们要运用一般和特殊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商品，他说：“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②马克思在这里，如果不仅分析过去，而且也分析未来，就会说出社会主义商品了。但非常遗憾他没有说出这句话。而把这句未明说出的话，留给后世通过实践和辩争去回答，又遗憾的是后世极少有人注意研究老祖宗的这段话。

最早注意研究马克思这段话的是经济学家卓炯，并最早由此作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判断。卓炯1961年就在文章中说：社会分工决定商品一般，即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所有制决定商品特殊，即商品经济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存在社会分工，也就存在商品经济。自此，他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随后于1979年初进而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命题。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体现商品经济的一般与特殊，但未解决市场经济的一般与特殊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

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确认了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论断体现了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因而在经济理论上是个大突破,从而改写了政治经济学,大大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但仍未解决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只看到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特殊性。因此可以认为,有计划商品经济仍然是计划经济,只不过突破了同商品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决定》说:“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决定》说到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时(这是完全正确的),却说“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这些资源不是商品,就没有市场体系,市场就不能对资源起配置作用,也就不是市场经济。《决定》只确认商品经济而不承认市场经济,相反,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致的,均与计划经济对立。《决定》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统一起来,而又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所以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我国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强调市场作用观点的同志,认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基础是商品经济,计划只是调节手段,所以改革应当以市场取向;强调计划作用观点的同志,则认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基础在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只是手段,所以改革应当坚持计划经济。这场论争实质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论争,随后发展到批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一般不姓“资”姓“社”,

• 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扬弃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关于资本主义通过教育感化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空想,建立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恩格斯1880年出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说的是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世界上多个国家根据这个理论进行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其目的是为了富裕,但实际却是贫困。由此看来,渊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第二次实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市场经济特殊则分姓“资”姓“社”

邓小平同志从1979年11月开始,至1992年初南巡,多次提出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要实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服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把握住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和特殊的统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适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分开来。党的十四大根据这个指导思想,作出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政策。党中央这两个文件,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和特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同,框架基本一样,方法也相似,这就是一般性。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主要“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强调兼顾公平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政策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次飞跃,第二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生产与流通关系的主导方面随市场发育程度而转化

我是从卓炯运用一般和特殊研究商品经济中得到启发,也尝试着运用这对哲学范畴来研究经济问题的。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

意到我十多年来发表的 300 多篇经济论文，常常出现这对哲学范畴。触类旁通，我还运用其他哲学原理来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最初是在生产与流通这对矛盾中，我不赞成“生产决定流通”这种抽象的、固定的观点。我认为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随时间、地点和条件而转化的。这个条件主要是市场的发育程度。当市场不发达，又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格局时期，诚然是生产决定流通的。当市场发育起来。供求基本平衡，生产和流通就同样重要。又当市场发育良好，出现了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就变成流通决定生产了。继而在生产导向上，由资源导向还是由市场导向，矛盾的主要方面，也随着市场发育程度而转化。当市场发育不良，应是资源导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市场比较发育时，就应市场导向，向市场索取一切，向市场贡献一切。

市场第一性，计划第二性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我不赞成“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也不赞成“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而认为市场是客观的，必然的，是哲学基本问题上称之为第一性的方面；计划是主观的，是第二性的方面。计划只能反映和依据市场，认识和运用市场规律，才能实现市场平衡，这时才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相反，把计划作为第一性，凌驾于市场，脱离市场，胡乱拨动市场，就必然走向计划的反面，造成经济混乱失衡。所以我在 1988 年 4 月发表的《“鲁侯养鸟”，还是“小鸟天堂”》的趣文中，非常羡慕广东新会“小鸟天堂”的小鸟，天高任鸟飞，河涌的鱼仔虾毛任鸟吃，不论飞多高多远，总要回到“小鸟天堂”的七亩古榕上栖息。我又讥笑鲁侯的愚蠢，把捉来的一只神鸟关在太庙里，用三牲祭祀，奏《九韶》聒耳，吓得神鸟在金做或银做的笼子里乱跳乱撞，不几天就死了。我既然认为市场是第一性的，计划是第二性的，自然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我在 1988 年 1 月，正式公开发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专论。这篇论文的标题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其基本论点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性不姓“资”不姓“社”，特殊性则有姓“资”姓“社”之分。市场经济是富裕的发展的经济，它从无宏观调控发展到有宏观调控，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则是从空想开始到贫穷告终。

我从一般与特殊关系认识市场经济

我对“市场经济”概念的认识是有改变的。从我发表的第一篇市场经济论文，标题叫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可以看出，我最初认为商品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只是商品经济从生产形式而言，市场经济是从资源配置方式而言；商品经济是相对产品经济而言，市场经济是相对统制（计划）经济而言。后来领悟到这种认识不完善，改而认为商品经济发展到各种资源也进入市场，形成了市场体系，市场不仅对实物商品和服务供求起调节作用，而且能够对资源配置起调节作用，才成为市场经济。

“白马非马”与“哈巴狗是狗”

统一，可以解开许多经济学之谜

我国古代思想家公孙龙提出了“白马非马”的命题。它的宝贵价值在于揭示了事物存在一般和特殊，“马”是一般，“白马”是特殊，不可能把二者等同起来，这是对的。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这是逻辑学上一个大发现。但它的错误是只知道特殊和一般的区别，而不懂得特殊和一般的联系，白马也是马之一种。无独有偶，二千多年后的列宁，谈到辩证法时，说研究问题要从最简单的命题，诸如“哈巴狗是狗”开始。③哈巴狗是狗的特殊，狗是哈巴狗的一般。狗包括了哈巴狗，自然哈巴狗也是狗，而不是猫或别的，这个命题说的是特殊和一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就全面了。经济学的范畴、规律和机制，特别是它们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

现代企业的发展与管理革命

□周小知

种社会形态中,是否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问题,常常遇到“白马”、“哈巴狗”和“马”、“狗”之类的迷惑,把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和发挥作用的共同属性,比作“马”或“狗”;而把它们存在于某种社会形态及其作用形式,比作“白马”或“哈巴狗”。例如“资本”这个概念。资本是用来增殖的货币,也可叫做“本金”或“本钱”、“母金”。所以马克思说“ $G-W-G'$ ”是资本总公式。它是“马”或“狗”,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但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呈现不同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要货币增殖,则必须使它成为剥削工人的手段。这种形式,比方叫做“黑马”或“狼狗”;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把货币投入能够增殖的生产和经营,这种货币也是资本,比方说它是“白马”或“哈巴狗”。按照列宁的命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用来增殖的货币都是资本,没有必要把社会主义的资本忌讳叫作“资金”。但按照公孙龙的命题,社会主义的资本不是资本,只能叫做“资金”。照此逻辑推理,既然“白马非马”,“黑马”也非马,资本主义用作剥削工人手段的货币也不能叫做资本。这么说来“马”和“资本”之类统统子虚乌有。公孙龙先生只得自己掌自己的嘴巴了。同理,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剩余价值、劳动力商品等等“白马”或“哈巴狗”,都是“马”或“狗”。

我在这里如此高谈阔论哲学与经济学,不是为了讲哲学,也不是为了讲经济学,而是为了说明哲学对经济学的基础和指导作用,尤其一般和特殊这对范畴是一把金钥匙,用好它,会继续打开许多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机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否存在与异同的斯芬克思之谜。

①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

②《资本论》第1卷第133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近年来,现代企业越来越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这不仅由于现代企业在世界经济中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现代企业制度带来的高效率也格外引人注目。

现代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通常来说,只有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高的生产率,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企业或公司。现代企业的产生主要是通过企业兼并收购其它企业而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说过,美国的现代大型企业没有一个不是通过兼并收购其它企业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把以前几个企业的活动及其相互交易内部化了。这种内部化给现代企业带来了许多好处。由于原来企业之间的交易内部化,交易成本就降低了。由于生产单位和采

购及分配单位的管理连在一起,获得市场和供应来源信息的成本也降低。最主要的是,多单位的内部化使商品自一单位到其它单位的流量得以在管理上进行协调。对商品流量的有效安排,可使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使用的设备和人员得到更好的利用,从而得以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这种协调所造成的节约,要比降低信息和交易的成本所造成的节约大得多。

现代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管理层级制度的建立。传统企业的活动是由市场机制所控制或协调的,而现代企业内生产和分配单位则由中层经理人员控制和协调。如果没有这些经理人员的存在,多单位组成的企业只不过是一些自主营业单位的联合体而已。建立此种联合体是为了控制各单位间的竞争,确保企业的原材料,确保成本和服务的销路。各个自主单位的所有者共同采购、定价、确定生产和市场政策。如果没有经理人员,这些政策则由立法和仲裁机构所决定并实施。这种联合体通常可以稍微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便不能由生产率的提高来降低成本,它们无法提高管理协调的功能,因而,这种功能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功能。

现代企业的产生,完全是在政府宏观政策指导下的一种市场调节的企业行为,行政意义上的“拉郎配”和“乱点鸳鸯谱”而撮合的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它也不能带来各企业单位交易内部化而产生的效益。从理论上讲,现代企业只有当经济活动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协调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图时,才首先在历史上出现。按一般逻辑,经济活动量的增加总是伴随着新技术的运用和市场的扩大。新技术使前所未有的产品的产出和运转成为可能。扩大市场则是吸收此种产出所必不可少的。通常来说,现代企业首先在这些部门和工业中出现和成长,它们具有新的先进技术,而且具有不断扩大的市场。相反,在那些技术并不能造成产出的急剧增加,市场依然是小而专的部门和工业中,管理的协调并不比市场的协调更为有利,因而在这些领域现代企业就发展较晚,发展较

慢。

现代企业的发展是现代经济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直到1890年,马歇尔还可以把企业的生命史比作婴儿高死亡率时期的人类生命史:企业作为一项小小的风险事业兴办起来,如果在最初几年能站住脚,那么,就会扩展或成长,其速度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如果企业家本人或他的子女们能力超群,它就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最终会衰落并走向死亡,可以推测整个过程通常经历一代人或两代人,没有理由怀疑在现代企业以前这一画面的现实性。但是,这一关于企业成长拟人化理论,已不再适应现代企业了。在现代企业中,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利和持续成长的源泉。用韦尔纳·桑巴特的话来说,现代企业开始具有了“其本身的生命”。传统企业是短命的,几乎全是合伙生意,其中一个合伙人退休或去世,就得重新结伙或解散,如果儿子继承父亲的产业,他会找新的合伙人。通常这种合伙制若有其中一人决定与其他生意人合作时,就会散伙。而在现代企业中,经理人员的层级制却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它超越了工作于其间的企业或集团的限制。当一名经理去世或退休、升职或高迁时,另一个已作好准备,他已受过接管该职业的培训。因而,人员虽有进有出,其机构和职能却保持不变。

现代企业的兴起使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新的内容,这为企业管理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企业兴起之前,老板管理公司,管理者即为老板。即使是合伙关系,其资本股权还是为少数个人或家族所控制。这些公司依然是单一单位的企业,极少雇用两三个以上的经理,因此传统的资本主义公司称这为个人企业并不为过。但是,现代企业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家庭或其合伙人所能提供的经理人员就不能满足需要了。在现代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家族式企业和金融式企业。所谓家族式企业,是指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

与经理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层人员选拔方面。所谓金融式企业是指企业相当一部分决策权由银行家所控制。当企业的创立和发展需要大量外来资金时,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所不同。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通常在公司董事会上派有兼职代表。在这种企业里,经理人员必须和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派出的代表分享高层的管理的决策权,尤其是在大笔资金的筹集和动用方面更是如此。然而,在现代企业中,企业既不是由银行家也不是由家族所控制,所有权变得极为分散。股东并不具备参与高层管理的影响力、知识、经验和义务,中层经理人员既管理经营活动,也决定长远政策,在这种企业中,经理人员的技术性、专业性、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由经理人员控制的企业我们称之为经理式企业,它是现代企业的基本形式。随着家族式企业和金融式企业在规模和厂龄方面的增长,他们就会变成经理式企业。除非所有者和金融机构的代表成了该企业的专职经理,否则,他们不具备在高层决策中起支配作用所需要的信息、时间和经验,作为董事会成员,他们诚然具有否决权。他们可以否决,可以用其它职业经理取代高层经理,但很少能提出正面的可供选择的方案。到最后在董事会兼职的所有者和银行家和公司的关系也等同于一般的股东了,公司只是其收入来源,而不是可管理的企业。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他们仍把日常的经营管理和未来的计划工作交由职业管理经理负责。

在现代企业中一个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代理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理人员没有完全掌握企业的股权,就存在代理问题。如果一个企业由一个人所有并独自经营,我们可以推断此人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增加自己的福利,一般是增加自己的财富。如果这个业主企业改成股权分散的现代企业,潜在的利益冲突就会出现,这个业主(假设是公司的经理)可能会不再象过去那样去拚死拚

活地增加股东财富,而是要过一种轻松一点的生活,因为他现在不再是唯一的股东了,挣来的利润要和其他股东共同分享;他也许会用公司的钱追求更多的个人享受,因为由此而增加的费用是由全体股东分担的。怎样解决代理问题?在西方已有许多经验,如用公司的股票作为经理人员的报酬,经理人员的股票选择权(即允许经理以固定价格购买公司的股票)、表现股份(即按照每股收益、资产收益率及股本收益率等指标所反映的工作成绩而奖给经理的股份)、以利润为基础的奖金等等。这些经理报酬与公司经营业绩挂钩的办法有效地激励了经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但是,在实践中,经理人员还要受到解雇的威胁和公司被收购的威胁。如果经理不尽力为公司工作,公司效益每况愈下,股东回报较少,公司股票价格就会下跌,经理很有可能被股东大会罢免;与此同时,经理人员不卖力工作,公司经营不善,公司股票价格很低,很容易被别的企业进行兼并和收购,这样,经理人员不是俯首贴耳,就要被迫异走他乡,再也没有参与经营决策的权利。在这种激励和约束双重力量的鞭策下,经理人员还是会以企业发展和企业财富的增长为最大化目标的。

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明确产权关系是基本前提,事实上,只要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对企业来说产权就相当明确了,谁出资购买了多少股份,谁就拥有多少产权。但是,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笔者认为关键是培育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一支支薪经理式的企业家队伍。在我国目前的股份公司中,许多公司经理素质差,管理水平低,没有职业化,往往与行政级别套级;与此同时,对公司经理既无激励机制又无约束机制,更不存在竞争的压力,董事长或总经理许多是由政府安排,也是铁交椅,搞终身制,从而,产生了许多无效率。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经理控制”与 国有企业自主经营

□王新新

一、国有企业具备实行经理控制的 条件吗？

我们先来分析“经理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公司控制”问题时，依据股票分散程度（用个人或机构的股票持有比例来衡量）划分公司控制的类型。一家公司一定比例（关键控股百分比）以上的股份被个人或某集团拥有，就被认为是所有者控制；在这个比例以下，被认为是经理控制。在早期的研究中，这个比例是20%，现在由于股票更趋分散，该比例降为5%。

在国外的一些公司中，由于股票发行极为分散，以至于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拥有的股票能够达到关键控股百分比。由此便出现了“权力真空”，使经理得以“趁虚而入”，独立支配法人财产，形成经理控制。例如，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东达200万，股票总数为4亿股，没有任何股东持有公司1%的股票，这种情况导致了经理控制。

这种股票极为分散的状况在我国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国有企业改制是以保持国有制为条件的，国家仍要保留最大股东或起码是最大股东之一的地位。因此国有股不可能分散到不起控股作用的程度。所以，国有企业根本不具备实行经理控制从而实现企业自主经营的条件。

我们再来分析日本的“法人资本主义”。在日本，一些大公司通过一种与美国不同的

方法实现了经理控制，即通过公司间的“互相持股”。国内有人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通过法人相互持股使股权多元化、分散化之后，就可以削弱最终所有者的控制，形成经营者集团控制企业的格局，真正实现企业自主经营”。要了解这种思路是否可行，首先必须把日本大公司的经理控制的机理及其实现条件弄清楚。

根据日本经济学家奥村宏（1983）的解释：“如果公司一方持股成为其他公司的大股东，比如说A公司成了B公司的大股东，则B公司所有的资产，其所有权就属于A公司大股东a氏的了。也许可以认为是所谓的最终的所有者。但是若互相持股，B公司的资产成了A公司的，A公司又成为B公司的，这样形成循环状态，到头来见不到究竟谁是最后的所有者。”这样，最终只能由经营者控制公司，使公司独立于最终所有者。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经理控制的机理和实现条件是不同所有者的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正是不同所有者的相互持股才导致了所有权的相互抵销和最终所有者的模糊，从而凸现了经理的作用，形成经理控制。然而，在我国，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因为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只有一个即国家。因此，无论企业间怎样相互持股，其最终所有者始终是清晰的，就是国家。不同所有者之间的控

制力可以相互抵销,同一个所有者的控制力如何抵销?

上述分析表明,“经理控制”的企业模式,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我国国有企业都无法借鉴。

应当指出,上述对经理资本主义的分析还是依据旧的分析方法即依据股票分散程度,也就是股东持股百分比进行的,然而,随着实践发展和研究的深入,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仅仅依据股权分散化分析公司控制问题已远远不够了。还必须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果按照这种新的分析方法,那么所谓经理控制是否存在都是大可怀疑的,从而国有企业的借鉴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经理控制还是所有者控制?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通过介绍国外学者对公司控制问题研究的新成果来说明我国国有企业能否借鉴经理控制。

A·D 科什和 A·休斯(1987)认为,在对有关公司控制问题的研究上,旧方法的缺点在于,“它集中于讨论股权的分散化,基本上排除了有关公司控制其它方面的分析。”在他们看来,起码还有以下几个因素不能忽视:第一,董事会的组成,包括经理董事和非经理董事的分布以及公司间互兼董事;第二,作为股份持有者的董事和金融机构;第三,董事和经理的报酬构成。

关于第一点。二位学者通过对 54 个样本公司(英国公司和美国公司各半)的分析表明:首先,在美国公司的董事会中,非经理董事占 2/3;在英国公司中非经理董事占 1/3(后者比例虽较低,但英国已开始强调提高非经理董事对经理董事的比例)。这样,在董事会中就可能形成非经理董事对经理董事的制约。其次,大公司之间还广泛地存在着互兼董事的现象,在样本公司中,与其他公司互相兼任的董事平均每家美国公司有 8 名,英国公司有 6 名,这些外部董事的存在也会加强对经理的制约。

关于第二点。二位学者分析了三方面问题:(1)董事作为其所在公司中的股票持有者的重要性如何;(2)金融机构作为股票持有者,在公司的重要性如何;(3)社会机构

(包括金融机构)持有公司的股票与该机构兼任公司董事之间的联系程度有多大。

对于(1),经理资本主义学派的主要见解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司股份持有日益分散,而在这个分散过程中,董事会本身就不再是公司股份的最大拥有者,所以经理能够“反仆为主”。然而,二位学者提供的样本材料却表明,在美国的样本公司中,最大股东拥有 5.1%的股份,而董事会控制的该公司的全部股份占 8%以上。考虑到前面说过某个集团控制 5%以上的股份就可以实现所有者控制,那么显然,董事会控制 8%的股份能够实现对公司的控制。

对于(2),二位学者认为金融机构持股占有压倒的重要性。虽然在 54 个样本公司中很少有单个金融机构持股占 5%以上者。但是,持有样本公司股份 $\geq 1\%$ 的金融机构数量却非常多。在 27 个英国样本公司中,这样的金融机构有 201 个;在 27 个美国样本公司中有 224 个。这些金融机构合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股份拥有者集团,平均每家英国样本公司股份被这些金融机构拥有了 10.9%;美国的相应比例达 14.8%。当然,由于持有某一公司股份的金融机构数量较多,它们若有效地联合行动将花费较多费用,因此,它们通常只是通过出卖股票来影响公司的经营者。但是,有关此问题的另一项研究表明,这些金融机构有时也确实会联合起来对公司经营采取干涉行动,尤其当它们拥有某个公司的股票数量相当大时,就更倾向于采取行动。因此,在研究公司控制问题时,金融机构持股状况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上述内容还只是分析了金融机构在董事会外持股。二位学者在(3)中又进一步分析了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社会机构作为持股者与其在相应公司中兼任董事之间的联系程度。在美国,拥有样本公司 0.2%以上股份的社会机构,平均每 2—3 个中就有 1 个拥有公司董事职位。这样,社会机构对公司的控制就不仅存在于董事会之外,而且进入董事会内部,这也加强了所有者对公司

的控制,形成对经理控制的挑战。

关于第三点。经理资本主义的一个观点是,由于股票分散化,每个董事持有股份的百分比比较小,因此没有动力作为所有者发挥作用,结果使经理人员填补了“权力真空”。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上述两点所说的非经理董事多于经理董事和董事会拥有股票的状况对于实现所有者控制来说并无多大意义。然而正如A·D科什和A·休斯(1987)所言:“从动机的观点看,把焦点集中于拥有的百分比可能使人误解,因为巨大总数中的较小百分比也可能代表相当大的财富。”因此,持有股份百分比小的董事仍然有关心公司经营、维护自己权益的激励。这一观点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新分析方法特征,从而使我们认识到,旧的方法仅从持股百分比小就得出持有者不关心公司经营的结论有失偏颇。

另一方面,二位学者还注意到许多高级经理或经理董事已不是单纯的工薪领取者,他们同时还是股票拥有者。样本分析表明,美国公司的经理董事中17.5%的人由于拥有本公司股票而成为百万富翁。如果包括股票购买期权在内,这个比例上升到33%。很难认为这些人是与股权利益无关的、没有财产的专业经理人员。

总之,如果不是仅仅依据股权分散化程度,而是考虑到上述因素来分析公司控制,那么,所谓法人财产权独立和经理控制是否存在就很值得怀疑了。起码,这个问题尚是经济学界争论很激烈的问题,远没有定论。

既然如此,我国国有企业又怎么能参照一个连是否存在都值得怀疑的企业控制模式进行改革呢?这岂不是太不牢靠吗!

至于以相互持股为特征的“法人资本主义”,根据最新研究表明,它已经走到尽头。奥村宏近年来已经指出这种体制的弊端——无法追究经营者的责任。“之所以难以追究经营者的责任,是因为在法人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经营者代表法人,相互持股导致相互依存、相互串通,如果谁追究对方的责任,自己就会挨对方整。正是这种不负责任的经营造成了盲目经营和竞争。结果是在企业受挫时没有人承担责任,或者恣意地把责任推诿于某个人。……当这种不负责任的经营和没有追究责任的制度发展到极限时,就会出现内讧和混乱,它表明以往的法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1993)既然如此,国有企业改革还能象一些人鼓吹的那样,借鉴法人资本主义的相互持股的企业制度吗?答案是显而易见了。

参考文献:

吴家骏《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考》《经济日报》,1994年1月7日。

奥村宏《法人资本主义》(中文版)北京三联书店。《大企业病开始腐蚀公司组织的中枢》。《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NO.4。

A·D科什和A·休斯《公司控制剖析》《剑桥经济学杂志》1987年NO.12。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国有企业代理阶层激励问题初探

□黄群慧 张艳丽

这里所谓国有企业代理阶层,是指国有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尤其是指以公司形式存在的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虽然从严格法律意义而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是信任托管关系,而董事会与经理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别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两种角色。但对国有企业而言,由于不存在最大私人财产所有者,无论董事长还是总经理,都是国有资产代理经营者,只是管理决策分工不同。因此,我们将其统称为国有企业代理阶层。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他们既不同于一般的员工,也不同于领导干部阶层,他们是有独立利益的一个集团。

关于代理阶层激励问题的研究,现在最为流行和活跃的是西方企业理论,尤其是代理理论的应用和发展。西方代理理论非常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分析认识我国国有企业代理阶层的激励问题,但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本文从行为科学激励理论这一新角度出发,针对我国国有企业代理阶层“激励空位”问题,给出了填补“空位”的四方面建议。

一、代理阶层激励问题存在的条件

代理阶层的激励作为问题存在隐含着以下条件。(1)广泛存在的不同经济主体的委托代理关系。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精细,每个经济主体都基于自己的技能及兴趣选择自己的专业,享受由此

而产生的“分工效果”和“规模效果”。但由于经济主体本身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为了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求就必须委托他人为自己服务,广泛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因此而存在。(2)如果代理人完全忠实于委托人,二者的目标利益一致,则不存在激励问题。但实际中由于经济主体的利己动机,使相互交往的经济个体目标和利益互不一致,委托人必须通过一定机制约束和诱导代理人行为,使其忠实服务于自己,因而产生了激励问题。(3)虽然委托者与代理者利益不一致,但如果委托方对代理方的行为能完全控制,使其不能够偏离自己的利益,则也不存在激励问题。但实际情况是由于代理方掌握的许多信息往往不被委托方掌握,而且也无法得到验证,代理方的许多行为或决策也无法被观察和监督(这在西方企业理论中分别被称为“私有信息”和“不能观投入”),这就使得委托方完全控制代理方成为不可能。因而,必须提供适当的激励,诱导真实信息,刺激适当行为,激励问题于是存在。

基于上述代理阶层的激励问题存在的条件,所谓代理阶层的激励问题实质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代理阶层积极性,使其按照委托者的价值和目标采取行动。因此,理想的激励效果应是充分发挥代理者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完全以委托者的目标和价值为导向的行为结果。从企业角度分析,当具备企业经营才能的经营者又是企业完全所有者

时企业效果会达到最优。但实际上由于代理关系的普遍存在,企业经营者往往不是企业完全所有者,因而积极性不高,可能发生渎职行为,企业效果就低于上述最优企业效果,二者之差就是代理成本或代理费用。所谓代理成本是指由于经理人员牺牲股东利益、追求自己最大化利益而引起的所有者利益损失。因而从这个角度说,代理阶层激励的目的在于减少代理成本,当代理成本为零时就达到了理想的激励效果。

二、代理成本的降低机制

沿着上述代理阶层激励目的在于减少代理成本的思路,西方企业理论针对激励问题归纳出两方面代理成本降低机制,一是外部机制,二是内部机制。外部降低机制是指通过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经理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如兼并)等市场机制对代理阶层行为进行反映、监督和约束,以及法律法规(如公司法)对代理阶层行为的约束。而内部降低机制则是在企业内部设计一系列规则,明确代理人的责权利,约束和诱导其行为,使其行为目标趋同于委托人的目标。对应这两类机制,存在两类代理费用降低措施,第一是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及法律体系,第二是围绕“剩余占有”建立各种使代理人和委托人利益趋同的激励规则。下面我们针对第二类措施展开论述。

“剩余占有”或“剩余索取”一般是用以描述所有者对企业最终成果净剩余的占有或支配权,也就是占有或支配利润的权力。如果经营者同时又是剩余占有者,则经营者为了得到最大剩余,会尽最大努力对企业负责。因而西方企业理论最重要的激励原则是让某一主体占有经营剩余并责成他对经营管理负全部责任。在这种原则指导下,“剩余占有”激励规则主要是围绕利润分享而展开,具体激励手段包括(1)高报酬制度。这项制度是将代理阶层的薪金提高到他们在其它地方能得到的薪金之上,使其解雇造成的薪金损失大于未来其它职位收入的现值。代理经营者为了避免失去职位而造成自己的巨大损失,其行为必须让所有者满意。但这项制度也有其局限性,由于更换

经营者也需要付出代价,只要不是非常令所有者不满意,经营者是不可能经常被更换的,于是这项制度的约束力也就淡化,而且高薪一旦成为固定收入,也就失去激励作用。(2)高奖励制度。所有者根据经营者业绩拿出一笔资金对经营者进行奖励。但奖励往往是据公司当年利润进行的提成,这样会激励经营者决策行为的短期化。(3)股票配给制度。为了使代理者与所有者利益趋于一致,还可将代理阶层报酬的一部分以本公司股票形式支付。但这又容易诱导经营者股市投资动机及过于重视股利而导致企业短期化。(4)股票期权制度。这是一项激励经营者关注公司长远发展的制度。所谓股票期权是授予经营者以现在的市场水平购买一段时间(如10年)以后的公司股票的权利。这样,如果未来公司股价上涨,经营者就可赚得现价与以后股价的差价。这样就激励经营人员努力工作,增加企业效益而使股价升高,从而使自己财富最大化,股东也因此受益。但由于信息不完全和股市投机,使公司绩效与其股价之间没有必然关联,这就使得股票期权制度也很难保证企业行为长期化。

三、我国国有企业代理阶层“激励空位”及其原因分析

以上是西方企业理论对代理阶层激励问题的一般分析,但就我国国有企业而言,我们认为存在对代理阶层约束软化、代理费用高的普遍问题,我国几乎不存在专门针对代理阶层的激励机制,我们称之为“激励空位”。这种国有企业代理阶层“激励空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1. 多层代理关系的存在。由于国家所有是全民所有的表现形式,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为全民,而国家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经营者都属于代理者,只是层次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存在着多层代理关系。在多层代理关系下,终极所有者几乎不可能对企业经营者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只能通过各层代理逐级发生作用,也就是说,所有者不能够对企业经营代理层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激励,多层代理关系下根本不存在所有者对企业代理阶层的直接激励机

制。如果说中央政府可以代表全民所有者利益,但各级地方政府及各类管理机构却有自己的独立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地方政府与企业代理阶层“合谋”对付中央政府现象的原因。多层代理还会造成信息传递的迟缓和失真,尤其是各级代理人具有虚报信息和隐藏信息的动机时,中央政府想获得完全真实的信息就很困难。由此使得中央政府不具备有效的对企业代理阶层的激励机制。总之,在多层代理关系下的国有企业,不存在全民所有者对代理阶层的激励机制,也不存在中央政府对代理阶层有效的激励机制,再加之地方政府有自己独立利益,最终导致国有企业代理阶层的“激励空位”。

2. 不存在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相应的市场机制。如上所述,代理成本的外部降低机制需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但我国市场体系还不成熟,国有企业代理者既受不到来自经理市场竞争的威胁,也不用担心自己的企业在产权市场上被兼并或破产,也无须顾忌资本市场上自己企业股价下跌而影响到自己的职位。也就是说,我国国有企业代理阶层激励存在着市场方面的“空位”。

3. 国有企业代理阶层的非独立化。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被认为是国家干部,不被认为是有自己利益的独立阶层,因而也就不存在针对代理阶层的激励机制。至于干部的奖惩、激励与任免是由党委及党的组织部门控制,衡量干部优劣的标准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最近几年的改革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逐渐开始以经营业绩来衡量企业经营人员,并设计了众多考核指标,但由于“私有信息”和“不能观投入”的大量存在,使考核指标对评价企业经营人员的参考价值不大。

四、“剩余占有”激励手段的局限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现在的问题应是西方企业理论中的代理成本降低机制是否对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代理阶层“激励空位”问题有借鉴意义。我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无疑围绕市场机制和法律规定建立的降低代理成本的外部机制是值得借鉴的。至于以“剩余占有”为核心的内部降低机制,我

们认为,对我国国有企业而言是有局限的,不适用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具体情况。

行为科学研究表明,所有的人的行为总是围绕着满足需求进行的,一种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是调动积极性的起点,激励过程是以未满足的需求开始的。经营者对企业的管理行为同样是为满足其某种需求。人的需求不仅有象马斯洛所划分的各种层次,还存在不同的形式,如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物质形式和精神形式等。只有满足某种形式的需求才能真正调动人的积极性。国外经营者努力经营企业主要是为了丰厚的报酬,即满足货币形式的需求,然后通过货币支出满足其它各种需求,因而高报酬成为国外企业广泛采用的激励手段。但高报酬制度对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是不适用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营者与一般职工报酬差别太大违背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则由于广范围的“职位消费”——一种非货币形式的需求。所谓“职位消费”是指经营者除货币报酬之外的按其职位所享受的待遇。我国国有企业代理人享受的“职位消费”是广范围的,包括高标准住房及豪华办公室、高级轿车、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现代通讯手段、公费旅游、公费吃喝、娱乐、各类实物礼品等涉及到人类衣食住行所有的各种形式的需求。而其货币收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支出的必要了。因此,“职位消费”成为国有企业代理阶层主要的行为动机,至于其货币收入多少对其行为影响并不很大。这里我们暂不讨论“职位消费”是否合理,是否属于腐败,但“职位消费”这种现实存在使国有企业代理阶层高报酬制度成为不必要。

至于从企业利润中提成作为奖给经营者的激励手段已被承包制证明并不成功。这种手段极大地诱导了企业的短期化行为,承包者为了使企业在承包期内达到利润最大而过度使用国有资产,使国有企业“内伤”严重。而借助股票市场约束力量发挥作用的股票配给制和股票期权制同样不可取,这不仅因为已提到的两种制度本身的缺点,还因为这两种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是将国有资产

转化为私有。

五、填补“激励空位”的四点结论

1. 加快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尤其是有效的经理市场的建立,在代理人之间引入了竞争机制,形成了由众多代理人竞争构成的代理人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激励机制。经理市场建立的另一方面意义在于通过代理人之间的横向比较,降低企业内部对代理人进行监督和绩效考核的费用。

2. 采用各种方式降低国有企业代理层次,强化所有者对代理人约束的动机,消除地方政府和企业代理人“合谋”的可能,增加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在具体操作上,可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思路,如对于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性行业(如能源、交通、邮政电信等)可由中央政府采用各种方式(国控、国营等)直接管理;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如城市自来水及煤气)可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而一般竞争性国有企业则改造为以盈利为目标的现代公司,引入产权交易市场及资本市场的兼并机制和破产机制,充分发挥股东所有者对企业代理人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双重约束机制。

3. 确认国有企业代理人的独立利益,围绕其需求设立激励机制。要想有效地填补国有企业代理阶层的“激励空位”,必须要确立代理人的独立地位,不能将其归属于一般职工或国家干部,要围绕其需求设立各类激励机制。在我国要解决“职位消费”问题困难很大,从降低改革成本角度出发,与其花力气解决“职位消费”,重新设置激励机制,不如利用“职位消费”,设置“职位消费”激励机制。“职位消费”在以前不具有激励作用,是由于把经营者归属为国家干部,即使经营业绩不佳,也不会被免掉职位,还会享受同样甚至更好的“职位消费”,如同“铁饭碗”一样,一旦“职位消费”固定,也就不具有激励作用了。但如果我们根据经营业绩确定给予或剥夺经营者的“职位消费”特权,就可化消极为积极,使“职位消费”成为激励因素。“职位消费”激励机制发生作

用的过程是,在界定不同企业规模及业绩可以享受的“职位消费”层次前提下,当企业经营绩效不好时,代理人将被罢免,同时失去一切“职位消费”特权,而那些非常成功的代理人则随着企业的发展享受层次逐渐提高的“职位消费”。这种“职位消费”激励机制有可能诱导代理人在经营期间从企业中非法掠取更多货币收入,以支付“职位消费”特权被剥夺后各类消费的需要的极端行为,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制约这种行为。

4. 建立国有企业代理阶层的内激激励机制。培养代理阶层的内激力。行为科学中的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认为,诸如工资、工作条件、职务保障等因素属于保健因素,这些方面的因素得不到满足只会使职员感到不满意,得到满足也不会有什么激励作用,而工作本身的成就、社会认可、发展前途、责任等因素才是真正的激励因素。这些因素的满足会使职员从内心产生努力工作的动机,即产生了内激力。内激和外激的区别在于外激仅是为了得到相应的报酬而被动地完成指定任务,不会有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内激则是出自内心地、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完成工作,最大可能地发挥个人技能,在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也就是马斯洛所说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国有企业代理阶层内激激励机制的建立及代理人内激力的大小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市场风险及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挑战;二是社会对代理人的尊重及其自身工作价值的认可程度;三是代理人积极探索价值观念的培养。企业经营环境越是动荡,市场风险越大,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挑战就越富有挑战性,成功后代理人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程度也就越高,从工作中得到的满足程度也就越高,内激力也就越大。而这个逻辑过程的展开是以经营者具有积极探索的价值观念为前提的。

作者单位:河北财经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90年代开始,广东经济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广东省政府最近制定了一系列规划和战略,明确了在今后保持广东经济高速、持续和稳定发展,必须依靠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必须大力加强科技力量和提高职工的技术素质和水平,加快技术进步。而增加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发挥专业化人力资本在广东经济增长中的加速作用,正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及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是为培养和发展专业性的科研及生产经营人力资源而进行的投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是为积累知识型资本、扩大生产能力而进行的生产性、经营性投资,是投在专业化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包括科研、教育及职工培训等在内的各种费用支出。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将形成知识型、技术型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这种资本具体表现为专业化劳动者体内的专业生产知识、技能、创意等,它将会产生投资收益递增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加速器。

专业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作用原理是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卢卡斯、舒尔茨等人揭示的。用这个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资本富有国家出口劳

动密集型产品的列昂节夫之谜。资本富有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由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生产的集约人力资本型产品,其具有较

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自从发展经济学建立以来,投资的均质性和收益递减性成了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默认的理论前提。而投资的异质性问题常常被忽视。舒尔茨教授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资本投资的异质性理论,揭示了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物质资本投资的异质特征,从而建立了系统化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二、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及特征

(一)以庞大人口基数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来源具有很大的扩容性

人力资本的数量可以用抽象化的具有一定质量的劳动者数量来体现。劳动者数量是以人口数量为基础的。广东是我国第五人口大省,目前正处于人口出生高峰期,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另外由于本地经济发展快,劳动参与程度高,外地流入的劳动量大增,致使广东人力资本的扩容性很大,从业人员数量连年高速增长。增加的劳动资源从业方向偏重于城镇,导致城镇从业人数有较快的增长,1991-1993年,广东的城镇和乡村年末劳动资源总数年均

分别增长5.35%和5.76%,而社会劳动者总数则年均增长5.92%和1.32%。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从农业中释放出来

论广东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

□黄德鸿 黄和平

的劳动力转入城镇就业,既增加了城镇人力资本资源总量,也改变了城镇人力资本结构,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二) 专业化人力资本比重小,素质较差,结构偏差大

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除了需要进行专业投资外,在一定程度上还与社会习俗及文化的形成相关,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由于各地域内历史及文化传统不同,专业化人力资本常常带有区域集中性特色,形成不同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构成结构和分布结构。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总量和结构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专业化人力资本总量不足,素质偏低

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广东的科技力量、职工文化素质是偏低的。这与广东高速增长的经济不相称。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广东第一产业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35.3%,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占64.7%;受过专业化劳动培训的专业化劳动力仅占全部劳动者的5.1%,其他94.9%均为非专业化人力资源。专业技术人员十分缺乏。1990年,广东每万名职工中科技人员仅1391名,其中工程技术、农业技术人员443名,教学科研人员380名,经济管理人员324名。1993年虽有增长,但万名职工中科技人员也仅为1705名,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四小龙”水平。造成专业化人力资本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见表1。

从表1的数字可以看出,1985年以来广东人均GDP、人均总投资和人均教育经费、人均科技投资都在高速增长。但总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说明投资效率在递减。人均教育经费、人均科技活动筹集费绝对数很低,1991-1993年虽然数值增大,增长速度也接近人均GDP增长速度,但远低于人均总投资增长速度。这些数字表明,1985年以来,虽然广东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投资额急剧放大,人们生活水平在迅速提高,但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却没有跟上。社会总投资不仅没有向作为现代

经济增长加速器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倾斜,比重反而降低了。投入资金数量的不足使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缓慢,增长滞后。

2. 专业化人力资本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不平衡

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在各产业中的分布不平衡,专业化人力资本结构与现代经济增长结构、人力资本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偏差。

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专业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收益递增作用来说,提高制造业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制造业及农业等物质性生产部门专业化人力资本数量,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受外界环境和传统文化影响,广东人经商意识强,经商技能较高,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广东拥有数量更多、比重相对大的商业性专业化人力资本资源,而在工业和其他技术领域专业化人力资本比较少。人力资本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与现代经济增长要求有偏差。见表2。

表2的数字表明,广东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科技人员在各产业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在直接生产型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科技人员比重太低,特别是农业技术人员比重更小。全部农业技术人员只占全部科技人员的1.96%。1993年广东每万名职工中农业技术人员只剩31名,比1990年的42名减少11名。这说明在农业生产方面专业化人力资本有绝对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科技人员比重也不高,直接生产性的专业化工程技术人员只占全部科技人员的14.34%。直接物质生产部门,特别是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农业和现代工业部门专业化人力资本储量不足,直接影响着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效率递增作用的发挥,降低了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

3. 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职能结构不合理

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

率递增来自专业化人力资本使用的外部效应。在高人力资本环境下,生产经营过程中每一个技术层次上的人都有较高的生产率,从而使整个生产经营系统的生产效率成倍增长。专业化人力资本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生产链上最薄弱环节的生产效率,这种情况可用“木桶效应”(即木桶的容积取决于构成桶壁的最短的木条的高度)来解释。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职能结构是指专业化人力资本总额中执行管理、技术、生产等职能的人力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这个比例关系不合理,就会形成资本职能的薄弱环节,从而使人力资本投资效率递增过程的传递中断。目前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职能结构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是“强将无强兵”或“强兵无强将”。一些企业虽然具备了较强能力的经营型人力资本,但技术型人力资本缺乏。很多企业愿意出资培训经营管理人员,却不愿在专业技术人力资本方面投资,导致专业化经营型人力资本经营能力大于专业化技术型人力资本生产能力。由于技术工人缺乏及工人技术水平低,生产的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水平很难提高,现代管理和技术方法很难推广。专业化技术型人力资本成了经济增长“木桶”上的短木条,影响了整个资本投资效率的提高,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扩大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广东经济投资效率递增的对策

广东目前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量及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和文化的的原因,但主要取决于近年来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数量和投资结构。解决好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应从扩大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两方面入手。

(一) 扩大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总量

专业化人力资本是社会总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要增加专业化人力资本总量,一方面要扩大社会总投资量,另外还必须改变社会总资本投资结构,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比重。扩大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应做好下列两点:

第一,重新评价和认识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投资决策者增加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的自觉性。

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加速器作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的。在实际投资决策部门,重物不重人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人们对投资后能形成摸得着、看得见的“硬件”似乎特别感兴趣,而对提高资本内在潜质的“软件”投资不重视。因此,提高人们对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及作用的认识,使人们能重物又重人,是解决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不足的重要手段。广东省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在讨论和制定未来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时,已明确提出今后的经济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突破各种资源数量和经费条件的限制,用科技和知识的力量带动整个经济发展。这一战略思想和规划的提出,意味着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已经对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给予了极大重视。若此举真正得以贯彻和实施,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在整个社会投资中的比重将大大提高,资本总量会大幅度增长。但是要将规划付诸实践,还需有各种措施和手段的配合,使实际投资决策者认识到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从而把思想和规划的东西变成自觉自愿的行动。

第二 用好用活现有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在总资本投资中的比重,扩大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流量。

现有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的用好用活,是发挥专业化人力资本效率递增作用的重要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应对现有专业化人力资本进行评估、检查,按其特征和分类进行合理配置和使用。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在总资本投资中的比重,扩大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流量是解决专业化人力资本不足的主要手段。如前所述,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总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占总投资比重太小。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广东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如果说,广东经济前一发展阶段投资额的大部分用于基本建设中硬件方面还属必须的话,那么在今后

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投资结构就应有较明显的变化,应该把投资投向扩大内涵再生产的软件方面,即主要投在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如果广东能改变投资战略,使人均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达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初期水平,则凭借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率递增作用及专业化人力资本在继承和传递过程中的积累效应,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将得到缓解,20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可望靠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实现。

(二) 调整和优化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是指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中各组成部分的相互比例关系和技术经济联系。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可提高其使用效率。调整和优化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要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是广义产业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必须符合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要求,符合产业政策。近年来广东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带动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专业化人力资本结构的特征。从增长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速度方面看,目前广东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就业结构变化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增长结构变化的现象。即高度经济增长伴随着中度的产业结构向高级方向的转换,中度产业结构转换伴随着低度的就业结构向高级方向的转换。就业结构向高级方面转换滞后的状况不利于专业化人力资本效率递增作用的发挥。以上问题仅是从产业结构变动的大方面说的。如果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的深层次分析,问题则更为严重。投资结构变动是产业结构变动的深层次问题,而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又是投资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分析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会发现,近年来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方向并不完全符合广东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方向。其表现是流向被称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制造业以及经济增

长基础的农业部门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慢于流向一般行业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其结果是制造业及农业中专业化技术人才奇缺。制造业和农业等实物型产业专业化人力的缺乏与其资本投资不足有关。造成实物型产业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人们对经济增长中各产业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认识。

在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主要靠物质财富的增长,而物质财富的增长只能靠以制造业和农业等生产型行业的发展来实现。等量的资本如果过多地转化为纯粹商品流通费用,则物质生产部门获得的资本投资就会减少。而纯粹流通费用的增加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和投资效率,只是在增大社会交易费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分配上,则生产性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不足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更大的不良影响。结合广东的情况来看,广东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在商业界和实业界两部门分配上有倾向于前者的趋势,人们似乎更热衷于学习经商技术,愿意把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花在商业等流通部门,而对能带来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技术性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不感兴趣,而经商致富的观念则较为流行。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经商致富程度是不同的。如果说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初期大力发展商品流通,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促进经济增长还能有效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话,那么在市场障碍基本消除,简单流通技术已经普及并且商品流通环境和条件已大大改善后,再把大量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到简单商品流通领域,就只能增加纯粹流通费用和交易成本,造成这方面的过度竞争而不利于整体经济增长。在广东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大力增加专业生产技术型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补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技术缺口,抑制只能增加交易费用的纯粹流通费用的增长。

第二,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要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人力资本形成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作为一种资本投资,专业化

人力资本投资必须讲求投资效益。投资效益的获得除了要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外,还要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式。对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来说,由于它具有投资的外部经济效应和知识技术的扩散、渗透性,所以,投资的规模效益很显著。进行规模适中的专业化人力资本集中投资和训练,可以获得比分散型投资更大的收益。目前广东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还比较落后,其主要表现是投资分散,集中度小,很多投资单位并没有完整科学的人力资本投资计划。多数投资是

据临时的生产经营需要随机安排的。这种小商品生产经营式投资既不能获得专业化分工效益及规模效益,也不符合人力资本形成和成长规律。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是涉及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大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广东今后必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规划和设计符合省情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与人才培养战略,真正实现规划中提出的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加速技术进步,依靠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来实现经济高速高效增长的设想。

表 1. 广东近年来人均教育、科研投资及增长速度统计

	1985 年	1990 年	1993 年	增长速度 %	
				1986—1990	1991—1993
人均 GDP (元/人)	977.88	2356.33	4900.48	19.23	27.46
总投资额 (亿元)	184.59	372.59	1629.87	15.08	63.55
人均投资额	326.38	596.50	2476.40	12.82	60.72
人均教育投资	9.37	13.98	30.59	8.33	29.82
教育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	2.87	2.34	1.24	平均年递增 0.11 个百分点	平均年递减 0.37 个百分点
人均科技投资筹集费		23.93	46.48		24.77

资料来源: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局及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2. 1993 年广东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各产业分布统计 (%)

	工程技术	农业技术	教学科研	经济 财会 统计	其 他	合 计
第一产业	1.97	1.56	0.10	1.71	0.78	6.12
第二产业	14.34	0.05	0.32	7.18	3.46	25.35
第三产业	6.16	0.35	28.17	14.72	19.13	68.53
合计	22.47	1.96	28.59	23.61	23.37	100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1994 年,第 385 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企业管理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初级社：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制度渊源

□ 靳相木

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出现了新的势头，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显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甚至被视为当代中国农民继“包干到户”和乡镇企业的第三大创造。不过，当代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事实上，50年代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是新形势下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制度渊源。

一、初级社产权制度基本规定

初级社产权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年满16岁的男女劳动农民或能够参加合作社劳动的别的劳动者，自愿申请经社员大会批准，可成为合作社社员；社员的劳动归合作社统一使用，合作社对社员的劳动实行“按劳计酬、多劳多得”的报酬制度。第二，社员的土地仍归社员私有，但他必须将土地交给合作社统一使用；入社的土地参加合作社的收入分配。第三，合作社所需生产费用股份基金（种子、肥料、草料等生产性开支）和公有化股份基金（收买社员的耕畜、农具）一般由社员按入社的土地分摊；除应摊股份基金，社员还可向合作社投资，合作社须偿还该项投资并支付利息；社员退社的时候，可以带走还是他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可以抽回他所交纳的股份基金和他的投资；公积金、公益金和合作社积累的别的公共财产归社员无差异地占有，不许分散，不许抽回，新入社的成员，与原社员对已积累的公共财产享有同等的权利。^①

上述概括表明，“私有土地的联合使用”构成了初级社产权制度的主要方面。同时，初级社已经孕育了公共财产归社员无差

异占有等若干集体经济因素，本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初级社称为农业集体经济的萌芽形态。初级社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彻底崩溃和短暂的农民个体私有制经济的瓦解。初级社是建国后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它在承认农民的私人产权的基础上，即在并未削弱农民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动力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块公共财产，客观上提高了我国农民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如联合起来兴修水利、改造农田、采用新技术等。因此，初级社一定程度地克服了个体农民的分散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也为克服农民的两极分化找到了适宜的途径。

初级社产权制度创新的实质是将个体农民之间的大量的市场交易关系整合到一个“土地所有者集合体”内部，形成一系列稳定的指令关系。初级社的产生，是个体农民在党的合作化政策引导下，寻求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途径而走上联合道路的结果；集合体交易费用小于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是初级社产生并得以健康发展的经济根源。

二、初级社产权制度蕴含的潜在矛盾

初级社土地仍归私人所有，并保留入社土地参加合作社收入分配的权利，从而使“私有土地的联合使用”并未削弱社员通过努力最大化来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同时，集合体交易费用远小于分散的个体农民之间发生的市场交易费用，也使合作社的存续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这次制度变革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导致初级社产权制度内生了若干潜在矛盾。这些矛盾是初级社产权制度的基本规定引致的，它

们突出地表现在合作社社员的联合行动、“委托—代理”关系和公共财产等方面。

第一,“复合产权”对联合行动的特定要求与这种权利行使方式费用过高之间存在矛盾。

初级社的产权是由分散的不一定等量的私人产权构成的“复合产权”,这种产权结构不同于后来的无差异占有的“集体产权”。“复合产权”的最终归属可落在具体的自然人身上,而“集体产权”的最终归属则无法落到具体的自然人身上。经济学广泛分析了集体产权对集体行动的特定要求。事实上,合作社成员对“复合产权”同样具有联合行动的特定要求,否则“复合产权”的出现就没有必要。联合行动的费用就是我们曾分析的集合体交易费用。无论“一人一票”,还是“一股一票”,都须付出相当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均衡”是一种理论抽象,这种最适度状态(optimality)同经济体系的其他均衡状态(equilibrium)类似,呈现“剃刀的锋口”的形式,即均衡是偶然的,失衡是经常的。因此,初级社的日常运行和扩张行动,时刻面临因集合体交易费用激增而造成的“交易费用失衡”的威胁。“交易费用失衡”是“复合产权”对联合行动的特定要求与这种权利行使方式费用过高之间矛盾发生作用的结果。“交易费用失衡”时,初级社的存续将受到威胁。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整社”、“社教”等群众运动层出不穷,合作社规模时扩时缩,都可看作在动态中寻求交易费用均衡所作的努力。合作化实践中关于合作社与单干户孰优孰劣的争论持续不断,也是“复合产权”对联合行动的特定要求与这种权利行使方式费用过高之间的矛盾发生作用的结果。

第二,初级社代理组织成员目标与合作社社员目标之间存在矛盾。

“复合产权”对联合行动的特定要求与这种权利行使方式费用过高之间的矛盾即交易费用的经常失衡,必然迫使合作社社员想方设法降低集合体交易费用。寻找一个代理组织来部分地取代他们的联合行动,是合作社社员的必然选择。

初级社社员与代理组织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这是因为,初

级社社员拥有私人产权,而且有退社自由,因而在代理组织过度偏离合作社社员目标时,他们有能力终止代理组织的活动,或重新选择其他代理组织。这种契约性质的代理机制迫使代理组织成员目标尽可能地向合作社社员目标靠近。但是,代理者总是存在区别于委托人的独立利益,因而代理组织成员目标与合作社社员目标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初级社的代理组织近似于私人经济的代理组织,代理组织成员对合作社资产的关心程度远远低于合作社社员对所属的私有资产的关心程度。代理者对所代管资产的关心程度低于委托人的关心程度,这种现象可称为“所有权强度弱化”^②。因此,合作社社员的代理组织虽然降低了集合体交易费用,但也一定程度地消弱了合作社资产的“所有权强度”,从而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合作社资产的微观营运效率。这是代理组织成员目标与合作社社员目标之间的矛盾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三,社员追求自身利益与合作社公共财产的无差异占有制度之间存在矛盾。

这里的分析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即假定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必须在若干取舍(如是努力工作,还是获得闲暇?)之间作出选择时,他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广泛意义的“成本—收益”核算,^③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假设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这是因为,作为最小的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是一个基本事实。初级社在尊重私人产权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块公共财产,这块资产是归社员无差异占有的。假定某合作社社员甲因努力工作而增加了10单位的农产品,可再假定合作社将其中5单位农产品转化为公共积累,那么剩下的5单位农产品则归社员甲按劳或按土地分配所得。由于其他社员有权与社员甲无差异占有转成公共财产的5单位农产品,该社员甲在人数很多的时候,从合作社公共财产增量中所获得的利益近于零。另外,社员甲能否按照个人付出的劳动量或拥有的土地数量获得以及如何获得其中的5单位农产品,是个人无法把握的。可见,某合作社社员比其他社员更努力地增进公共财产,该社员只能得到由此而产生的公共财产增量按

全体社员人数平均后的一份,合作社社员人数越多,他得到的越少。反之,合作社社员因工作不努力或工作失误而造成的公共财产负增量也以同样的方式加以分配。况且,无差异占有制度也产生了公共财产归属的虚拟化,这又使合作社社员无法切身感受到公共财产增量或负增量对自身福利的影响。因此,在初级社中,合作社社员的个人利益与他所增进的公共财产的相关程度很低。这表明,初级社社员追求自身利益与合作社公共财产的无差异占有制度之间存在矛盾。

政府指出解决这对矛盾的方向:“每一个社员为了多得收入,既要自己积极劳动,以便多得劳动日,又要促进全社的整个收入增加,使每一个劳动日所能分得的东西也跟着增加。这样,就使社员的个人利益和合作社的整本利益得到正确的结合。”④以上分析表明,在无差异占有制度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相关程度很低。农业集体经济的实践也表明,我们一直在寻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结合点,但始终找不到有效的结合方式。在理论分析和经验事实面前,应该大胆承认:在无差异占有的农业集体经济制度下,我们根本不可能“使社员的个人利益和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得到正确的结合”。

由于初级社规模较小,社员间的不同要求和利益冲突还比较容易获得协调,因而上述矛盾在初级社时期基本上处在潜伏状态。在初级社合并为高级社,特别是高级社异化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后,上述潜在矛盾开始显化并日渐突出。

三、结论

初级社产权制度蕴含的潜在矛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国农业集体经济的各个历史时期,80年代初以“政社分设”和“包干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正是为了消除农业集体经济的内在矛盾,重新焕发“集体产权”对劳动者的激励功能而进行的。80年代农村改革的实践表明,“政社分设”大幅度地降低了集体经济运行的制度费用(即前述的集合体交易费用),“包干到户”也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通过努力最大化来获得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积极性。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改革继续深化,特别是在发

达地区,股份合作经济的崛起使我国农业集体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上,我们可以得出两方面的结论:(一)就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制度渊源而言,新形势下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是我国农业集体经济在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自身范围内的扬弃,即集体成员对集体资产的平等式无差异的共同占有转变为股份式有差别共同占有,而且这种转变事实上否定了社区所有制,重新确立了集体经济的新型“委托—代理”关系。可见,新形势下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吸收并恢复了50年代初级社产权制度的“私有土地的联合使用”等若干因素,同时也清理了初级社产权制度蕴含的潜在矛盾在当代农业集体经济中的延续形式。(二)就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前景而言,新形势下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崛起标志着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找到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实现形式,因而其发展前景是广阔的。股份合作制强化了劳动者促进公共资产增殖与同幅度增进个人利益之间的相关性,从而重塑了集体产权对劳动者的激励机制;同时这种产权制度也使集体经济从封闭走上开放,从而构造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基础。当然,现阶段各地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具体作法是不一致的,基本上处于自发性的探索状态,因而许多作法尚须进一步规范和改进,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发展前景的广阔性。

①初级社产权制度的基本规定主要是根据《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959年1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条款概括的。

②所谓“所有权强度”是指所有者个人对财产的行为与行为后果的相关程度,通俗地讲就是所有者对“所有物”的关心程度。

③所谓广泛意义的“成本”,除物质成本外,还包括社会地位的降低,或友谊、爱好的丧失等;广泛意义的“收益”也是如此。

④参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作者单位:山东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语言与人类思维的全面性

□许斗斗

人是历史地存在着，人的历史性既是其具体性的表现，也是其有限性的说明。由于这种历史性，使得人的思维由其本质的无限至上性变为现实的有限非至上性。因此，我们每个人以至每代人在思维上都显示出历史的片面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末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

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①然而，人对思维片面性的克服与超越和对思维至上全面性的追求不曾也不可能停止。在此，有效地借助语言来拓展人的思维就是使人的思维全面性的主要手段。

当代西方哲学对语言问题的关注，说明了语言在哲学中是占据着荣耀地位的，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它承载着人类思维的沉重内涵。我们对自身以及外在世界的思考与认知无不借助语言而完成。但我们却必须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语言在人类思维的片面性上，不仅毫无责任，而且是这一片面性的现实表现。何况语言能弥补这种思维上的不足，能使它不断“健全”，因为语言能够不断拓展人的思维。那么，如何体现语言对人的思维的拓展和对其历史局限性的超越？我认为，这主要通过对传统文本的理解、解释，与他人思想的交流、言谈，以及对客观存在的揭示、阐发这三个方面来实现。

—

众所周知，传统蕴藏着前人丰富的思想成就，而我们却受现实的制约，与传统之间存在着时间这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唯一能使我们跨越这条鸿沟、深入传统汲取丰富精神素养、克服现实的历史局限性的就是语言，因为，传统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以语言的形式存在着，而我们却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一座桥，一座从现实的此岸跨越时间的鸿沟通达传统的彼岸而使传统不再遥远的桥。于是我们在语言中对传统文本给予立足现实的理解与解释，实现着“古为今用”，突出传统的现实意义。当然，传统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它使我们对其文本解读时深深地烙上它的印迹，这不仅是因为语言就是传统本身的一部分，拥有语言就是拥有了传统，更重要的是由于伽达默尔所说的，“支配着我们对一本文理解的那种对意义的预觉，并不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而是来自于把我们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公

共性。但这是被包含在我们与传统的联系中、包含在不断的教育过程中的。”^⑧也就是说，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先决条件即预觉，是由我们与传统相结合的共同性支配的，而这种共同性却以教育的形式存在于我们思维中，成为我们理解与解释的基础，成为我们的知识储备和经验。这种由语言所承载的传统和由传统而确定的语义早已以“先见”的形式决定着我们对文本理解与解释的角度、广度、深度，即我们理解与解释的视野，我们正是带着这种视野、预觉，在语言的引导下，进入传统文本之中，去寻求一种“视野融合”。传统文本由于我们的预觉、先见而于我们熟悉，又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性和独立性而与我们陌生，我们解读的家园正是文本对我们所具有的熟悉性和陌生性之间的中间地带，视野的融合之处。要知道，传统文本所留下的决不是以往世界的残片断简，而始终是超出那个世界而表达出的意义领域。理解与解释是对文本意义的呼唤，是让文本在解释者面前展示并言说，我们则必须以语言的方式使自己进入它所展示并言说的东西中去。因此，确切地说，理解与解释是解释者与文本的一次对话。而一旦文本开始言说，它“在任何时候都给探询它的人以新的回答，并且给回答他的人以新的探问。要理解本文就要在一种对话中来理解它”。^⑨这种在新的探问和新的回答中，所涉猎到的传统与现实的“视野融合”，既不是传统文本意义的简单再现，也不是解释者意志的武断强加，而是新旧视野融合后合成生长出的某种有价值的活生生的东西，这无疑丰富了解释者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他思维的片面性，使其向着全面性迈进。这就是为什么伽达默尔一再强调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性的态度，而是一种生产性态度的缘由。

二

人类的思维首先是个人的思维。个人的思维体现了人类思维的丰富性，但也主要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片面性，然而，克服这种片面性的方法之一就是借助语言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与对话，其结果之一是取别

人之长补己之短，进入他人的思维，从中获得自己所欠缺的新东西，这是拓展自己思维的一种方法。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方法，因为它体现了言谈者“我”在谈话前就带有目的性，即“取长补短”，这种目的性一定程度地支配着谈话的全过程，以实现“我”的目的，获得与目的相关的新知新意而结束言谈，而“我”所拥有的目的却是建立在言谈前思维的片面性上，即便目的的最终实现，言谈的结束，也未能超越这种原有的片面性，因而，言谈者的思维领域未能得到真正而全面的拓展，至多只是获得一定量的补充。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与对话的主要结果是什么呢？伽达默尔认为，对话、理解不是靠进入他者的内心，与他者内心上的直接融合，而是在语言的引导下，进入言谈者双方都不曾涉猎的领地，这是一片处女地，它对双方都同样陌生，尽管言谈者双方在言谈前都怀有各自所企望的目的，但在共同触及这片处女地时，谁也无法支配这次言谈行动，支配对方，因此，“我们说人们‘进行’谈话，但是谈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谈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谈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谈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谈话。说我们进入谈话，甚至说我们卷进谈话之中，一般倒更为正确。”^⑩在此，伽达默尔先生的“卷进”一词形象地表明了言谈者双方被不自觉地、情不自禁和无法抑制地带进到一块陌生领地，表明了谈话的人受谈话的引导而不是在引导谈话。语言是进入这块陌生领地的向导，更是这块领地的拓荒者、揭示者。我们每“卷进”一次言谈就是对陌生领地的一次“侵入”、一次探险，我们言谈双方谁也不知这“侵入”、探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新发现和新成果。这些新发现和新成果会尤如神灵般地降临于我们。它是无意的，因为它远不是我们言谈前所企望的目的，而是对陌生领地的开发；它又是有意的，因为我们开发的向导是语言，我们借助语言、选择语词的过程就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可能的新发现和新成果。因此，一次好的、令人满意的言谈、对话“不是自持的丧

失,而是经验到我们的自我的丰富性,是在我们之外意识到我们自己。”^③这才是一次成功的“侵入”和探险。因而,每一次成功的“侵入”、探险,都是对我们人类经验自我认知以及我们的视野的一次拓宽,它的成功经历就以一种新的经验成为我们知识经验的一部分,成为我们进一步言谈、探险的根基,这显然较彻底地克服我们原先思维的片面性。

三

在海德格尔的眼里,语言对于人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和绝对性,“我们言说,因为言说是我们的本性。”“人说,人是靠本性而拥有语言。这把握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是能言说的生命存在。”“作为言说者的人是人。”^④不过,人拥有语言不仅由于言说是人的本性,更主要是因为人需要藉此而认识揭示世界、阐发真理,“一旦人思考地环顾存在,他便马上触到了语言,以语言规范性的一面去规定由之显露出的东西。”^⑤人在言说中绝不是对某物滔滔不绝、无的放矢的胡说和闲谈,这不仅不利于人以语言去“规定”被言说者,而且会遮蔽被言说者所“显露出的东西”,使其陷入虚假澄清的境界。人的言说就是要揭示存在的真理,然而真理何以存在?海德格尔认为,“真理本质上就具有此在式的存在方式,由于这种存在方式,一切真理都同此在的存在相关联。”^⑥由于真理与此在相关联,是此在的存在方式,而此在却是由展开状态规定的,由此才能被人们所认识、领会。但能进入此在之展开状态的,能被人们借以认识、领会的唯有语言,因为“语言并非是且并非首先是所要交流的听得见的和写出来的表达。语言……首先进入了敞开。”^⑦于是,我们借助语言进入了此在,认识并领会此在,所获得的就是此在的真理。真理是借助语言而对此在的澄清,是对此在之展开状态的陈述和澄明,由于此在的被陈述,真理的被揭示,此在就被带入与我们的现实关系中,此在的真理就成为我们原有经验认知结构的新的组成部分。这样我们就克服了原有对外在存在认知的不足和片面性,为我们改

造世界奠定了认知全面性的基础。当然,语言也有不可言说之“处”,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思之言说一旦不可言说那不可言说者,它将在其存在中沉默。”^⑧这块语言的沉默地,虽不是思想的禁地,但唯有被语言开发了,才真正成为人的“自留地”。只要语言对外在存在的不断揭示、陈述,就能不断实现思维的全面性。

总之,人类由自身不可克服的现实历史性而规定的思维片面性是会在语言的交流、对话、言说、理解等活动中实现克服和超越的,这些语言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并在具体的实践中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在一起,成为推动人类思维发展的真正而具体的动力。然而,语言的对象是无限的,因此,人类的这些具体实践活动也就永无止境。就最终意义而言,人的思维是无法摆脱其每一历史时代的片面性,但却又能不断战胜和超越每一历史时代片面性的制约,逐步迈向全面性这一美好愿望与要求。这种思维上的片面性制约及其克服和超越的辩证关系是一个具有无限性质的过程,换言之,思维的至上性和拥有无条件真理权“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⑨因而列宁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⑩

①、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5、126页

②、④《哲学译丛》1986年第三期,第62、58页

③、⑤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张志扬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第159、158页

⑥、⑦、⑨、⑩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第165、165、68、19页

⑧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出版,第273页

⑫《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53页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
责任编辑:冯生

怀疑：一种治疗术

——希腊怀疑主义对独断论的诊断

□崔延强

哲学之于灵魂，正象医学之于肉体。普罗塔戈拉认为，医生用药治疗人的躯体，智者用逻各斯医治人的灵魂。在《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代述普罗塔戈拉的观点：并非健康人比病人更智慧，也非弱论证的人比强论证的人生来更愚蠢，而是在于灵魂的状态不同。使灵魂状态向相反方向转化乃是智者的使命。“医生靠药物促成这种变化，智者则用逻各斯促成变化”。^①显然，智者的精神治疗术在于排除语言表达方面的障碍，增强人们的雄辩能力，是纯粹修辞术意义上的思维训练。而其他各种独断哲学普遍认为，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应当具备关于外部世界是什么，人这个小宇宙是什么的基础知识和基本信念。在人生的旅程中，唯一可靠安全的保障就是这样的知识和信念。而哲学的作用就在于向人们提供传授这样的知识，灌输强化这样的信念，医治愚昧与无知这种普遍的心灵疾病。苏格拉底便是突出的代表。他宣称德性即知识，无知就是恶，他以医药之神、光明之神阿波罗的使者而自居，用理智助产术催生真知识，祛除假观念，治疗那些自认为有知，但实际上无知的虚夸玄浮之徒的精神疾患。怀疑主义认为，心灵的健全在于不受各种形而上学信念和知识的干扰。尽管卢克莱修把伊壁鸠鲁主义的信念和知识体系比作坚如磐石、牢不可摧的“城堡”，把亚里士多德的体系视为一艘边行边修、不断更新甲板、日益坚固的船，^②然而没有攻不破的城堡，没有永不触礁的航船，越是看起

来坚硬无比的东西，越是容易遭受打击，容易土崩瓦解。在怀疑主义看来，独断论的信念和知识不能致使灵魂健全，并不具备治病的功效。因为患病的不是一般大众，而是以心灵医师自居的哲学家或独断论者本人。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元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治疗术，它并不向大众兜售确保灵魂健康的灵丹妙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药物。怀疑主义的目的在于杜绝谬种流传的根源，切掉赘附于心头的肿瘤，解除心理负担和精神紧张。怀疑主义者也以医生自居，但不是普通的医生。其病人不是一般大众，因为大众的精神是健康的。他的病人是独断论者，他是专门治疗独断论者的特殊医生。怀疑主义作为反哲学的哲学，实际上就是独断论的病历。在这份病历上，有症候、检查和诊断，还有药方。

独断论的症候是什么呢？怀疑主义认为独断论的典型症候是“卤莽”（*propeteia*）和“自负”（*oiesta*）。^③经过检查和诊断，怀疑主义发现导致“卤莽”和“自负”的病因乃是独断论者在未经批判考察自己的认识能力的情况下就去探究外部世界这种非显明之物，就去草率地下结论，或者说过于相信自己的理解力，独断地认为它能揭示事物的本性，究尽一切真理。蒂孟在《讽刺诗》（*silloi*）中，以尖酸辛辣的言辞嘲笑着独断论者的傲慢与贪求：“夸夸其谈的人啊，肚子里充满了空洞的自负。”^④“我看到了一个贪婪的腓尼基老渔妇[指斯多亚派的芝诺]，

用愚昧无知的自负寻找着各种东西；但她那精心编织的渔网由于太小而被撑得支离破碎；她的心智不比一串废话更为有用。”^⑤

怀疑主义认为，人类的理解力只能把握现象中已有的东西，一旦离开了显明之域，涉足非显明之物，那就是妄用了这种能力，夸大了它的作用。用休谟的话来说，人类的心智“无论如何不配作那样遥远，那样深奥的研究”。塞克斯都指出，一切理性的推证不能离开感觉经验，不能同现象相悖，“如果理性是在我们眼皮底下把现象偷走的骗子，难道我们还不应当怀疑它为非显明的东西，反而去跟随它表现出卤莽轻率来吗？”^⑥

怀疑主义进一步挖掘独断论的病根。认为独断论之所以相信理解力能够把握非显明之物，乃是基于一种不合法的类比，即通过经验上的简单类比产生对本原或始基的冲动，对支配宇宙的最高原则的冲动，编造超验的形而上学的神话。塞克斯都描述了独断论的类比原则，他说：“有一种来自远古的旧观念，在自然哲学家中颇为流传，即相似的事物认识相似的事物。”^⑦费罗劳斯根据自然现象的同类相聚和同类相知，便得出结论：“求知的理性与所有事物的本性相通或相契合，因此具备某种相似的结构，因为以同认识同乃是基于本然的事情”。^⑧波塞多纽在《蒂迈欧篇》的注释中也采用了这样的类比。他说，正象光是由具备流变形式的视觉器官来认识的，声音是由具备通气结构的听觉器官来认识的，同样万物的本性应当由与其相似的理性来认识。而万物的结构是数，因此判断万物的理性也应当被称为数。^⑨柏拉图也借助这种类比原则证明灵魂的非形体性。他说，如果五种器官由于感知不同的对象而分别类似于对象，那么灵魂由于认知非形体的理念，如数目、限度等等，因此也必然类似于这些东西，所以是非形体的。^⑩怀疑主义指出，独断论的类比原则是不合法的，因为它超越了现象，在经验中找不到确切的根据。我们可以说，每一种感觉都有自己的可感对象，但没有任何根据说，我们的理性有一个超验的对象，而且这个对

象必然与理性同构或契合。理性的对象只能是感觉印象，它的功能也仅限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整合。另外，怀疑主义还发现类比原则不仅是独断论用来确立主体认识能力的手段，而且还是用来解释和推证一切非显明之物的实在性的“万能钥匙”。比如在阐释神的观念的起源和论证神存在时，独断论运用了两种较为典型的类比方法。一种可以称为“宇宙的有序安排”（*parateskos-mikesdiatakseos*），即近代哲学意义上的“宇宙设计论”。独断论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进行类比：正象一个站在伊得山上放眼远眺的人，当他看到大批希腊军队排着严密的阵容，有序前进在特洛伊平原上，就会萌生一种观念：一定有一个最高统帅在指挥安排士兵的布阵列队。因此，那些最初观察天象的人当看到太阳东升西沉，群星循序运转，他便会猜想如此美丽的秩序，如此奥妙的苍穹决不会自发生，必定存在着某种超越一切的，永恒不朽的动力因，宇宙秩序的安排者或设计师（*demiourgos*），他就是万能的神。另一种类比法叫作“超越人性的方式”（*kataten apo ton anthropon metabasin*）。独断论认为，对于一般的凡人来说，都可以形成“快乐”、“幸福”、“智慧”、“善良”、“长寿”这样一些有关德性的观念。同时，人们的想象力可以把这些属人的德性放大，甚至无限地放大，直至一种超人性或非人性的极限，形成永恒不朽、至善至美、全知全能观念，这些观念如此完满以致于不能不存在，即必然指示出某种最高的精神实体，这个实体集永恒不朽、至善至美和全知全能于一身，他就是神，宇宙的普遍原则。^⑪怀疑主义指出，独断论通过不合法的类比得到的关于神存在的结论是一种超验的假设，没有任何必然性。从经验世界到超验的非显明之域没有一座绝对可靠安全的桥。尽管人心可以设想一种臻善臻美的观念，但这种观念毕竟不等于实在本身。试图借经验类比推证超验的实在，试图从思想观念中推出作为理性宇宙的立法者和最高原则的神。独断论的这种冲动和狂想无异于梦人呓语，正如塞克斯都说：“并非能被思想的东西都是实在的，一

件事情可以被思想但并非存在，这是可能的。如马人和六头女妖。”^②

再者，怀疑主义认为独断论“卤莽”与“自负”的病根还在于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梦想得到一种没有任何怀疑，超验的知识。独断论把经验视为不可靠的东西，用巴门尼德的话来说，经验只能把人们引向不确定的“意见之路”，唯有知识才能使人们奔往“真理之路”。独断论者拒绝感觉经验，对建构一个象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的绝对必然的知识体系心向往之，因此逻辑证明的确定性成了独断论者的理想，难怪柏拉图学园的门上写着“不懂几何者勿入内”，在独断论者的心目中哲学知识应当使用象逻辑学和几何学一样可靠的方法建立起来。这一特征在斯多亚派那里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以逻辑为工具来论证哲学知识的必然性，寻求这种必然性的根据。为此，怀疑主义者花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批判斯多亚派的这种尝试，揭露它的虚妄性，力克这一顽疾。^③斯多亚派认为哲学论证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确定的”或“确切的”(Sunaktikoi)。即当人们普遍同意前提为真的时候，结论明显地由前提中推出(akoliouthen phainetai)，换言之，如果前提为真，结论也必为真，前提与结论都是显明的，结论蕴含在前提中，也就是近代逻辑上的“分析判断”。然而斯多亚派并不仅仅满足这种分析判断，虽然它能符合哲学论证的确定性这个条件，但并不产生新知识，永真性和空洞性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斯多亚派提出哲学论证的第二个条件，即必须能够产生新知识。而能够产生新知识的论证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根据信念、记忆以及经验观察建立起来的。常见的例子：

如果妇女有奶，则她怀孕了

事实上这位妇女有奶，

.....

所以她怀孕了

如果神说此人将富有，则此人将富有
事实上神说此人将富有，

.....

所以此人将富有

斯多亚派人认为“她怀孕了”和“此人将富

有”这些结论并非是依靠逻辑证明建立起来的，而是根据观察所得来的经验，根据“相信神的话”这样的信念推出来的。这种论证形式虽然能产生新知识，但只是经验上的或然性知识，没有绝对必然性。这种论证形式就是近代逻辑上的“后天综合判断”。在斯多亚派看来，最理想的哲学论证应当既是确定的，又是能够产生新知识的，既具有分析判断的永真性和绝对性，又具有综合判断的知识性，实际上斯多亚派所追求的就是“先天综合判断”，用他们的话来说，结论必须从前提中，依靠前提的力量本身揭示出来，或者说前提中存在着一种本性，能够指示出结论来。哲学的任务就是利用逻辑工具推证出有关非显明之物的知识，揭示出事物的真理。塞克斯都指出，斯多亚派通过逻辑证明所获得的关于非显明之物的知识不可能具有必然性和绝对真理性。因为一个论证的真假乃是根据它的结论是否同事实或经验相符合而定。当结论涉及显明之物时，很容易将之诉诸事实，符合则真，不符合则假；然而当结论涉及的是非显明的东西时，由于它不能被观察到，因而找不出一种东西与之相参照，给心灵留下的只是或然的相信和赞同。当有人用一种方式来猜测，并试图使人信服，另一个人则用另一种方式来猜测，也想让人信服，争议便由此而生。因为无人能够确切地断言，他的论证是永真的。他的结论已经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塞克斯都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怀疑派非常巧妙地把那些探究非显明之物的人比作在黑暗中向目标射箭的人。他们当中的一人可能击中目标，另一个人可能没有击中，但哪个击中，哪个没击中是不得而知的。同样，真理几乎深藏在黑暗的底层，许多论证向它进发，究竟哪个论证与之一致，哪个不一致，是不被知晓的，因为探究的对象远离显明之域。”^④可见，一旦独断论离开显明的东西，涉足非显明的领域，就不能建立确证的知识，任何逻辑论证的力量都无法保证这样的知识具有必然性。独断论所追求的那种既具备确定性和永真性又能产生新知识的哲学论证实际上只是一种梦想，

犹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是瞎子脑海里的一朵美丽的云彩。梦想毕竟是梦想,对确证性的渴望反而以导致或然性的假定而告终。独断论的病根就在于此。

通过观察独断论的症候,经过诊断并发现病因之后,怀疑主义给独断论开出了药方,这些药方就是涉及种种问题的“反论”或“反题”。切记,反论或反题本身不是怀疑主义自己所接受的观点,它们的素材大都取自独断论,因此也要用之于独断论,就象医生给病人开出药方,目的在于让病人服下,祛除疾患,而不是自己服用。怀疑主义这种元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治疗术的真正动机乃是通过反题或反论这些药物来根治独断论的“自负”与“卤莽”,使心灵得以健康,除此之外,它不相信任何东西。正如J. 安那斯和J. 巴恩斯所说:“怀疑论者视自己为医生(更恰当地说,是心理医生),……正象医生不必服用自己开出的药物一样,怀疑论者不需要相信自己提出的前提。”^⑨

怀疑主义的精神治疗术还有一定的技巧和策略,它因人而异,因病而异,根据病情的不同对症下药。怀疑主义给出的药方中有通适于各种病情的一般性药物即“论式”(tnopos, topos)。论式是用来根治形形色色的独断论之通病的“烈性”药物,也可以说是怀疑主义解剖独断论的手术刀。论式又分为经验性的十大论式,元逻辑意义上的五大论式和两大论式。在药方中还有一些特殊性的药物,即针对独断论的具体命题而建立的反题或反论。如反原因论,反真理标准说,反记号、证据说,反神明存在说等等。病情轻重不一,用药也有所不同。塞克斯都形象而深刻地描述了怀疑主义作为精神治疗术的这一特征:“正象治疗躯体疾病的医生那样,他们拥有效力不等的药物,对病情严重的人用效力强的药,对病情较轻的人用效力较弱的药。因此怀疑派提出各种力度不等的论证,对那些受卤莽强烈侵袭而病入膏肓者,使用强有力的论证,借助这些论证的力量来祛除独断论者傲慢自负的痼疾。对自负之病患不太严重且易于治愈的人,只需要使用力量适中的论证即可奏效。因为通过力量

适中的说服方法就能使之恢复健康。”^⑩

怀疑主义把自己的理智活动视为一种精神治疗术,在西方哲学史上翻开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一页,它标志着人们开始从纯批判反思的角度去审视考察哲学作为一门知识的根据和条件等元哲学问题。怀疑主义的精神治疗术成为思想史上反形而上学运动的有力武器。怀疑主义的精神在当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更为淋漓尽致。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对问题的治疗就象治疗一种疾病”,他挥舞着语言分析的手术刀,试图切除形而上学家因理智的失足撞到语言的边界而得来的肿块。他发现形而上学的典型症状就是为一些无意义的伪问题所困扰折磨,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神经错乱,精神紧张。这种形而上学病的根源在于语言的误用,使用一些诸如“知识”、“存在”、“客体”、“我”这样的名词,并试图抓住它们的本质,即找到一个和它们相对应的对象。维特根斯坦把形而上学问题的症结描述为“不知道怎么走”,把形而上学家比作陷在捕蝇瓶里的苍蝇。他的精神治疗术的目的在于给形而上学家指点出一条解除精神束缚的出路,给苍蝇指明捕蝇瓶的出口在那里,那就是停止使用一些无意义的概念,观察语言的日常用法,“我们所做的是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维特根斯坦给形而上学开出的药方是设想或发现一种语言游戏来使之解脱精神紧张。当形而上学家发问:什么是思想?维特根斯坦忠告说,不要问这样一个无意义问题,只需做一个关于“思想”的语言游戏,看看在什么情况下和如何使用“思想”一词就足够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提出:“不要思考,只须观察!”(Denknicht, sondern schaul)维特根斯坦的精神治疗术的动机在于摧毁形而上学的空中楼阁,清理它赖以建立的语言地基,这种工作在希腊怀疑主义那里早已开始着手,维特根斯坦只不过把它做得更精细、更彻底而已。^⑪

①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67A

中西文化人我观之比较

□戴木才

中西文化由于有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野,同时还有着认识论与价值论的不同,因此,不同的文化认识背景也就造成了中西文化对人我观的不同理解和体验。从文化的本质来说,文化人我观即文化对人的理解、对人的自我的理解,体现着文化精神模式的特点,它既是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又是最后归宿,它制约着文化的精神体系。由是,比较分析中西文化在人我观上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对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有助于我们寻找中外文化融合的契合点。

一、“人天(自然)相合”与“人天相离”

哲学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制约和规定着某种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发展方向。从文化史和哲学史的角度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对人、对自我的意识都十分悠久,可以说它几乎肇始于人类认识的起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一切文化肇始的逻辑起点。只是由于思考方式和把握方式的差异,对自我

②转身 M. 努斯鲍姆《怀疑的泄药:古代怀疑主义的治疗论证》,载《哲学史月刊》1991 年第 10 期第 521—555 页。

③参见塞克斯都《皮浪主义概略》第 1 卷第 20、177 行;第 2 卷第 256、258 行。

④转自 A. A 朗《希腊哲学家》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 页。

⑤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第 7 卷第 15 行。

⑥塞克斯都《皮浪主义概略》第 1 卷第 20 行。

⑦⑧⑨⑩塞克斯都《反逻辑学家》第 1 卷第 116、100、119 行。

⑪塞克斯都《反物理学家》第 1 卷“论神”。

⑫同上,第 49 行。

(13)(14)塞克斯都《反逻辑学家》第 2 卷第 322—327 行。

⑮J. 安那斯和 J. 巴恩斯《怀疑主义的论式》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 页。

⑯塞克斯都《皮浪主义概略》第 3 卷第 280—281 行。

⑰参阅 M. K. 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76—383 页;舒炜光《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16 章。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系

责任编辑:冯 生

观念在其认识的逐步深化中,不同的民族或区域才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在最初的古希腊文化中,自然一开始就作为人的对立面而与人区别开来,他们喜欢一些具体的事实,并愿意将他们所见的具体事实清清楚楚的表示出来,探求事物的本原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他们所要回答的问题直接就是“事物的本质、本原是什么?”美国哲学史家梯利说:“希腊哲学从探求客观世界的本质开始,它最初主要是对外在的自然感兴趣(自然哲学),只是逐步地转向内部,转向人类本身而有人文主义性质”。^①古希腊哲人强调:“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②“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③因此,西方文化注重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相互渗透,互相影响,携手并进,这种主知论的文化传统使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西方的哲学家、人文科学家往往又是自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罗素等等,都是这样一些人。

相比而言,在中国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区分就不象西方那么明显,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是“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④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传统,使得中国古代哲学中自然哲学(认识论)与人生哲学(伦理学)是不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便是一种描述性文化,宇宙自然被把握为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人同时亦是这一有机生命整体的一部分。《易经》中对“大人”的精神境界是这样描绘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⑤因此,中国哲学不是把外在的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来体验,所以,中国的哲人不去探讨自然的奥秘,把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视为雕虫小技,从孔子开始,一直到宋明理学家,莫不如此。

在表面上看来,中国文化似乎比西方文

化更重视人。儒家典籍《礼运》谈到人的卓越时讲:“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相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这是其他物类所不能比拟的。董仲舒说得更明确:“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也正是出于对人的重视,“内圣外王”之学被视为传统儒学的精义所在。“内圣外王”肯定人的主体价值,强调提高人的道德自觉性,包括给人在道德上的自主、自律、自勉、自强,把道德主体的挺立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点,引导人去追求完善的人格和至善的境界,并由此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这说明为我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在本质是把“人”的问题作为一切问题的首位和中心来把握的,也就是说把人的问题作为时代精神来掌握,这种深厚的文化传统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它充满了对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的探讨和思索,提倡天人合一,人我和谐,自强不息,厚物载德,舍己爱人,中庸平和,仁义礼让,谦恭不争等。面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与探索,则更多地赋予了一种人类学意义,对生活中丰富多彩的物象世界,则多依据自己的情感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无论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人生态度,“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人生感叹,还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人生体验,都是在天(自然)与人之间回味人生的一种努力。

虽然西方的文化传统是“主知论”,注重探索一些具体的事实与本原,但是,这种求真的传统并没有造成对人的冷落和忽视,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思想家在对待人与自然分而“治”(研究)之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之所以打出“文艺复兴”的旗号,就是认为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许多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统。如亚里士多德把“时间”与人的“灵魂”联系起来,认为时间的存在依赖于人的灵魂,因为只有灵魂才能计数;古希腊著名智者代表普罗泰戈拉就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著名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尼》一剧中对人赞美道:“世界

的奇物珍宝可真不算少,象人这样维妙的却很难找。”古罗马著名的政论家、雄辩家西塞罗说:“在人看来,人是最美的。”

在我们看来,我们也许很难用一种价值尺度来评判东西方人我观发展的优劣高下,因为就人类自身的完善层次说,人既有理性充实的需要,也有情感意志完善的需要,不同的文化形态总是在一定层次上满足了人类的某种需求,因之被保持延续下来。东西文化在人我观上只是走着两种不尽相同的实践之路,回昧着不同的人生趣味。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讲,“人天相合”的中国文化传统使中国人赋予人生的是一种颇富艺术色彩的人生观或者说伦理型人生观,而“天人相离”的文化传统赋予西方人人生的是一种注重知识型的人生观。并且,两者也只是相对而言。

二、“趋善”与“求真”

由于中西文化走着不同的实践之路,两者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对事物之“本原”问题的认识上,西方文化强调“本原即是虚幻现象背后之实在”,理性思考的意义就在于探究那一永恒的自然“理式”,这一传统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莫不如此。而中国的先哲们则认为“本根”不离现象,现象即现“本根”,即所谓“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哲人决不认为本根实而不现,事物现而不实,而以为事物亦实,本根亦现;于现象即见本根,于本根即合现象……西洋哲学中很普遍的‘自然之两分’,在中国哲学中是没有的。”^⑥西方人在主客体的严格区分中,勇于正视对立面的冲突,并通过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方式来求得最终的真知,而中国人追求本根的目的旨在于现实生活之迁善。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⑦具有十分明确的趋善倾向与实用倾向。对存在本体的认识差异,体现在对“自由”的态度上,西方文化强调只有在超越了客观的必然性之后,才能获得自由的,这种超越在现实上要经过一个本质的对象化的自我确证过程。即使马克思也这样指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

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⑧因此,人与动物不同,有自我意识,有自觉的理性,而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自我意识、自觉理性不断提高并得以实现的巨大推动力,是人性解放的理论前提。而中国文化则主张“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只要在自然与人之间把握了其应有的“度”而“允执其中”,就算获得了自由。中国传统文化常以伦理代替论理,将客观事理的“必然”混同于伦理道德上的“当然”。据统计,《论语》全书用了54例关于自然的材料,其中百分之七十是用作“观物比德”,借自然物来比喻人生之理的,“为求知去求知的态度,在中国哲学家甚为少有”,^⑨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是“真”与“善”、“知识”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以艺术为例,中西艺术不同的特色也体现中西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两种不同的人我观,从中尤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那种“趋善”人我价值论以及西方文化的那种“求真”的人我价值论。例如,中国古代把诗、乐、书、画等各种艺术,都看作是“心声之画”。绘画被认为是“畅神”,宗炳的《画山水序》曰:“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李公麟则表现得更为直接:“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情性而已。”^⑩我国绘画从来不以形似为最高追求,核心把握的是“心”与“境”的关系,要“因心造境”,“得意忘象”。书法则被认为是“写字者,写志也”,“书也者,心学也”。^⑪中国古代艺术不重视写实、透视、典型,谋求的是心与物的自然统一,走的是一条意象、兴象、意境的艺术道路,借物象来求得内心世界的和谐,以艺术的心灵去领悟宇宙,洞视人生。实质上是一种内在精神世界的徜徉与漫游。

与中国这种“求善”的艺术精神相反,西方艺术与其主知论传统一脉相承,走的是一条写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体现的是一种“求真”的艺术精神。古希腊的雕塑、史诗、到近代绘画与文学的现实主义风格,均是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仅用感官去认识世界,而且用理性去研究世界,透视学和

解剖学成为当时绘画艺术的两大支柱。达·芬奇、拉斐尔、伦勃朗、大卫和安格尔等大师几乎都用科学理性精神从事创作,追求物质的质感和形体的真实,创造“第二自然”(歌德语),乃至所描绘的天鹅绒、绸缎、大理石、金属、肌肉、肤色几乎达到了可触、可及、有暖有冷的真实感。面对这种写实精神,西方人如何体现人文主义精神呢?在西方人看来,人一旦面临一个不实在的世界,便可能失去对自己的认识与征服自然的能力的自信,所以,人要成为真正的人,真正获得自然,首先就应忠实自然、摹仿自然,自由是对外在必然性的超越,只有通过对象化的确证过程才能实现,对有限的自然的忠实正是为了验证自己的自由(无限)程度,只有当画家确信自己的感觉有能力把对象维妙维肖地在画面上固定下来并重新进行安排时,他才有权力在自然面前说,我驾驭并征服了你,所以我是自由的!

因此,中西方两种文化精神,两种人我观,表现了两种不同的人格实现的道路。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①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人就没有必要一味地向外孜孜以求,只要“返身而诚”,就会“乐莫大焉”。中国人的人我观不象西方那样强调知识在人我价值论中的地位,不提倡人们身体力行去求知。《论经》一书句句均表示做人的基本道理在于能够闻道、弘道,达到仁、智、勇的无忧、无虑、无惧的境界,也就是从人性中蕴含的善恶以于宇宙中蕴含的人之精神来谈人生与宇宙,人类的思考、知识、决定、行为,都要在这个价值宇宙中来安排。这种用价值来安排、规范知识、人生或人的行为的宇宙观或人格实现方式,足以显见价值之为本,知识之为末,价值之为先,知识之为后的文化内含。《大学》云:“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庄子感叹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②唯一的出路就是先进行人格修养,然后才能通晓万物:“且有真人

而有真知”。这种人我观始终是以伦理为核心的。

在西方人看来,人类心灵的和谐和人格的美观并不象中国人所说的这样如此容易获得,西方文化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一旦他被抛弃到现实的世界,除了与命运抗争,与自然抗争,再别无选择。这种执着于苦难的殉道意识在西方文化中几乎到处洋溢: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作为科学家的布鲁诺,以至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不一而足。美国现代哲学家对此表明得十分精当:人“既然失去了乐园及与大自然的和谐,他就成了永远的流浪者。他不得不向前走去,以毕生不懈的努力,在他的知识的空白处填入答案,从而知道未知的事物。”^③只有自助,才能天助,只有超越他人,才有我的价值。这就是西方文化追求的人格实现。在西方人看来,对传统没有必要留恋忘返,前人所留下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都只是行为模式的一种,它一方面给人以启发,另一方面也给后人带来限制和封闭,阻碍人们去对通向无限的外部世界之崭新道路的开拓与选择,因此,唯有在自己的“生潮里、业浪中”去不断开拓新的天地,才能印证生命的价值。

①《西方哲学史》上册,第20页

②《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③《形而上学》第5页

④⑥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⑤《乾卦·文言》

⑦《论语·雍也》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96页

⑩《宣和画谱》卷七

⑪刘熙载:《艺概·书概》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

⑬《庄子·养生主》

⑭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对道德心理的探讨》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冯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主体道德价值研讨(续二)

关于“个体道德价值” 的两个问题

阮纪正

(广东省社科院)

一、承认个体具有道德的价值

人的生命本体,是个简单个体性生物学事实。由此人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也首先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人类的历史最终归结为“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尊重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承认人类个体具有道德的价值,就是承认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

诚然,人是以群体的方式生活的,任何个人都只能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而言,只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当然,马克思所说社会关系,并不是脱离具体个人的抽象物,而是现实人本身活动和相互交往所形成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个历史范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马克思曾把人际关系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大阶段。所以“独立的个人”同样也是个历史范畴。我们研究个体的道德价值,也必须把它摆到这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去研究。

近代以来,承认并强调个体在道德上具有价值,这是商品关系和市场经济本身的要

求。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它以摆脱人身依附的主体性活动为基本前提;市场经济又是交换经济,它以“尊重所有权”和“等价交换”的方式把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市场经济还是发展经济,它以利润冲动和竞争压力的形式推动整个社会的扩大再生产。这里所说的自主、交换和发展,都是以个体独立为核心的。如果没有了个体独立,那在事实上便谈不上任何自主、交换和发展;而所谓个体具有道德上的价值,则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伦理学确认。

当然,商品关系和市场经济中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它会把人们相互间的劳动和活动的交换关系,异化为某种非人的关系,让人沦为物的奴隶。这有待于社会主义的改造和扬弃。但这“必要的代价”,并不等于要否定个体的道德价值。至于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更“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理想社会的客观基础,在于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人已不再是生产的手段,而生产则成了人的手段。这也就是马克思所形容的:“不是死的劳动支配活的劳动,而是活的劳动支配死的劳动。”由此形成社会财富基础的东西,便不再是劳动而是闲暇。在这新的条件下,人的个体显然更具道德上的价值。

二、探究个体道德价值背后的社会条件

任何道德就其内容来说,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个体道德价值问题自当不能例外。在当今情况下,探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个体道德价值,我以为至少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需要问题。

第一,是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我们的道德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个服务,又并不是简单地适应原始市场的无序状况,而是要为我们的市场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导向和规范。人的观念、精神、道德等等东西,并不是现存状况的消极和机械的反映。它们还可以基于现存状况的矛盾运动,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让现存秩序从“已然”向“应然”提升。一定范围的适应和顺应总是必要而且是首要的,但问题在于不能把这适应机制简单化、绝对化和神圣化。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目前已过临界点,任何倒退回原来体制的做法,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些东西对旧道德的破坏,自当大有好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对我们仍然是个有待于建立的对象,而不是早已成就的现实。虽然改革以来,已经引入了市场经济的不少做法。但就总体来说,目前我们的市场仍然是市场主体发育不良、市场信息经常扭曲、市场体系残缺不全、市场规则不受尊重。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遇到红灯绕路走”等等,就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这个市场机制的极端不成熟。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要十分讲究“统一法度、规范行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可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仍然要讲“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重点倾斜、优惠待遇”。在这情况下靠“钻政策空子”所形成的既得利益,其实并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利于市场机制的真正成熟。所以如果不恰当地夸大我们当前市场体系发育状况,只讲我们的道德要适应现有的眼前秩序,不讲自我和社会向应有的理想境界提升,那显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必须明白,市场经济物的关系背后是人的关系。它除了有原始物欲的冲动以外,更需要有形上超越和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来支撑。

第二,是文化背景历史运动的客观需要。

我们说,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文化的存在物。在这里,说人是文化的存在物,跟说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是同义的。文化可以看作是社会的主体化,社会则可以看作是文

化的对象化。文化传统积淀在社会成员的文化心理上,构成社会个人的精神主体。由此所谓个体道德价值问题,同时也是个社会文化心理问题。所以在探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道德价值时,就不能离开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而抽象地提问题。

例如,西方有悠久的神学文化传统,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以求赎罪得救、灵魂飞升;他们有着明显精神性的自我承担,因而他们的新教伦理精神可以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育开道。但我们的文化中缺乏西方式神学传统,人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是在一定宗法关系内展开的;中国文化传统历来讲究私德而忽略公德,缺乏一种“一视同仁”的普遍性个体道德规定,因而并不适合社会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所以在当前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食古不化、恪守陈规显然是行不通的。但由此而食洋不化、形式照搬同样也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选择,便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变革传统,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核心,是对传统自身的变革扬弃。在这过程中,以开放的心态借鉴一切外来有益东西,是十分必要的。但切忌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式的简单做法。而在中国文化中“为仁由己”、“反求诸己”和“修己安人”的自我承担,在扬弃了的形式上当有永恒的价值。自我放纵的“文化流氓化”倾向,极可能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引向绝路。

第三,时代背景和国际经济环境的需要。

当今人类的发展,早已从地域史和民族史进入统一的世界史了,所以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忽略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经济环境的问题。目前,我们是在工业社会快走到自己的尽头,并且已经有了统一的世界市场条件下,去搞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生态危机等“人类困境”和“全球问题”严峻地摆在每个人面前。这跟西方国家开始走进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时的条件,是完全不同的。诚然,我们国家尚未实现工业化,现在的任务是要走进工业化,而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要走出工业化。但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经济环境,再加上前面提及的作为精神主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使我们不必

要和不可能重复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所谓“发展困惑”或“发展悖论”，我们同样也未能避免。在这条件下的个体道德问题，还应当加上生态环境以及今后是否“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考虑。

个体道德价值观念的选择

陈家义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道德是一定社会为了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提倡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这三种道德关系中，都离不开个体道德以及个体道德价值观念的选择。

在形而上学猖獗时期，一讲到道德就把它同阶级联系起来，认为一切道德都有阶级性。从而强调集体道德，社会道德。而把个体道德同个人主义相提并论。批判“个性”，反对“个人突出”。在批判“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的时候，否定了个体道德，例如，把“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创造”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使人不敢表明自己的理想，抱负。这样僵化划定行为规范，实质上否定个体道德价值。社会道德是由个体道德构成的，否定个体道德，实际上把社会道德变成了一个空壳。

提出个体道德价值观念选择，理由如下。其一，道德价值观念转变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不断地走向市场经济，在这一重大社会转型过程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个体道德价值观念的选择问题。

其二，个体道德价值观念选择的基础。个体道德价值观念是实际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主体的价值

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性质和意义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形成个人的比较确定的心理和行为取向的信念，个人的心理行为定势也由此而来。个体道德价值观念是个人在一定的环境中的动机、目的、需要和情感意志的综合体现。个人按照自己的特长、兴趣、爱好、条件去发展自己，个人按照各行各业、社会角色来培养自己的道德。这就是个体道德价值观念确立和选择的基础。

其三，个体道德价值坐标系及其选择。个体道德价值坐标系可分为四个象限：一是对个体和社会均有利；二是对个体有利，但对社会不利；三是对个体及社会均不利；四是为社会之利，而要个体作出牺牲。第一种利己利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如果人人都做到这一点，符合市场经济的社会道德要求，社会风气就会好转。所以说它是目前最有价值的个体道德价值观。第二、三种德行则是要坚决反对的，个体选择了这缺德的行为，是毫无价值可言的，如果一意孤行，必然走上绝路。第四种，要求个体不计较个人得失，对社会作出无私的奉献，这是应该提倡和宣扬的。但是，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暂是还不能提出这样高的要求，不然就会成为一个“空头政治”的口号。

邓小平同志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这可以说是在市场经济时期的个体道德价值观念的全部含义，也为个体道德价值观的选择指明了方向。

本专栏责任编辑：冯 生

岭南革命派对确立三民主义的贡献

□刘圣宜

“三民主义”最早产生于岭南，主要得力于岭南对外开放的社会环境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孙中山是“三民主义”的创立者。然在孙中山的周围还有一大群岭南人，他们与孙中山意气相投，最早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宣传、讲解和发挥。可以说，“三民主义”并不单单是孙中山一个人的创造，除了孙中山之外，其他的岭南革命分子对“三民主义”的创立也有着不可抹煞的贡献。

一

地处岭南的香港，是反清思想的一个发源地。香港自1841年被英国占领后，清政府便不能把它的统治力量伸展到这个小岛。许多不甘臣清的岭南人便把这里作为他们暂时脱离清朝统治的避难所。而西方政治的开放和自由不但使得人们自然地把香港和中国内地进行对比，也使得人们可以在此大胆地表达他们对清廷的不满。对此，英人呤喇很有感触。他记道：“我正在看精彩的戏法表演时，一个身材魁伟显然有钱的中国人走到我面前，向我说了一句‘洋泾浜英语’。……我告诉这些中国人关于铁路、气球、海底电线等等的情况。他们也告诉我许多香港的生意经和中国政治的消息。我的朋友们一致大声赞扬这个殖民地，说香港的一切都是刮刮叫，但对自己的国家的情况和清朝政府，则激烈表示不满。……香港深得中国人的欢心，他们为了逃脱清朝统治者的暴虐和掠夺，于是抑制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成群结队地移居到香港来。”①“自从香港殖民地建立以来，本地人跟外国人有了来往，熟悉了所谓‘外夷’的优越的法律、政体等等，这使他们更不满意自己的国家制度。”②

呤喇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清廷正是因为害怕对外开放会导致不满清朝统治的沿海人民与外国势力相结合而共同反清。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反清革命沉寂了几十年，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后，由深重的民族危机而引发的对清政府的强烈不满，才又发展成为新的反清革命高潮。其时岭南的反清革命思想先于全国出现，标志是1894年的兴中会成立和次年在广州策划的起义。

在岭南，聚集了反清的精英人物。

孙中山与郑士良，是较早萌发反清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郑士良从小仰慕太平天国的英雄，不满清廷的腐败，他在1883年加入家乡惠阳淡水的三合会组织，常到会馆练武，“渐具反清复汉思想”。③在广州，他又结识了许多三合会员，孙中山因是他的挚友，与会党自然也有所接触。1888年，郑士良返回家乡专门从事联络会员，被推为三合会首领。郑士良的主导思想是反清，他在探讨中国复兴的道路时，十分赞同孙中山提出的“勿敬朝廷”的口号。孙中山和他志同道合，引为知己，在思想上互有影响。

兴中会的四大寇——孙中山、杨鹤龄、尤列、陈少白，也是因为具有共同的反清思想而走到一起的。“孙、陈、尤、杨四人每日在杨耀记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之”。④在乙未广州起义时牺牲的陆皓东是孙中山的同乡，亦是关心国事之人。他在牺牲前的“供词”中说到自己反清思想的来源，一是“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二是受到孙中山反清思想的影响。他说：“吾……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吾方以外患日迫，欲治其标，孙

则主仇满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⑤

香港的另一新学团体辅仁文社,也是由具有共同反清思想的人组织起来的。其骨干分子杨衢云,对西方作品有广泛的阅读,他在谈起革命理论和历史时,以权威自居,据说他在这些题目的讨论中处于支配地位。杨衢云的性格、抱负和所受的教育,与孙中山有相似之处。另一骨干分子谢纘泰,1890年在香港认识了杨衢云,“知衢云蓄志反清复汉,遂与订交,极为相得”。当时民智闭塞,不能公开谈论革命之事,他们便以开通民智为号召,1892年2月在香港组织了辅仁文社,在研究社会和文学的幌子下讨论反清革命问题。辅仁文社的座右铭是“尽心爱国”。⑥加入者有刘燕宾、陈芬、黄国瑜、罗文玉、周超岳、温宗尧、胡干之等十六人。

三民主义中最先揭橥的战斗旗帜民族主义,便是由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陆皓东等一批革命分子最早提出来的。

反清民族主义思想除了在香港和广东地区最早发生和传播外,同时在檀香山、日本的广东籍华侨中也找到了响应者。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后重游檀香山,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举,得同志数十人,于是成立了檀香山兴中会。这在当时“华侨风气尚极闭塞,视中山反清言论为作乱谋反,足以导致破家灭族之灾”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1894年冬,孙中山从檀香山归国,途经日本。船在横滨停泊时,孙在船上向乘客及登轮侨胞演讲逐满救国。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亡命日本,在日本组织了横滨兴中会。在横滨的华人,逐渐接受了反清民族主义的思想,对孙中山的活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响应。

兴中会成立后便准备利用中日甲午战争所造成的动荡局势在广州发动起义。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各种具有反清动机和思想的人如杨衢云、谢纘泰、黄咏商等,在兴中会的大旗下集结。

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国的思想,而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又对《兴中会章程》进行了修订,更为鲜明地

揭橥反清的旗帜。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民族主义以反清仇满为主要内容,它继承了太平天国的反清思想和朱元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观念,但又比它们进步,因为它的兴起与中国近代面临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反清的直接目的是避免被瓜分命运,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建立强大国家。这个特点在兴中会的章程中表达得很清楚,章程没有提出反帝的口号,但要把中国从外国欺凌中拯救出来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它直指清政府“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反清是为了“兴中”,振兴中华。这与单纯的复兴汉族在中华民族中的支配地位和改朝换代是不同的。民族主义在它一开始便具有了近代民族独立运动的鲜明色彩,这是洪秀全和朱元璋的民族观念中没有的东西。

广州起义虽未成功,但表达了岭南革命派的反满情绪,南中国最早举起了反清革命的民族主义大旗,震动了中外社会。

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主义几乎与民族主义同时产生。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入会盟书的内容是“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⑦

在中国,把反清思想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便是由兴中会的誓词最早提出的。对于革命后建立民国的目标,杨衢云比孙中山更为坚定和明确。

据孙中山自己的回忆,杨衢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杨衢云坚定的主张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孙中山曾对《大同日报》的编辑刘成禺说:“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衢云与予大闹,几至用武,谓非民国不可。衢云死矣,衢云死矣,予承其志,誓成民国,帝制自为,予必讨之。”⑧又据陈少白的回忆,杨衢云的确曾因为孙中山对创立民国的目标不够明确而与他大吵了一通。陈少白说:“孙先生学医,后坚决排满,于共和制度尚有出入,与衢云交,既莫逆,衢云则非造成民国不可。一日议论有出入,衢云持先生辩,盛气欲殴之。予在旁,分开两人。”⑨

这个早熟的民主主义思想当时只是在岭南少数革命党人中有清楚的认识,而大多数群众则仍是“反清复明”或“反清兴汉”。1903—1905年,反满的革命思潮勃然兴起,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主义思潮,则相对比较薄弱。著名革命宣传家章太炎的文章里,反满言论俯拾即是,而民主共和思想则难以找到。有的革命刊物,排满言论激烈,民主言论不足。如《浙江潮》第9期上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认为,只要把满人的政权换成汉人政权,革命便完成了,建立什么政体关系不大:“果为中国人之中国,立宪可,专制亦未尝不可。”《中国白话报》第3期林獬的文章说,若是汉种人做皇帝,“我们百姓自然应该忠他”,“我们爱的是自己汉种的皇帝”。《江苏》第6期柳亚子的文章说:“公等今日其勿言改革,唯言光复。……与其臣事异种之华盛顿,无宁臣事同种之朱温。”因此,可以说不少人并不是“三民主义”者,甚至连“二民主义”也不是,只是个“一民主义”者。

在这种情况下,岭南革命派对于民权主义的认识和宣传便显得极为难能可贵了。他们由于多为华侨或留学外国的知识分子,或在香港等地接触过西方政治制度,对于民主政治了解和研究比内地的革命分子更多一些,而反对专制统治也更为坚定一些。

对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的设想,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是逐步明确起来的。1897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向一俄国人推荐他的英文著作《伦敦蒙难记》,当时,该俄国人与其他几个外国人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您希望在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来取代现存的制度呢?”孙中山回答说:“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又问:“换句话说,您是希望中国大体上能出现日本那样的变化了?”答:“对。不过,日本的文明其实就是中国的文明,它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希望中国向西方学习,像日本那样进行改革,但又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政制。他对于建立一个什

么样的共和国的概念还是不十分明确的。

同年,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把共和与“人群自治”联系起来,认为人民自议、自理的制度,便是共和的精神。他说,中国古代的“三代之治”以及当时僻地荒村的“敬尊长所以判曲直,置乡兵所以御盗贼,其它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议之而自理之”,便是共和的“精髓”了。

1900年6月,孙中山和杨衢云、郑士良等从日本横滨乘船赴香港,在行前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⑪这是最为明确的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公开表述。

1901年,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在访问了孙中山后报道说:“以联邦或共和政体来代替帝政统治,这是孙逸仙的愿望。”^⑫

直到1903年,孙中山才十分明确地指出了革命后要建立的是“民国”,要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等革命派在同盟会的宣言中明确规定“国体”必须变革,并对共和政体作出扼要的概述。

鉴于中国广大人民,甚至是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共和”的认识很肤浅,孙中山等岭南革命派在1905年前后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多说明,主要观点如下:

1. 以社会进化论为武器来论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落后到进步,由野蛮到文明的。它经历了“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现在已进化到“民权时代”了。所以我们应该推翻君权,建立民权。

2. 批驳反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谬论。改良派认为,民权使权倾于下,君权则使权倾于上,只有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最为适中,而且社会进化要一步步来,不可躐等。革命派则认为,学外国要取法乎上,要选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中国。而民主共和制度是现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制度,我们不要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亦步亦趋;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发挥人的主观努力,其进步方速。

3. 论述民主革命是改造中国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岭南革命派认为,民族革命

可以去掉恶劣政府,但单纯的民族革命是不够的,还要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去掉恶劣政府的根本。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自由平等的国民所堪受的。政体不好,国家不能富强,即使推倒了满清统治者,外人一样来欺负我们,民族危亡何日可了?要去掉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推翻清朝政府之后,要同时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这便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是使中国避免亡国厄运的根本。

4. 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实现民主共和制的步骤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国方案,这个思想和方案要在中国成功地实行,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于是,孙中山设计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具体程序和保障国民权益的五权宪法。即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分立的基础上,把考选权和纠察权也分立出来。这样,民主制度便更加完美了。

孙中山与岭南革命志士们是最早和最自觉地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建立民国的革命目标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前进过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飞跃,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也使中国近代的群众运动进入了“自觉的民主运动”的阶段。

三

当孙中山被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拥戴为他们共同的革命领袖时,正是反清的民族主义高涨之际。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目的,是他们联合的基础。而对于革命成功后建立一个什么政权,实行何种社会政策,大家是有分歧的。特别是对于“平均地权”一条,很多人不理解,不赞成,或根本就不理会。虽经孙中山剖切讲解后大家表示同意,仍没有引起重视,有的人认为这个问题是“不急之务”,用不着多加关注。有的同盟会本部干事,因觉得难以向入会者说清楚“平均地权”的涵意,干脆把其删去。欧洲同盟会成立后一年,有几位同志曾另组“公民党”为同盟会之预备会,而“公民党”的誓词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三事。东京同盟会成立后二年,会员张伯祥、焦达峰等在联络长江沿岸各会党时,又因嫌盟书中

“平均地权”一项意义高深,非知识幼稚的会员所能了解,而另组“共进会”,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可见,即使在革命队伍中,要确立民生主义,亦非易事。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逃亡海外后,专心研读各种政治经济书籍,比较深入地对欧洲社会进行了考察和研究而逐渐形成的。

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中对民生主义作了初步的定义,但由于忙于组织政党和筹划起义,对民生主义没有作更加明确和具体的阐述。

1905年冬,香港《中国日报》发表了冯自由撰写的社论《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这是同盟会成立后阐明民生主义学说的第一篇文字。文中,冯自由对土地私有和土地国有两种不同的所有制进行了对比,鼓吹土地国有的好处:1. 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居奇,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2. 土地家屋的价格,由政府调整,以保其平准,使大多数人得脱地主专制之牢笼,实救治贫富不均之良法。3. 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政体,其矿山森林道路大都官有,故举行土地国有的政策,实较其他国家为易。

土地国有之后如何赋课租税,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技术性问题。冯自由经过研究各种税法之利弊认为:“其最适合于吾国政治社会之状态者,盖莫如单税论之切实易行矣”。因为单税法有四大好处:1. 调和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弊害。税率确定后,可免贫民于地价腾涨之困厄。即使腾涨,也是损失与利益由国民共担,不会产生贫富不均。2. 维持财产之增殖力。对工商业征税过多会减少生产力,对社会进化之前途不利,如果土地国有,而单向之课税,则其生产力,国家将有以维持之,其增殖的利益为一般社会共享,不会因害怕产生贫富悬殊而压抑财产增殖力。3. 课税简单易行。税种单一,课税自然简单易行。4. 收入确实。列国对于各事业之课税,以征集纷扰,咸有不确定之弊,若实行单税法,税率又已确定,则其收入将较为确定,于国家之预算十分利便。^⑬

冯自由的文章把平均地权的理论来源、精神核心、原理原则、操作方法都讲得较为透切,是当时宣传民生主义的权威性论著。

1906年冬,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对三民主义又作了一番说明,其中特别对民生主义解说甚详。他说到民生主义是一种科学学说,具有理论基础;说到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在欧美已经积重难返,社会革命不可避免;说到中国人的眼光要看得远一些,要防患于未然;说到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说到解决土地问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最后,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与革命目标联系起来,突出了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宗旨,他说:“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⑭

另外,胡汉民在《民报》发表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和《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一系列文章中也对民生主义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胡汉民认为,“近世文明国家所病者,非政治的阶级,而经济的阶级也。于是而发生社会主义。其学说虽繁,而皆以平经济的阶级为主。”指出民生主义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他认为,土地国有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土地国有的目的和后果是消灭了地主阶级。因为土地国有“使人民不得有土地所有权,惟得有其他权(如地土权、永小作权、地役权等),且是诸权必得国家许可,无私佣,亦无永贷。如是,则地主强权,将绝迹于支那大陆。”国家成为地主以后,由国家决定地租的高低,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国家之课于地土上者,必经国会之承认,亦必无私有营利之弊,以重征以病农”。土地的收入为国民所共享,保证了经济上的平等:“吾国已为民权立宪政体之故,则地利所入虽丰,仍以为民政种种设施之用,其为益愈大”,“而民权立宪国家之富,尤共产也。夫均地之政,至平等耳”!

民生主义的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它的土地方案将会消除地主对土地的垄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节制资本也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私人资本和国

家资本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民生主义中蕴涵的对人民大众利益的关心也将有益于社会矛盾的调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三民主义可以说是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最自觉的、最进步的中国近代化方案。

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岭南革命派最早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水平。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革命团体能提出更为完整和更有远见的思想。如华兴会提出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科学补习所提出的口号是“革命排满”,光复会提出的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等等,都没有能把革命后如何建设一个源于欧美、优于欧美的新型国家制度的问题仔细地加以考虑,更没有提出可行的办法。可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岭南革命派由于对西方的了解更多一点,也看得更远一点。对世界潮流的了解和关注,是他们比其他区域的革命思想家高明的原因。

①② 吟喇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4页。

③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9页。

⑤ 邹鲁:《乙未广州之役》。

⑥ (美)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⑦ 《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⑧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转引自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

⑨ (台)《国史馆馆刊》创刊号,转引自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

⑩⑪⑫⑬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188、211、329页。

⑭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3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历史系
责任编辑:郭林

文化阐释：中国古代语言学之源

□申小龙

人类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之学，其缘起不外乎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异以及语言在逻辑思辨中的功能。在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语言的时空变异总是表现为经典语言和世俗语言的对立；语言的思辨功能又总是表现为语义辨析与政治阐释的统一。

书面语言和口语的日渐脱离，在许多古老民族的语言都发生过。书面语言意味着历史 and 传统，它往往以经典的形式凝固为宗教语言。古印度用古代梵文写成的《吠陀》(Veda)，就是印度婆罗门教最古老的经典。它产生于公元 1500 年左右，记载着关于神的颂歌和祷文，关于宗教祭祀仪礼的说明以及在这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为了便于传诵，它的语言具有丰富多彩的韵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公元 8 世纪它被一种从闪族人那儿借来的天城体梵文字母记载下来时，这种古老的诗体语言与口语——柏拉克里特语 (Prakrit) 的脱节已使人们深感不安。因为这意味着古老的圣歌将有越来越多地方不能为后人所了解，而圣歌的宗教意义及其对诸神的召唤力量，正取决于它的文句和发音的一切细节都真实和准确。于是，对其语言作精细的研究和描写，就成为经典传授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样，古代阿拉伯人一方面要把外来的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改编成易于为穆斯林理解和掌握的经典，一方面又须捍卫古典语言免受众多的阿拉伯方言和外国穆斯林的语言的影响，这也促使他们去研究和描写本族语的结构形态。

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起源，没有古印度和古阿拉伯那种宗教诠释的气息，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 classic 阐释。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是诸侯割据，王权旁落，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科学发展，在文、史、哲和

天文、历法、医学等领域，都出现了许多典籍，都有新的建树。然而，思想意识的传播要求有统一、规范的语言媒介，而社会动荡变革本身却引起语言的急剧变化和失范。由于诸侯割据，方言土音在相对封闭的政治地理环境中异常活跃起来，大大削弱了王都之音的交际效能；当时的标准语“雅言”也因“时有古今，地有南北”，而出现巨大的差异。从夏初用文字记录语言始，至春秋战国，历时千几百年，大量的典籍都因语言文字的演化变异、兴废损益而难以为当时的人理解。正是这种语文演变上的字词孳乳，称谓改易、假借纷纭、句法变异的千余年涓涓细流，汇成了春秋时代文化变革、整合、维新的巨大的语文障碍。于是，文化的发展便以语言的清理条梳和现代阐释为先声。春秋战国时代阐释和传播着大量典籍，孔子为此创立私学，编辑整理文化典籍，删定了“六经”。荀子曾高度评价六经的文化涵摄力：“《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毕矣。”(《荀子·劝学》)而要掌握经典的文化内涵，就必须如孔子所说“熟知其故”(《庄子·天运》)。这里的“故”，既指“故事”，更指“故训”。训诂是古代历史文化及其语言演绎的统一，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端奠定了一个文化阐释的框架。

“训诂”作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种基本范式，历代语文学者对它作过深入的解释。许慎《说文解字》云：“训，说教也。”“诂，训故言也。”段玉裁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分之则如《尔雅》析‘诂’、‘训’、‘言’为三，三而实一也。”这种理解强调了“训诂”的教化功能。孔颖达《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疏》云：“诂训传者，注

解之别名。……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这种理解强调了“训诂”的解释功能。马瑞辰《毛诗诂训传名义考》云：“盖诂训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这种理解强调了“训诂”的解经功能，并对解经的方式作了经内（诂训）、经外（传），字内（诂）、字外（训）的层次区分，而各种方式都可以“通”在“训诂”的大范式之下。近人黄侃云：“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此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黄耀先《训诂说丛》）这种解释强调了“训诂”的系统规范功能和学理性质。

以上对“训诂”的诸种说解，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中国语文传统的基本形态及其特征：它脱胎于春秋战国时代对经典著作的文化阐释，它的基本形式是解释性的，基本运作是说经，基本功能是教化，而它的基本原理是系统的。春秋战国时代奠定的这样一种东方语言研究的范式，使中国古代语言学在后来两千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系统条贯的语义解释参与时代的文化建设，并在这种自觉的参与中把握语言文字问题的本质，发展语言文字研究的学理的悠久传统。

作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源头，先秦时期的经典阐释已形成初步的类型。首先是“传”。“传”是解释经文的书。它不仅解释词语，而且阐述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因而“传”有传达的意思：“《周礼·掌节》：‘必有节，以传辅之’。传者，以符节递达者也，引申之，以言语递达者亦谓之传。”（胡韞玉《古书校读法》）同时，“传之解经，随条即释”。（《春秋谷梁传序疏》）因而“传”又有“专”（记事簿）的意思。

“传者，专之假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说文》训专为六寸簿。……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先秦时《周易》有经有传。其传由十翼组成，取羽翼辅佐之意，主要解释卦辞和爻辞。其中颇有“训诂”之意。如需卦彖辞：“‘需’，须也。”师卦彖辞：“‘师’，众也。‘贞’，正也。”孔子在给他的学生讲授《春秋》时，也阐发了史官记事在“微实”之外所含的“劝惩”意思。这种“训诂”之意在孔子弟子分别为《春秋》作的“传”中体现了出来。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左传》中就有“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左传·桓公二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左传·庄公三年》）等的词义训释。成书于汉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更以阐发词的微言大义为重点。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夏小正》，它的经文记夏历的月令，传文对经文详加解释，不仅解释词义，而且解释句法。如：“五月。乃瓜。……匭之兴……望乃伏。传曰：乃瓜。乃者，急瓜之辞也。瓜也者，始食瓜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谓之伏。”（《大戴礼·夏小正》）传文中将前一个“乃”释为急辞，将后一个“乃”释为“而”即缓辞。

其次是“解”。解有分析的意思，因此分析语义也称“解”。先秦的《管子》一书有《牧民》、《形势》、《立政》、《版法》、《明法》等篇，又有对这些篇的解释《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等。《韩非子》则有对《老子》的注解《解老》和《喻老》。它们不仅开训释《老子》的风气之先，而且在注疏章句的体例上也导夫先路。例如：“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于德。德则无德，不德则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韩非子·解老》）

其三是“说”。《说文解字》：“说，说释也。”“释，解也。”《墨子·经上》：“说，所以明也。”可见，“说”是对经文意义的说明。《墨子》中有《经》，又有《经说上》和《经

说下》，是对《经》的解说，例如：“〔经〕闻：传、亲。〔说〕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经〕虑：求也。〔说〕虑：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墨经》）《韩非子》也有《说林》、《内储说》、《外储说》。一般是先列经文，然后逐一解说，并征引故事来论证。例如《内储说下·经一》：“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是以人主久语，而左右鬻怀刷。”

从本质上说，经典阐释是一种文化阐释。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不仅在经典阐释中萌动了汉语的解释意识，而且在百家争鸣中激发了对汉语的辨析之术。由于政治上的分裂，传统思想的失范，各阶级或阶层都力图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形成了一批善于论辩，富于批判精神的著作家。他们力图从语文的辨析中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而各种辨析都是为哲理和政治而运作的，正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这种带有文化阐释使命的语文辨析，同样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起源注入了血肉与生命。

古希腊的哲人也曾从思想的探究中引发语言分析的契机。在一些人看来，词由事物的本质而命名，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词由人的规定和习惯而命名，二者随意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词和事物往往有一对多和多对一的关系。正是这样一场争论，触发了最初的以逻辑为基础划分词类的语言学传统。但是，同样是逻辑论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古希腊的学者没有在他们的语言分析中注入象中国古代学者那样强烈的政治使命意识；由于语言形态特点的不同，古希腊的学者在语言分析中更多关注的是语言的形式而中国古代学者则直接作语义的探究。

先秦时期，语言分析的主要形式是词义辨析，而这种形式的主要功能是阐释政治主张和哲理、伦理。由于解释者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不一，因此对同一个字往往会有多种解释，使之具有丰润的文化内涵。例如“恕”字。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

的解释。墨家的解释却是：“恕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墨子·经说上》）

又如“仁”字。《韩非子·诡使》释曰：“宽惠行德谓之仁。”《管子·戒》释曰：“以德予人者谓之仁。”《墨子·经说下》释曰：“仁，爱也。”《国语·周语》释曰：“博爱于人为仁。”《礼记·表记》释曰：“仁者天下之表也。”同一位著作家在不同的语境中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如《孟子》中对“仁”的解释有“仁也者，人也。”（《尽心下》）“仁，人心也。”（《告子上》）“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仁，人之安宅也。”（《离娄》上）“夫仁，天之尊爵也。”（《公孙丑上》）

中国早期的著作家还十分重视用词的“名分”之辨演绎“礼制”。从天子到庶人，呈严格的阶梯状辨析。例如：

“凡自称，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边邑，曰某屏之臣某；其于敌以下曰寡人；小国之君曰孤，摈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摈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摈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摈者曰寡君之嫡；公子曰臣孽，士曰传遽之臣，于大夫曰外私。”（《礼记·玉藻》）

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床曰尸，在棺曰柩。（《礼记·曲礼下》）

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公羊传·隐公十一年》）

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公羊传·庄公二十三年》）

礼制的语文演绎不仅表现在不同地位之人的称谓上，而且表现在不同环境中人的称谓上。对于天子来说，“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临诸侯，眡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礼记·曲礼下》）对于诸侯来说，“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寡人；其在凶服曰适（嫡）子孤；临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孙某侯某；死曰薨；复曰某甫复矣；既葬见天子曰类见，言谥曰类。”（《礼记·曲礼下》）对于士大夫来说，“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某，于外曰子，于其国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称曰某。”（《礼记·曲礼下》）对于

诸侯的配偶来说,“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论语·季氏》)

礼制的语文演绎还表现在社会、政治活动本身因人因时因地因事的不同“名分”上。就“时”而言,“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觐曰视。”(《周礼·春官·大宗伯》)“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礼记·王制》)四时的田猎活动也有区分,“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谷梁传·桓公四年》)

就“地”而言,“女在其国称女,在塗(途)称妇,入国称夫人。”(《公羊传·隐公二年》)“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左传·文公七年》)“地”与礼制的关系最直接地体现在行政区划上,只是各种古籍所述并不一致。《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周礼·地官·遂人》云,“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鄆,五鄆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国语·齐语》云,“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

就“事”而言,“凡胜国曰灭之,获大城焉曰入。”(《左传·文公十五年》)“(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左传·闵公二年》)“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武功曰多。”(《周礼·夏官》)

就“人”而言,“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公羊传·隐公五年》)

从现代词义学的角度看,先秦的词义辨析在方法上已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主要表现在词义的逻辑分类和词义与词形的关系辨正上。词义的逻辑分类是词汇研究由单字进入系统的第一步。先秦诸子对词义的逻辑分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分类的尺度很不一样。最直观的是根据词义的所指来分。如《尹文子·大道上》认为“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黑白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贫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愚贤爱憎是也。”进一步,则是根据词义的抽象程度来分。如墨子将事物的名称分为三类:一是达名即通名,例如“物”。一是类名,例如

“马”。一是“私”,即专有之名,如“臧”。荀子又进一步认为“共名”“别名”有内部层次之分。“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荀子·正名》)事实上,在先秦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了词义逻辑分类的实践,即寻找词义之间的共同点,以共同点类聚词汇,并加以解释。《尸子·广泽》云:“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异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博、介、纯、夏、帙、冢、陲、阪,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很强调“裁物以制分”,认为“以实覆名,百事皆成。”然而在尸子看来,“实”不仅指“达情见素”、“复本原始”,回到事物本身,而且指人类认识事物时对事物属性的某种心理类推。所以“天”“帝”“皇”“后”“辟”“公”就有了与“弘”“廓”“宏”“博”“介”“夏”等共同之“实”——“皆大也”。

词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先秦的词义辨析中已有反映。《墨子·经下》作过细致的论述:

同音异义。“橘、茅,食与招也。”“橘”乃“楮”字之讹,指木瓜。而“茅”是古人用以招神的。楮、茅二字音同而义异。

同字异义。“为丽不必丽”,上“丽”训偶,下“丽”训佳,偶丽不必是佳丽。“为暴不必暴”,上“暴”训恶,下“暴”训暴露,为恶者不必暴露出来。

一词多义。“为夫以勇,不为夫”,前一个“夫”有“大丈夫”的意思。后一个“夫”是“夫妇”之“夫”。

同字异词。“为屨以买不为屨”。言制屨而从人买得。前一个“为”是动词,后一个“为”是系词。

义素异同。义素是一个词的意义构成中最基本的单位。“俱斗,不俱二,二与斗也。”“二”与“斗”都含有“二”的义素,因为斗必俱二人,但“二”并不含有“斗”的义素,二人俱却不一定“斗”。所以说“二”与“斗”的义素重合在“斗”,不在“二”。

在先秦的词义辨析中,还透露出语音、文字、语法方面研究的消息。而这一类研究同样是在经典阐释的框架中生发的。

从语音的方面来看,先秦的词义训释广泛使用了同音或音近相训的方法。沈兼士曾云:“夫训诂之法有客观的与主观的区别。前者为以凡通语释古语或方言,如《尔雅》《方言》之属是也。后者为训诂家本个人之观察,用声训之法,以一音近之字细绎某一事物之义象,如《白虎通》、《释名》之属是也。”(《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然而张世禄在《中国音韵学史》中则指出:“古今方国语言的演变,大部分以音韵为枢纽,所以要‘通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也大都以音同或音近之字相诂。”这就在词义训释中展开了语音的考究。其方法主要有:

本字相释。如:“蒙者,蒙也;比者,比也。”(《易·序卦》)“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礼记·祭统》)

声旁相释,如:“仁者,人也。”(《礼记·表記》)“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征之为言正也。”(《孟子·尽心下》)

同声符字相释。“富也者,福也”,(《礼记·郊特性》)“泽者,所以择土地也。”(《礼记·射义》)

同音异字相释。“德者,得也。”(《礼记·乐记》)有时被释字与训释字是初文和后起字的关系。如:“成者何?盛也。”(《公羊传·庄公九年》)“兑者,说(悦)也。”(《易·序卦》)

音近字相释。“义者,宜也。”(《礼记·中庸》)“祈,求也。”(《礼记·射义》)“乾,健也。”(《易·说卦》)

词义训释中语音的考究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词与词的同源关系,并且提供了古音系统的消息。王力曾指出,《尚书大传》以鲜方训西方,可见“西”字在上古收音于[-n]。《说文解字》以燬训火,可见“火”字在上古属微部,以准训水,以推训春,可见古韵文微对转。(见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

从文字方面来看,先秦的词义训释偶尔也采用字形分析的方法,并且也有很强的劝惩意味。例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

侯在秦国求医。医者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晋相赵孟问医者:“何谓蛊?”医者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穀之飞亦为蛊,……皆同物也。”把“蛊”分析为器皿中的毒虫,形象地解释了“蛊”的词义及晋侯“惑以丧志”的病根。由于过于功利的政治阐释和当时对文字结构认识的局限,先秦的字形分析往往与造字理据相距很远。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回答潘党“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的谏议时,认为武之德在“戢兵”,他的根据就是“夫文,止戈为武。”然而从造字原理来看“止”是“趾”的初文,表示脚的动作,并无停止的意思。类似的字形分析还有“故文,反正为乏。”(《左传·宣公十五年》)“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韩非子·五蠹》)

从语法方面看,先秦的词义训释涉及不少虚词的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例如《墨经》释“且”:“且,言且然也。说曰:且,自前曰且,自后曰已,方然亦且。”这就是说,事件未结束时用“且”,事件结束则用“已”,两个事件并列也用“且”。又如《左传·庄公七年》释“如”:“星陨如雨,与雨偕也。”表明“如”当作“而且”解。在对一些虚词的解释中依然贯注着政治阐释的精神。《公羊传》在解释《春秋·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一句时这样释“及”:“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由于“及”体现主语的施事意志,因而“及”字在先秦的语文分析中被视为划分尊卑轻重的界线。“及”之前为尊,为主,为重,“及”之后则反之。由于“及”在语义上的这种倾斜标志作用,它在语法上往往由表示平等关系的连词向表示动作对象的介词转化。

在经典阐释的母体里孕育的中国古代语言学,自初生起就涵泳于语义—文化的双向建构之中,逐步形成了以“训诂”为框架的独具人文精神的研究规范。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海峡两岸开展闽南方言研究之我见

□ 詹伯慧

一

闽南方言是汉语方言中源远流长、多姿多采的一支，流行于闽、粤、台、琼、浙等省，在海外华人社区也是主要交际工具之一。几十年来，在汉语诸方言中，闽方言是研究成绩较为突出的方言，而闽方言的研究成果中，属于闽南方言的又占了80%以上。台湾省的语言学者对岛内的闽南方言（台语）早就有了相当全面的调查，整理出版了不少有关闽南话（台语）的著述。闽粤两省通行闽南方言的闽南厦、漳、泉地区，粤东潮汕地区和海陆丰地区，粤西雷州半岛地区等，多年来也先后开展过一些调查研究，发表过一些著述。浙南地区的闽南话通行范围不广，但自50年代以来，也有学者进行过零星的调查，发表过有关的文章。海南岛的闽南方言是全岛的交际用语，台湾、大陆乃至海外的学者，近几十年都有人作过调查，记录过一些语料，也发表过少量的专著及单篇论文。近几年来，汉语方言调查之风日盛，在1988年（福州）、1990年（汕头）和1993年（香港）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上，涉及闽南方言的论文都占了绝对的多数。

二

尽管闽南方言的研究不断有所进展，但是，倘若要做到全方位地揭示闽南方言的整体面貌和各地的特色，无疑还有许多课题和大量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过去散居各地的闽南方言学者各自为战，交流的机会不多，如今海峡两岸的方言研究者终于能够一起讨论切磋、交换信息，趁此大好机遇，正宜

综观大局，各抒己见，集思广益，策划未来。从实际情况出发，个人认为，开展两岸闽南方言的调查研究，当前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组织力量，分工协作，对闽南方言作一番全面的调查。这一项带有普查性质而又比普查更为深入的基础工程，不妨先把业已调查过的调查点作一番摸底统计，列出清单，然后由有关语文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语文系（科）及当地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地方志编纂部门等组织业务力量，把尚未调查过的闽南方言点逐县逐市分别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来。就目前情况看，台湾省闽南话（台语）的调查工作基础较好，有的地点已有方言专著刊行，只需对未有著述的地点作些补充调查。福建省是闽南方言集中的地方，当地的方言工作者在编写《福建省方言概况》和《方言志》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语料，有的县（市）已对本地闽南话作过较全面的调查，也出版过几本深入研究的专著；如张振兴先生的《漳平方言研究》等，但是，离每个县（市）都有一本方言调查报告（专著）的目标，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广东省的闽南方言势力最大的是潮汕方言（通称潮州话），其使用人口甚至超过福建的闽南话，历来海内外有不少人对潮汕方言发生兴趣，发表过许多有关潮州话的著述。根据汕头大学林伦伦教授的统计，从1947年至1992年，潮汕方言的研究成果达156项。可是，仔细归纳一下这些成果的类型，属于系统调查、记述潮汕地区某个地点方言的却屈指可数。而且，这156项成果中，绝大部

分的内容又仅仅限于汕头话或潮州话,并且着重于词语的收录和考释,较系统地反映一个地方潮州话全貌的,迄今还似乎只有李永明的《潮州方言》。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方言学家张盛裕是潮汕地区潮阳市人,他对自己的乡音体会最深,考察最细,先后在《方言》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揭示潮阳方言特点的专论,可是,至今也仍未有全面系统介绍潮阳话的专著面世。由此可见,粤东潮汕方言的调查研究,依照逐县逐市调查的思路,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近年来潮汕地区大兴弘扬潮汕文化,建设“潮州学”之风,作为潮汕乡土文化载体的潮汕方言,自然也会受到重视。方言工作者正宜借此机遇,把潮汕地区闽南话的全面调查和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可望会收到更好的效果。至于粤西南雷州半岛几个县(市)的闽南方言——雷州黎话,虽然曾有学者发表过几篇论文,也出版过美籍著名语言学者余蔼芹的专著《雷州遂溪方言》和当地学者蔡叶青的《海康方言志》,但作为雷州地区中心城市——雷州“黎语”的整体面貌如何,各县的“黎语”各有什么突出的特征等等,迄今仍未有系统的调查报告,也有待我们去调查。除了闽、粤、台三省外,海南省的闽语归属问题虽有不同意见,但一般仍暂归闽南方言系统,目前除少数地点如海口、文昌、万宁等县(市)较为引人注目,已先后发表过少量的调查成果外,其余大部分海南闽语通行的县(市),迄今也还没有开展过认真的方言调查。如此等等,足见闽南方言的研究,当务之急还是首先做好各闽南话区中逐县逐市的闽南话调查。

2. 广泛收集资料,开展专题研究。如前所述,各有关地区都进行过零星调查,但未必进行过认真的整理分析。因此,凡已作过调查的,要尽快整理分析,以期早日成为研究成果,公诸于世。在此基础上,对那些在闽南方言中较为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有必要深挖细找,进行专题研究。例如文白异读的现象,变调变音的现象,训读的现象等等,在不同的闽南话点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只要广泛搜集资料,深入发掘,各种与众不

同的特征便可得到揭示。近十几年来,揭示各地闽南话种种特殊表现的专论屡有出现,例如关于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关于海南闽语的训读现象,关于潮汕话的变调现象,以及关于闽南方言的某些特殊语法现象等等,都有学者进行过相当深入的探讨,这次研讨会曹逢甫教授提出的论文《闽南语动词分类研究》便是一篇深入讨论闽南方言语法特征的专论。象这类专论就某个方面深入下去,仔细剖析的工作做多了,对闽南方言研究的全面发展,无疑也将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3. 综合比较,揭示整体面貌。闽南方言遍布海峡两岸好几个省,在各省各地调查研究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及时着手集结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者的有关资料和论点,进行归纳统计,综合分析,使局部性的成果转为综合比较的素材,开展综合研究,这无疑是两岸学者的共同愿望,也是闽南方言研究进入更高层次的具体体现。例如,50年代董同禾先生撰写《四个闽南方言》;80年代陈章太、李如龙两位先生撰写的《论闽方言的一致性》和《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就都是这方面很有益的实践。只可惜限于客观的条件,当年董同禾先生只能选取闽南方言中的四个地点来作比较。陈、李两位都是闽南人,都亲自参加过闽语的实地调查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应该是最有条件进行综合比较的,但由于他们毕竟还只是充分掌握福建省内的闽南话情况,对其他地区的闽南方言不一定能了解得很透彻,这就需要两岸学者携手合作,共同考虑闽南方言的综合比较问题了。一旦到了综合比较研究硕果累累的时候,闽南方言的研究也就进入一个新境界,上一个新台阶了。

4. 绘制方言地图,编纂方言词典。此外,不容忽略的工作,就是方言地图的绘制和方言词典的编纂。通过方言地图表现方言特征的分布来表现各地的差异,这是19世纪语言地理学兴起以来的“传统节目”,我国语言学界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许多方言研究专著都没有方言地图。专门拿方言地图汇集出版的专书,除了几年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外,以一个方言为对象而出版地图集的,迄今还只有日本龙溪书舍刊行的叶祥苓著《苏州方言地图》。这和我国几十年来方言研究工作不断发展,方言著述大量问世的现状是很不相称的。我们如今面对着闽南方言这样一个通行地域跨越海峡两岸好几个省,拥有许多不同支系的方言群体,在编写有关闽南方言的著作时,是决不能不考虑方言地图的安排的。可喜的是,近期已有一些记录、描写某地闽南方言的专著注意到方言地图的绘制了,随着海峡两岸闽南话调查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闽南方言地图集的设计和绘制,必然也会提上议程。

方言词典的编纂,能使各地方方言的调查研究成果得到最集中的反映。一部方言词典,从选立条目到注音、释义到提供例证,体现出众多方言工作者长期积累的集体智慧。闽南话在海峡两岸有很大市场,在海外华人社区中广为流行。一部高质素的闽南方言词典正是各地应用闽南话的人翘首以待的。诚然,闽南方言的字(词)典的编纂,多年来已有过一些成绩。早在本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就已经编纂了迄今流传颇广的由甘为霖(Campbell W.)主笔的《厦门话新字典》。近几十年来,随着闽南方言研究的进展,一些比较严格按照现代词典学方法编纂的闽南方言词(字)典也陆续问世,如日本学者村上嘉英编纂的《现代闽南话词典》(1981),香港中文大学蔡俊明编的《潮语词典》(1976)等,在海内外都有相当的影响。至于80年代由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编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和最近由周长揖先生编纂的《厦门方言辞典》,则无疑是中国大陆最有影响的两部闽南方言字(词)典。特别是《厦门方言词典》,这是李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中的一部,

经过比较严格的审校,可以说是闽南方言词典中后出转精的力作。然而仍然令人感到不足的是:这些已刊的闽南方言词典,几乎都是以厦门话为依据的方言词典,其他闽南方言地区,包括闽南以外地区的一些闽南方言支系,迄今很难看到有方言词典面世。当然,我们今天也无需给每一个县、市都编方言词典,但至少闽南方言中几个大的支系,那些跟厦门话有较大距离的闽南话,都有必要编纂出一套方言词典来,以利于社会上的应用。例如潮汕方言、海南方言、雷州方言(黎话)等,倘若都有一部方言词典的话,和厦门话方言词典对照着看,闽南方言中几个分支的独特个性也就会呈现出来,一览无遗。从实用的角度看,使用和研究汉语方言的人,也都迫切希望能够看到本地方言的辞典尽快编出来,这是我们方言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事。

5. 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研究。地方方言反映多姿多采的地方文化,海峡两岸各个支系的闽南话,必然也反映出闽南文化的多姿多采。在进行闽南方言的调查研究时,结合当地历史文化背景来探讨,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以往我们方言工作者在这方面显然注意得太少了。从方言文化学的角度进行方言资料的搜集就很不够,研究地方文化的学者也很少提及属于当地文化载体的语言,不大考虑方言的特色。这样的互不挂钩现象今后必须改变。今后我们研究闽南方言,无论哪个支系,都有必要对涉及当地文化的语言现象作必要的探索与考证,闽南方言各地的地名就大有文章可做。总之,联系文化,联系地方风土人情,联系历史背景为方言与文化的结合研究开拓出广阔的道路来,这是很值得大家重视的。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陶原珂

对于“风骨”的含义，论者各有所指。日本汉学家目加田诚教授在《刘勰的〈风骨〉论》一文中曾坦率地说：“所谓风骨，意思很难捉摸。”这句话道出了许多学者的困惑。历代学者的解释影响最大的当数黄侃。他在《文心雕龙札记·风骨》中说：“‘风骨’，二者皆假于物以为喻。文之有意，所以宣思理，纲维全篇，譬之于物，则犹风也。文之有辞，所以摅写中怀，显明条贯，譬之于物，则犹骨也。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蹈空虚之弊。或者舍辞意而别求风骨，言之愈高，即之愈渺，彦和本意不如此也。”当代著名学者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也表示赞同黄侃的观点：“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黄先生论之详矣，窃复推明其义曰：此篇所云风情气意，其实一也，而四句之间，又有虚实之分。风虚而气实，风气虚而情意实，可于篇中体会得之。辞之与骨，则辞实而骨虚。辞之端直者谓之辞，而肥辞繁杂亦谓之辞，惟前者始得文骨之称，肥辞不与焉。”这些见解都不无见地，但详察之后，却觉有偏颇的地方。

“风骨”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不应拆开来作两个概念来理解。但它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论述方便起见，可以从两个侧面去剖析。

“风”字在《文心雕龙》中出现凡数十处。而其用义并非同一，概括地说，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作为自然现象的风来使用的，如“秋风飒飒”、“甘风和雨”等；二是作书名《风》、《雅》、《颂》来使用的；三是作为风气、风格来使用的，如“溯乎玄风”、“构深玮之风”、“追清风于前古”等；四是

作为“风骨”之风来使用的，如“风冠其首”、“必始于风”等。可见刘勰使用“风”字是有多种涵义的，不能以一代众。前三方面容易理解，第四方面的“风”的含义则可从原文的分析中得到解答。“诗总六义，风冠其首”，刘勰把“风骨”的“风”联系“诗六义”的“风”来讨论，说明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诗六义”的“风”的意思，根据魏张揖《广雅》，“风”有“动”、“告”、“教”数项义训。王念孙《疏证》：“《释名》云：‘风，放也，气放散也。’”

《诗序》云：“风，风（去声）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凡言风者皆动义也。”又《诗大序》说：“风，风也，教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郑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由此可知，“风”又被训为“讽喻”、“教化”（此义后来写成“讽”字）等义，而如《诗大序》所言，“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则“风”又被理解为“使之动”的意思。刘勰“风骨”论的“风”之得名，便是如同自然之风拂动万物（用于

讽喻、教化而称为风，也是由此转化而来），取作品述情显朗，爽爽有一种风气，可以感召或撼动人心、摇荡性灵之意，也即是文章的感染力，是作者经过反复考虑和蕴结于中的真实感受而发出的情感与读者产生共鸣而形成的一种无形的感染力。它对社会和读者产生教育、讽喻的作用，即“教下”“刺上”的作用。因此，“风”是文章撼动人心、摇荡性灵的感染力，是文章的一种特质。

对于“风骨”的“骨”的含义，历来论者分歧更大。黄侃、范文澜都理解为文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

“风骨”辨

□杨崇生

史》则说：“‘风骨’二字，一般都是根据黄侃的说法，认为‘风’则文意，‘骨’则文辞，但《风骨》中‘风骨’是和词采对称的，显然是内容问题。文中‘骨’虽常和‘辞’联系着，但‘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以及《诠赋》：‘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议对》批评陆机说‘腴弗剪，颇累文骨’等话，都指内容。从‘结言端直’和‘析辞必精’看，当系指作者对事理的认识。”（见该书第一册311页注）。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说：“所谓‘骨’，是坚实的事理内容及清晰的条理结构”（第一册369页）。各种不同看法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骨”最早被作为人的体格特征广泛用于对人物的品鉴。《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贵贱在于骨法”的说法，王充《论衡篇》有《骨相篇》，其中说：“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于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这里说到了“骨相”“骨体”“骨法”等，都是用于人物的品鉴的。后来“骨相”、“骨体”的概念被引申到对于书法、绘画方面的艺术评论中。东晋顾恺之《论画》已有“重叠弥纶有骨法”，“有奇骨而兼美好”的说法。南齐的谢赫《古画品录序》里，谈到作画“六法”中有“骨法”用笔这一法。又称曹不兴画：“观其风骨、名岂虚哉！”书画论中的所谓“骨法”，是指字画有神韵有生趣，线条挺拔用笔犹劲。这与刘勰说的“风骨”虽不相同，但却相通。上述的画论中对于“骨”的引申义，正是刘勰把“骨”用到文学领域的意义。

《文心雕龙》中谈到“骨”的地方凡数十处。除了少部分如“吹毛求瑕，次骨为戾”的“骨”，“虽有次骨，无或浸肤”的“骨”可解作“切骨”的意思；“甘意摇骨体”的“骨”可解作“身体”的意思外，其余大部分的“骨”都与文章有关。刘勰把“骨”与“文章”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它们有某一特质相似或相同，有一个交合点。物质的骨很容易使人想起“硬”或“有

力”，而文章也很讲究刚劲有力。后代人们所说的“建安风骨”，其中一个意思也是说建安时期的文章慷慨激昂强劲有力。再从《文心雕龙》中专门论述“风骨”的《风骨篇》来看，就再也清楚不过了。如“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这里以“骸”喻“骨”，若按黄侃的说法，“辞之待骨”岂不变成“文辞需要文辞”了么？这当然不通。又如“沉吟铺辞，莫先乎骨”，是说反复推敲文辞要以“骨”为先，先要考虑文章的骨架和力度，再推敲运用文辞。先后有序，主次分明。“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是说注意锤炼文骨的人，辨析文辞必然精当。前提明确，没有游移的余地。“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是说过多繁杂的辞藻会影响甚至掩盖文章的力量，用精当的文辞才会使文章强劲有力。刘勰还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文辞端直精要，坚实刚健，就形成“骨”，如果内容贫乏，辞藻过多，繁杂而失去条理，就是无骨的证明。再如，“夫翬翟备色，而翻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刘勰用鹰隼比喻骨，用野鸡比喻辞藻，鹰隼因“骨劲而飞猛”，所以“翰飞戾天”，野鸡“肌丰而力沉”，因而“翻翥百步”。显而易见，“骨”与“文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黄侃和范文澜先生说的“骨即文辞”，并非刘勰本意。刘勰在这里的意思是，“骨”即文章的骨架强劲有力。

刘勰在《风骨》篇中，还多次提到“气”的概念。他说：“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黄叔琳在《文心雕龙辑注》中在“并重气之旨也”句下评曰：“气是风骨之本。”魏文所论“文以气为主”及黄叔琳说“气是风骨之本”是对的，他们指出了“气”与“风骨”之间的关系。古人是很看重“气”的，所谓“气之清者上升之为天，气之浊者下沉之为地”，天地都

是气形成的，而人则秉承气而生成，所以人必须要有一种“守身之气”，气是生命之本或人的守身之物。古文论中所谓“文气”也源于此。而人的守身之气与文气都是蓄于内而发于外的。所谓“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就是强调写文章一定要作者内在的“守气”或血气充实，这是写文章的根本或关键的因素，只有“务盈守气”，才能写出“风清骨峻”的作品。这就是刘勰一再强调“气猛”、“风道”、“骨劲”的原因。他还用鸷鸟的高飞作比喻说明：气盛则风生，风生则意豁而情显，以气运辞，故语言健劲挺拔，“捶字坚而不移”；以气负声，故音调顿挫低昂，“结响凝而不滞”。文章达到这样的境地，才是“刚健既实，光辉乃新”，才能感动人，坚强有力。“风骨”的表现在于“力”，所以又说成是“风力”。“风骨”的真实意义，乃在于此。

任何文章都是靠文辞来表达的，所以刘勰在论述“风骨”问题以后，进而提出“风”、“骨”、“采”三者完美统一的写作或鉴赏标准。他说：“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他认为作品没有风骨，空具词采，则如“雉窜文囿”；只有风骨而无文采，则如“鸷集翰林”。“雉窜文囿”固然不好，但“鸷集翰林”也不完美，刘勰在这里主张写文章既要具备“风骨”，又要有

文采美。“风”、“骨”、“采”三者完美，才能成为“藻耀而高翔”的“文笔之鸣凤”。刘勰用野鸡、鹰隼、鸣凤分别比喻没有“风骨”之文、只有“风骨”而没有文采之文，以及“风骨”、文采兼备之文，可谓精当。再从“沈吟铺辞，莫先乎骨”、“炼于骨者，折辞必精”、“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微也”几句来看，“骨”和文辞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文辞的推敲与文章的是否刚健有力更重要。但无论如何，文辞都只能是“风骨”的补充，它是附丽于“风骨”而为“风骨”服务的，所以说“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气、风、骨、采”四者关系密切，它们互相区别，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形成了对文章较为完美的审美旨趣。《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高度概括了四者的关系。“情”、“气”对作者而言，是作者内在的情态、气质；“风”则是对文章或作品而言，指的是作者的“情”“气”在作品里的反映和表现，是一种感染读者的力量。“辞”（即辞采）“体”是对作品的形式而言，骨则是对作品的刚健有力的风格的一种要求。“气、风、骨、采”，中心的问题是“风”、“骨”。“气”为产生“风骨”的根本，文采是附丽于“风骨”并为“风骨”服务的。

作者单位：广东茂名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清代诗歌戏曲小说间的联系渗透与互补

□沈金海

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体系等方面的限制,中国古代文学表现出了思想上进步有限、形式上不断翻新的特点。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许多人都把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等同于各体文学的替代史: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戏曲小说,后浪推前浪,各体文学皆独擅其美,而相对忽略对后起文学与原有的而又继续存在下去的文学样式相互间关系的研究。事实上,中国的文学长河,始终呈现着兼收并蓄、相互融合、前赴后继的态势。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古典文学各种体式已基本上发展完备,不仅诗歌创作融贯百家、兼采众长,以求自成一格,小说戏曲为更多的文人所喜爱和掌握,地位进一步提高。而且,诗歌、戏曲、小说之间也在全方位、多层次的联系中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渗透、互补的态势。[1]

一

有几种表层现象是最容易说明这种联系、渗透与互补的。首先是一人身兼诗人、戏曲家或诗人、小说家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清以前就有,如唐代元稹诗人兼作传奇(《莺莺传》),明代汤显祖不仅有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临川四梦”等戏剧,他的诗歌创作在明代也堪称一流。王夫之将“将汤义仍之灵警”和“刘伯温(基)之思理,高季迪(启)之韵度,刘彦昂(炳)之高华,贝廷琚(琮)之俊逸”相提并论。其

他如王世贞、徐渭、阮大铖等,都能在两个甚至两个以上门类里取得突出成就。在清代兼有两长在文人中已是极为自然之事。初期吴梅村是诗歌作手,而其传奇《秣陵春》亦曾令不知多少观众起故国之思、兴亡之感。近代戏曲专家吴梅说:“大抵清代曲家,以梅村、展成(尤侗)为巨擘。”评《秣陵春》云:“虽摹写艳情,颇类玉茗,而整齐紧凑,可与《钧天乐》相颉颃。余最爱《赋玉杯》之《宜春令》,《咏法帖》之《三学士》,此等文字,曲家从来所未有,非胸有书卷,不能作也。”[2]其杂剧《临春阁》、《通天台》在清杂剧中亦属上乘之作。余如洪升、孔尚任、尤侗,都是著名的戏曲家,而他们的诗作亦取得了很高成就。洪升还评点过小说《女仙外史》,他的《长生殿》还与集子中的几首七夕诗有联系。其余还有名气略小的黄周星、吴绮等。黄于诗歌、戏曲、小说无不用力,其戏《人天乐》、小说《补张灵崔莹合传》、诗《九烟先生遗集》都表现了一种怪诞的风格。清中叶以诗名扬海内外而在戏曲创作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是江右三大家之一的蒋士铨。蒋为人忠孝,其《忠雅堂诗集》中颇多忠孝节义的内容,其《红雪楼十二种曲》亦如此。同时及稍后,广东黎简、大兴舒位、秀水王昙等都是诗人中的能诗者,而黎有《芙蓉亭乐府》,舒有《瓶笙馆修箫谱》,王有《同心院》等。王昙在给舒位《瓶水斋诗集》写的序中说:“十四年己巳,与太仓毕子筠华珍,流寓京国,作

《伶元通德》、《吴刚修月》数十出，微服听酒楼之歌，重赂购乐人之价，若王昌龄之旗亭次第，李协律之流播管弦，王门伶人争为搬演也。”可见舒位的剧作不仅数量多，而且还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剧作家的创作态度也非常认真。鸦片战争以后，多才多艺的姚燮在创作了大量反帝反侵略诗歌的同时，还写了《退红衫》、《梅沁春》、《苦海航》等多种剧本。到了清末，苏曼殊等人在诗歌、戏剧、小说诸方面的创作上都进行了革新，是一人工数艺的新一代作家的典型。

其次是诗人、戏曲家、小说家之间的相互往来。清初，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阎尔梅、冒襄、黄宗羲、余怀、杜濬、曹贞吉、王猷定、汪懋麟、毛奇龄等一大批名诗人都与当时杰出的说书艺人有往来并赠诗与他们。康熙时期，洪升《长生殿》一剧写成，赵执信为之制谱，吴舒凫为之论文，徐大椿为之订律。此剧在佟皇后忌日上演，使在场的赵执信、查慎行都削了国学生籍，查为此后悔不已，改字悔余以志不忘（原字夏重）。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完成后，当时被推为诗坛领袖的同乡前辈王士禛为之评点，阅后交还蒲松龄时寄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据铸雪斋钞本）（王还评过《女仙外史》等）蒲松龄感激地作了一首和诗《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诗云：“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3]孔尚任的《桃花扇》题诗者也非常多，著名者如田雯、宋荦之辈，不著名者有陈于立、侯铨等人。这种诗人、戏曲家、小说家之间的普遍交往说明，在清代各种文体的作家已经进入了一种自觉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状态。

第三种表层联系，是诗歌创作成为戏曲小说创作的一种手法以及戏曲小说语言直接被诗歌创作所吸收。中国古代小说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从上古神话、秦汉传说、魏晋志怪、唐人传奇演变而来的文言小说，这类小说一开始就用简洁的散文体叙写，后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史传笔法以摹写人物。

这类小说除了在用典、写意境方面外，离诗歌较远。另一类是从讲唱文学发展来的白话小说。这类小说开始时由于作者都是较低层次的文人，他们创作时不象文言小说作者那样强调诗与文的不同，由于他们常常与讲解佛经有联系，又处于唐代这样遍地是诗的时代，所以他们的创作常常根据讲唱的需要，适当地运用一些韵语——诗或词。这些作者从小就接受诗的教育，在诗词创作方面一般都有一定的功底，因而，尽管他们常常为求内容而舍格律，这些插入的韵语中仍不乏佳作。后来，到《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小说已掌握在较高层次的文人手中，诗词的运用更加娴熟了，它们被广泛地运用于题目、引子、结尾、写景、状人、概括、过渡等处。到了清代，小说对诗歌的直接运用更加得心应手了，它们已不再停留在作者的插白以描写景物、代替书中人物表达心理或站在作者立场上作概括这个地步上，而是更多地让人物自己来作诗，既让小说中的人物在诗作中体现其个性特征，同时又常常暗示了人物的性格、命运的结局。诗歌成了情节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在《红楼梦》中，诗歌与小说的关系已达到水盐相溶的境地。索隐派红学家早就指出了《红楼梦》与梅村诗尤其是与其《清凉山赞佛诗》之间的联系，其原因当然首先是小说与诗中人物故事的相似性，但《红楼梦》本身的诗化结构和情调及其与梅村诗的相似性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戏剧对诗歌的运用比之于小说似乎更显得水乳交融。中国的戏剧本身就是诗剧，一些曲词的曲牌和一般的词牌完全相同。明代沈宠绥在《弦索辨讹》序中评汤显祖的创作说：“胸罗二酉，笔组七襄，玉茗四种，脍炙人口，特如龙脯不易入口，宜珍览不宜登歌，以声律未暇也。”虽然是站在吴江派的立场上指出汤剧的缺点，但也正说明了汤剧的语言求诗化而忽视可唱性的特点。清代戏剧在运用诗歌和剧本诗化问题上，充分继承了前代的经验，如洪升的《长生殿》第一出《传概》即用一首《满江红》、一首《沁园春》对剧本的内容作了概括，两首词前面都

规定了调。这里，词——这种一般划入诗范围的文体，再也无法与戏剧的曲相区别了。《长生殿》的每一出结尾还用四句唐诗组成一首下场诗，在剧中有概括、过渡、取笑等作用，从中可看出剧作者深厚的诗歌修养。格律严谨的古典诗歌在戏剧中被如此娴熟地运用，这在西方戏剧中是没有的。不仅戏曲小说有直接运用诗歌的写法，诗歌也有直接运用戏曲小说语言的现象，如王士禛《秦淮杂诗》“十日雨丝风片里”中间四字用汤显祖《牡丹亭·惊梦》中的“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其四是诗人和戏曲小说家彼此生活的描写。从元明时期马致远《清衫泪》之写白居易，尚仲贤《陶渊明归去来辞》之写陶渊明，王九思《杜甫游春》之写杜甫，《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之写苏王，到清代尤侗《读离骚》之写屈原，李玉《眉山秀》之写苏小妹、秦少游，张九如《六如亭》之写苏东坡，吴敬梓《儒林外史》之写王冕以及吴梅村《楚两生行》之写柳敬亭、苏昆生，这里不仅有诗人或戏曲小说家对对方生活的关注，还有对所写对象品格的评价和精神、道德等方面的反向感染，对方的生活既是他们文学创作的素材和语言源泉，也是他们自我塑造的人格榜样或参照体。

二

另有一些联系虽然不如上述的那样简单紧密，却更具积极主动性和互补意义，姑且称为次表层联系。其一，是诗歌、戏曲、小说在题材上的相通和相关。如在短篇小说的初成期唐代，白居易和好友陈鸿同题分写《长恨歌》和《长恨歌传》，虽然是各展所长，但他们在动笔之先，在话说天宝、反思历史时，他们的题材却经历了一个共同加工完善的过程。同时和稍后，李绅《莺莺歌》和司空图《冯燕歌》的创作更具典型性。元稹在回顾自己对一个少女始乱终弃的往事，写下了《莺莺传》，李绅作为元稹正式夫人的介绍人，有幸听到元稹推心置腹的回忆，作了《莺莺歌》。这是诗歌借用小说题材进行创作的最生动的一个例子。司空图的《冯燕歌》是在前代人沈亚之《冯燕传》的材料上

加工创作的，其材料与主题的来源与李、元之作相类，又因沈与司空生非同时，更加见出小说对诗歌的影响作用。清代诗人对这类方法运用得更加成熟了，我们读施闰章的《浮萍兔丝篇》，就不难看出其中所述的故事乃来自于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范鳬儿双镜重圆》。诗歌不仅借鉴了小说叙事曲折详尽的特点，而且还有诗歌特有的抒情性。姚鼐的《金八姑鹤骨洞箫诗为沈琛其赋》亦近如是。姚诗在董沛《金八姑传》的基础上剪裁、润采，对封建包办婚姻和官吏的贪赃枉法作了深刻的揭露，使全诗读来悲慨沉痛（原传似今日之纪实文学）。除了诗歌内容直接改写小说外，还有一些诗歌在用事上亦直接借用小说戏曲。传统诗歌的语言是非常讲究典重洁净的，小说戏曲事一般不可入诗。但清代一些人却打破了这个戒律。如用《三国演义》中的事，王士禛有《落凤坡吊庞士元》，鲁迅先生认为王是被演义的真真假假搞糊涂了，但若联系到其它事例来看，如章学诚《丙辰杂记》指出的诗中用桃园事，袁枚《随园诗话》指出的诗才极佳的崔念陵进士用华容道关公放曹操事，说明清诗用小说中事未必全是偶尔的失误。其它如明末李贽的《过桃园谒三义祠》诗，钱澄之的《田园杂诗·邻舍有老叟》写老叟谈《演义》等事，都将“桃园结义”“六出奇计”之类写入诗中。不仅如此，清代的诗歌创作还在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上受到小说的影响。难以数计的咏三国而以蜀汉为正统的诗歌，《三国演义》在其中起了这种思想循环的中轴作用。充满造反精神的《水浒传》，不仅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等人以之为随身不离的军事著作，遗民诗人亦把它当史诗来读，他们借《水浒》之鉴来总结、反思明亡的原因。太平天国时期的金和是写讽刺诗的卓然大家，其诗善用轻快幽默之笔，不露声色地夸张讽刺对象的言行、表里的矛盾之处。而这种写法，很多是来自于《儒林外史》的。金和的外祖父吴敬梓的堂兄，从金和为《儒林外史》作的跋中，可以看出他非常了解吴敬梓的为人，对《儒林外史》也作过较深入的研究。他的《秋螭吟馆诗集》中有许多栩栩如

生的人物形象,其中不少都与《儒林外史》中的形象有血缘关系。《真仙人》中的真仙人是洪憨仙的影子,《大君子》中的大君子酷似权勿用;《兰陵女儿行》中兰陵女子的性格,更可以看出是沈琼枝性格的继承和发展。[4]

戏剧由于其作者、观众的层次较小说更高,它与诗歌之间在题材内容的思想倾向上的联系更普遍。明清易代的沧桑之变,使一大批描写家国兴亡的戏曲作品应运而生。这些戏曲剧本的刊行和上演,每使满怀家国之痛的诗人为之一捧亡国之泪。如“梅村诗《观〈蜀鹃啼〉剧有感》云:‘红豆花开声宛转,绿杨枝动舞婆娑。不堪唱彻关山调,血浣游魂可奈何’,其词之感人故深矣。”[5]梅村这组《有感》诗共四首,前面的序云:“庚子山之赋伤心,时方板荡;袁山松之歌行路,闻且歔噓。”戏曲勾起了梅村对往日手足之情的回忆,唤起了他积郁已久的满腔悲痛。梅村《秣陵春》上演后,一时也题诗如云。冒襄《同人集》卷十载冒与许漱雪观《秣陵春》后,各以十首唱和。歌舞之事在引发清初诗人故国之思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宣泄这种故国之思的途径。他们在戏剧题材中反刍自己往日的生活,释放抑郁于心的哀伤,砥砺自己和同僚不事二主。其它戏曲如《桃花扇》、《长生殿》也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直至乾隆时期,《桃花扇》还在启引张问陶等人对改朝换代的历史现象进行反思和总结。[6]

兼有小说的特点又类似戏曲的讲唱文学,对清代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极明显。明清两朝讲唱文学十分发达,清代长篇弹词《天雨花》就有“弹词万本将充栋”的话。这些弹词常常用七言句式,象《天雨花》这样的作品长达上百万言,却一韵到底,可见当时弹词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这种长篇弹词也有写景抒情的穿插,颇似一首超长型的歌行诗。清代又是长篇叙事歌行十分发达的时代,从清初代表作家吴伟业到近代之黄遵宪,长篇佳作屡见迭出。而叙事在清代得以中兴,是和与讲唱文学间的气息相濡分不开的。虽然古人常自标高雅,小觑俗文学,未

能为我们留下许多诗人主动学习俗文学的正面材料,但从别人的批评、诗人与讲唱文学作者之间的联系和诗歌与讲唱文学的比较中,仍不难看出这种互补的痕迹。叙事曲折之洞达、善于开阖的梅村长篇歌行,认为诗应抒情而不应叙事的王夫之曾影射其为里巷盲词,[7]钱陆灿笑其《萧史青门曲》的“自家兄妹话辛酸”可付盲女弹词。[8]他们的批评恰恰都反证了吴诗与俗文学之间的关系。梅村曾与许多说唱艺人有往来,如上面提到的柳敬亭,梅村不仅为之写传,还有诗作赠给他,叙写他的经历,如《楚两生行》、《为柳敬亭陈乞引》。梅村作的《柳敬亭传》中,记载了柳敬亭的老师莫后光教柳说书的一段,莫君之言曰:“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泽之欲其安,进而上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这些表达上的技巧,在梅村歌行中都可以发现。另一个与柳生同时的艺人韩圭湖,其说唱亦甚得陈其年、杜濬、余怀、朱彝尊的赏识,[9]王子底(西樵)有诗写其说书云:“谑语纵横许入诗,舍人传宴柏梁时。武皇没后天无笑,说着宫车只泪垂。”可见其说唱在情感和语言上对诗人影响之深。明清时代,琵琶是说唱艺术使用最普遍的乐器。董悦《西游补》第十回“拨琵琶季女弹词”写隔墙花的一大段弹唱,即夹有七十二声凄楚琵琶调;孔尚任《桃花扇·余韵》也有柳敬亭用琵琶弹唱的曲文。这些弹唱全是用七言韵文写成的,是叙事体却又辞藻华艳,它们虽然出自董悦、孔尚任这样的大文人之手,但说明当时的弹词在形式上正与七言歌行类似。靳荣藩注梅村诗时曾说其诗俗字俚语都入陶冶,如买脱、晓事、常行、另派、解户、公摊、苦差、除头等词都入诗。[10]赵翼说梅村诗用韵太滥,往往上下平通押,如《吴门遇刘雪舫》则真、文、元、庚、青、蒸、侵通押,《廿五日偕穆苑先孙浣心叶于闻允文游石公山盘龙洞石梁寂光归云诸胜》则支、微、齐、鱼通押。他们把这种现象的原因,一归结为学杜,一归结为有意遵用洪武韵。其实诗韵

的通押、俗语的大量运用,正是讲唱文学的特点。梅村在短诗中很少有通押现象,也没有什么俗语,与其说遵用洪武韵,不如说受讲唱文学的影响。清中晚期,姚燹的《双鸂鶒》、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杨圻的《檀青引》和《天山曲》、樊增祥的《彩云曲》和《后彩云曲》、金兆蕃的《宫井篇》、孙景贤的《寿宁宫词》等大量长篇歌行的勃兴使清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壮阔波澜。《天山曲》咏香妃事,长达数千言。很难设想,没有《天雨花》之类的讲唱文学在前面开疆拓宇,诗人会有如此大的气魄和胆量。

清代还有根据诗歌编撰戏剧的事例,如黄韵珊的《帝女魂》完全按照梅村的《长平公主挽诗》来编写,这是戏剧得益于诗歌的一个例证。

次表层联系的第二个方面,是诗歌、戏曲小说理论批评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体现在方法上。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最主要形式是诗话,而后起的小说批评——评点,仍然沿用这一方式。其次是在批评者感受的表达上,与诗话的方式相适应,中国的诗歌批评常常表达一种批评主体对客体的感悟,是一种印象上的总体把握。为了使这种把握不至偏颇、固定、狭隘化,他们常常采用近乎意会的方式使其内容空灵、外延模糊。这种方法的突出表现就是好用比喻。例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即是用博喻的手法,让人从各个角度通过对喻体的想象来构筑一种境界,然后再借这种境界去感悟那一种风格的特点。小说戏曲的批评也非常乐于运用这种形式。随便举个例子,清初宁都三魏之长魏祥论南北曲异同时说:“南曲如抽丝,北曲如轮枪;南曲如南风,北曲如北风;南曲如酒,北曲如水;南曲如六朝,北曲如汉魏;……”[11]再次是批评的着眼点。中国的诗歌批评自汉儒之评诗三百定于一尊后,即将内容批评的着眼点放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即文学是否合乎诗教文统,有无讽谏教化作用;写事之作有无良史笔法、证史价值。戏曲小说批评兴起以后,这种价值判断标准又被移植过来,除了明末清初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人有些反传统思想,

较多考虑文学的特性外,普通的小说戏曲评论,思路总转不出文学对社会作用的圈子。众多的《三国演义》的评论中,最常见的议题是事实的真假问题和忠奸问题;众多的《水浒》评论中,最常见的攻击之词是海盗。《红楼梦》的所谓海淫也使道学家们耿耿于怀。这里,诗歌、戏曲小说的批评不仅是相互影响,它更是一种同根共源的现象。

三

文学创作、批评中不同文体的同根共源现象,小而言之,是出于同一作家、同一时代,同受一种教育,大而言之,则是一种文化上的相同和一致。诗歌、戏曲小说之间的深层联系正是文化上的联系。戏曲小说兴起于民间,所以初期小说中负载的民间意识比之于更多地是来自于书本的文人意识有较明显的差异。当文人常用的文艺形式——诗歌——在热衷于复古、传道的时候,民间流传的《水浒》、《三国》却在热情歌颂自己生活中很需要的平等、侠义,它们属于同一个大系统,却属于不同的生态分布区。到清代,这种民间文艺形式经过清初大规模的批评和社会的变革,地位已有很大的提高。清代的文人已能自觉地运用这种形式,象曹雪芹、吴敬梓等人,都已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整理而是独立地精心结撰。因此,清人的戏曲小说已进一步和传统文化、文人意识以及它们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一——诗歌同步合流。这种同步合流的表现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难以枚举的。就其要者而言,小说戏曲作家和诗人在文化的核心——思想结构和价值观念上即已显示了这种同步合流。虽然清代文人的思想比起以往的文人来显得更复杂,但其基本结构,无论从群体来看还是从个别来看,都还是儒释道三者的选择与组合。从横向选择看,中国诗人常常入儒不成就学道礼佛;从人生的纵向历程看,中国诗人大多经历过少年自许经世,中年阅尽沧桑、晚年万事皆幻的思想发展过程。明代的灭亡和清政权的入主曾使多少怀华夷之辨的人痛不欲生,但没过多久,就有许多人下了首阳,一些已出了坚贞不屈之名的人物也只是洁身自好而已。这里除了清政府的政策

作用以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文人善于用万事皆幻来解决自己的心理冲突,达到内心的平衡。清初的诗人中,即使顾炎武也说“从今世事无烦问,但掩衡门学种蔬”,^[12]看穿一切。象屈大均这样的抗清志士也以“河清终已矣,难俟奈君何”^[13]来自打退堂鼓。戏剧中,《秣陵春》、《桃花扇》两剧结尾,作者都让主人公出家入道了。小说《红楼梦》亦让贾宝玉出家,这正是就范于传统思想和文化心理的表现。《儒林外史》所写的是另一条出路。作者在描写了一大群儒林丑类、讽刺了每况愈下的世风的同时,虚构了一个古代的牧歌式的田园世界,借王冕这个人物来寄托自己的本乎儒兼融道的理想。而好古、怀古在古代诗歌(包括清代诗歌)中正是最普遍、最深厚的意识,远古时代是绝大部分诗人都称道、向往的时代。

在清代,象这一类诗歌、戏曲小说基于同一种文化底蕴、价值观念的典型现象有很多。就单个作家论,蒋士铨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戏曲,都贯穿了忠孝二字;就作家群体论,当清初戏剧家们用戏剧宣扬夷夏之防的时候,诗人们在作品中也传达了同样的观念;当曹雪芹、李汝珍、蒲松龄在小说中表示应尊重女性尊重感情的时候,戴震、袁枚等人在诗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曹雪芹、吴敬梓用小说揭露科举之弊害,胡天游、袁枚在诗文中也说科举对于自己至多是块敲门砖;……这样的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它们只是产生于同一土壤,具有同一根本而各表一枝的两朵花罢了。

[1] 本文只论诗歌与戏曲小说之间的联系、渗透与互补,把戏曲小说看作相对于诗歌的另一个方面,戏曲与小说之间的关系不专门论述。

[2] 《中国戏曲概论·清人传奇》,台湾广文社,1969年版。

[3] 王、蒲之诗均引自《聊斋志异》(三汇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 有关金诗问题,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马群《略说金和的讽刺诗及其〈兰陵女儿行〉》已有论述。马文见《人文杂志》1981,3。

[5] 梁廷楠《曲话》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6] 《船山诗草》卷5《读〈桃花扇传奇〉偶题十绝句》中华书局,1986。

[7] 王夫之《古诗评选》卷1,参见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船山诗论后案》,齐鲁书社,1983。

[8]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中华书局,1965。

[9]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1,中华书局,1980。

[10] 《吴梅村诗集笺注》卷4《芦州行》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 《魏伯子文集》卷4,道光25年珍溪绂园书塾重刻本。

[12] 《顾亭林诗集汇注》卷3《酬陈芳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 《新年三首》之三《翁山诗外》,国学扶轮社刊本。

作者单位: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南社诗人古直生平及其爱国思想

在众多的南社诗人中，古直是勤于笔耕的佼佼者。他出版的诗集有《转蓬草》、《层冰诗存》、《新妙集》、《隅楼集》、《东林游草》、《层冰堂诗集》等，文集有《取乌集》、《层冰碎金》、《征夫杂录》、（含部分诗歌）等，学术著作有十多种，如：《诸葛忠武侯年谱》、《曹子建诗笺》、《阮嗣宗诗笺》、《钟记室诗品笺》、《陶靖节年谱》、《陶靖节诗笺》、《黄公度先生诗笺》，还编纂《客人丛书》，撰写著名的《客人对》，精选宋湘、李黼平、黄遵宪的优秀诗篇，汇成《客人三先生诗选》。

古直，字公愚，号层冰，别署遇庵、征

夫、孤生，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生于广东嘉应州的滂溪（今梅南镇）。关于古直的家世，他本人在《取乌集·述先录》作了具体介绍：“我古氏系出姬姓，周太王去邠适岐，称古公，其后遂氏焉。汉有孝子古初，后魏有古弼，唐有古之奇，虽奕叶隐曜，而德行道艺之才未尝中绝。唐末云应公游宦洪州，渐迁岭外，宋初曰成文者，以文章凤翥百粤，举太宗端拱进士，始居梅州。曾孙济美，革、董、璽兄弟三人同举绍圣进士，时人比之宋氏郊祁，而革公教授琼州，德化叛黎为尤著称。至明季叶，锐公避地邑南，遂家滂溪。”自古锐之后，亦“数世皆以文艺显”。祖父湘帆“渊静好学，早都文誉”，父亲锡贤“塾中诵书，每超群儿”，可惜家道中落，改业经商。然而他仍念念不忘“诗书传家”。“受命货殖，犹不废业”，所得赢利，尽以购书。古直童蒙时，父亲要他熟读《唐诗三百首》，稍长，又专门“辟楼藏书，令得纵观寝馈其中”。在这样一个有读书传统的家庭中，古直与诗歌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而且养成了正道直行、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优秀品德。古直的家乡嘉应州是客家文化的中心。黄遵宪、丘逢甲、胡曦为代表的岭东爱国诗人以诗言志，关心民族命运，抒发爱国情怀，兴办教育，广设学堂，培养了大量人才，对嘉应地区的文教德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生活的古直，虽未能直接受到黄、丘、胡等名家的教育，但先贤的高风亮节却铭刻在他心中。古直在编选《客人三先生诗选》时，对黄遵宪等先贤表示出无限的敬仰。他的师友都是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方闻之士”：“西有罗中翰，东有饶孝廉，环城上下，有谢上舍、廖太守、李季子、钟天静、曾晚归、谢直君等”。罗中翰即兴宁著名爱国学者罗翔云，曾任奉政大夫会议处文案官内阁中书，《客方言》一书的作者。饶孝廉即广东名儒饶英裳，是倡办新学的教育家、爱国者。李季子、钟天静、曾晚归等都是同盟会会员。家庭的教育，师友的影响，使古直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关心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的疾苦，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风景河山感慨多，摩挲宝剑思投笔”

1906年初，谢逸桥奉孙中山之命回到嘉应州，积极发展同盟会会员。古直与李季子在梅城桂里学堂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在

松口积极开展反清革命活动，“始则规范师范讲习所以为传播机关，继则规设体育传习所为实行之预备”。1907年秋，古直进入松口体育传习所学习。毕业后，在松口公学任国文教员。1908年春，他和钟动、李季子、曾伯谔、曾晚节等组织了“冷圃诗社”。诗社以“冷圃”命名是有深意的：“冰雪万里，潜孕阳春。革命大业，宜有预备，一为鼓吹文学，一为教育灌注”，可见“冷圃诗社”表面是文学组织，实际上是宗旨明确的革命团体。

古直的《冷圃曲》一诗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组织的情况：

“忆昔结交少年日，意气相倾在胸臆。
风景河山感慨多，摩挲宝剑思投笔。
有时冥坐类枯禅，中心惏然忧如煎。
被径迷阳行不得，江头岁岁撷芳荃。
飘零桃李春无主，百年大计将人树。
梅州桂里起宗风，河汾可有房与杜？
……”

冷圃诗社的成员，号称七子。坛主为李季子，此外还有钟动、古直、曾伯谔、曾勇父、曾晚节、黄慕周。诗社同人多为同盟会员，又是南社诗人。据当年经常出入冷圃的彭精一回忆，冷圃的社址在嘉应州城北门外的曾氏义祠，大门的门联借用杜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横屋小门的对联则是集句：“散发乘夕凉，飞心入明月；高腾邈四海，含笑看吴钩。”冷圃的成员在南社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文，有一定的影响，南社的元老柳亚子对冷圃诗社也十分关心，曾写信询问。其时因李季子不幸去世，社事由古直负责。古直在答柳亚子的诗中道出了冷圃诗人的处境和心境：“多君问冷圃，贱子试言诸。近市异晏宅，面城同潘居。左有疏树林，右有稻蟹区。夹道长草木，萧萧悲黄芦。遥遥对兰若，钟声时有无。行行临荒原，高坟互相逾。日暮暮烟合，茫茫满平芜。李生爱此地，相与结吾庐。手艺百盆兰，复聚千卷书。啸傲南窗下，栖迟常多娱。悲来发浩歌，往往缺唾壶，方将招梅鹤，何期竟兰枯。门巷今依然，风景将无殊。感此一长叹，吾怀良难舒。”

冷圃诗社为了扩大革命宣传，组织革命力量，由曾伯谔、曾勇父出资于1909年创办梅州高等小学堂，古直在李季子病故后接任校长，为反清革命运动培养人材。

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嘉应州籍的同盟会会员积极参与，其中列为辛亥革命七十二烈士的周增、饶辅庭等都是古直在松口体育传习所的同窗。古直为此写了《感事》诗二首，其二写道：

“滚滚珠江水尽冤，巫阳不下复何言？
亡胡天意终宜验，思汉人心信不谖。
有限遗民谈往事，无多老泪洒中原，
黄花消息教谁问？死抱枝头为国魂。”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全国响应，古直等“冷圃诗社”同人积极参与策划嘉应州起义，钟动任梅军总指挥，古直任秘书长。（注）11月20日，嘉应州光复。1912年3月古直出任汕头同盟会机关部秘书长，筹办《大风日报》。

“凌厉越万里，中宵尚孤征”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大开历史倒车，对内则排除异己，杀戮党人，对外则屈膝献媚，丧权辱国。古直任社长的《大风日报》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阴谋进行了勇敢的斗争。1913年4月16日，发表了题为《万恶政府》的评论，揭露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成为广东讨袁斗争的先声。广东都督龙济光是袁世凯的走狗，他横蛮封闭了《大风日报》，并悬赏通缉古直。古直不得不离汕赴港，其诗《在香港太平山积雪庐夜望》抒发了心中的苦闷：

“惜无双羽翼，高飞凌穹苍。回首尘埃间，氛祲何茫茫！皋禽响远音，候雁复南翔，羈栖岂不怀，念此结中肠。所思期未来，延伫以傍徨。”

尽管遭到挫折，但是古直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并没有失去信心，他期待着未来，准备新的斗争。1914年古直又辗转回家乡筹办龙文公学，不久又到梅州中学工作。1915年12月，唐继尧、蔡锷起兵反袁，古直接到在唐继尧处任护国军总参议的钟动来信，又暂时放下教鞭，投入了反袁护法的斗争。

古直到香港后，曾被委任为“南洋筹餉讨袁专员”。1916年初他经海防、西贡抵星州，受到华侨的热情欢迎。

古直到了槟榔屿后，拜见了因避难流亡在外的议员饶芙裳先生。饶芙裳是黄遵宪、温仲和的朋友，早年追随黄遵宪在嘉应州办教育，兴新学；武昌起义时，参加蒋翊武的“文学社”，拥护孙中山推翻清朝帝制；辛亥

革命后任广东教育司司长，当选为国会议员；因反对张勋复辟，国会被解散后，遂避难南洋。古直见到敬仰的师长，深情地表达了自己的衷情，希望这位老前辈回祖国继续奋斗：

杖履追随感夙知，梅州风雨不胜思。
别当桑海扬尘日，来又蓬莱水浅时。
原上频频呼急难，秦尘黯黯泣无衣。
椰乡信美非吾土，贾季于今可共归！

句句皆心声，情真意切。饶芙裳深受感动，虽然没有即时与古直同行，但不久便回到国内，又继续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曹锟贿选总统，以500银元一票收买议员，饶芙裳正气凛然予以拒绝。

在南洋筹款期间，古直创作了一批爱国诗篇。《滇越汽车中作》对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后的中国形势表示了严重的关切：“水萍失相依，主客已异势”。“榻旁鼾声作，时时思乘机”。《步出滇西门》，则赞扬反袁护法的唐继尧、蔡锷：“英雄今有作，义声满寰区”。《黑龙潭谒薛尔望先生墓》则歌颂“匹夫自负兴亡责”“一家白骨殉江山”的明末爱国志士。这些诗作，都洋溢着炽烈的爱国感情。

由于广大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古直的筹款任务顺利完成。其中最著名者梁楚馨、梁思权、梁应权兄弟慷慨认捐三万金，对此，古直深为感动。他在给唐继尧的信中强调：“为国家者，与其乞怜于外人，何如求助于民庶”，明确表述了依靠民众救国、建国的思想。

1917年2月，他不辞劳苦，又以“云南护国军政府特派慰劳华侨使者”的身份，再赴南洋招资。此后，古直曾任总裁都司令秘书和封川、高要县长。在封川高要任上，他曾大力倡导种树造林，造福一方。

“一寸山河一寸金，纤儿撞坏感难任”

20年代初，古直因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感到迷惘，曾一度以陶潜为楷模，辞官到庐山隐居。他当时的心境，在《咏陶靖节》一诗中坦露无遗：“东方有一士，邈然不可干，称心固为好，即日弃其官。拥褐曝前轩，闻饮自欢然。所乐非穷通，所懼非饥寒。猛志固常在，有时不肯言。哀哉亦何伤，在己何怨天。其人虽已没，千载乃相关。”在隐居期间，他过着穷困的生活，曾经营过茶室。尽管在个人的生活上并不如意，但古直

依然关心着人民疾苦，关心着民族的命运，有诗为证：

山居闻长江大水灾感赋

巫峡翻腾江汉沦，滂沱倾泻更连旬；
欲箴范论申埋掌，安得王车与置身。
禹域只今宁有迹？皇天到此信无亲！
蛭蟥如和波声壮，独立高山一怆神。

山居闻东夷之警感赋

方哀四野荡波臣，又报夷氛薄北辰。
漫慨神州微禹管，空悲同室尚胡秦。
丁丁自伐根连叶，旦旦相煎泣更呻。
徙倚山阿一凝睇，斜阳无语忽飘巾。

1925年古直应聘任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文科教授。他否定了独善其身的隐居生活：“有才为世出，奚必老岩松。我友且行矣，努力赴事功”，“愿得展骥足，以慰斯民饥。”（《送晚归回粤》）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时古直在中山大学任教，他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早有认识，对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对日寇采取不抵抗主义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在《寇来二律》中写道：“坐拥貔貅百万师，寇来荡荡竟如飞。翻哀今日偷生勇，不及当年浪死宜。（原注：甲午吴大澂辽东之败，民间传浪死之歌）辽沈游魂应未息，神州陆沉卜难知。怆然独下兴亡泪，江左宁闻有管夷”。当听到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捷报时，则高兴地写道：

楚囊遁利竟何心，拼督危城誓命沉。
初计未能趋洛涧，收功犹冀塞阳林。
时无幼度焉存晋？但得虞彬可却金。
汉帜飞扬凶丑骇，宝幢西北仁佳音。

诗中热情讴歌敢与日寇抗衡的马占山，比之于南宋的虞允文，在主将遁逃、三军无主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督战抗金，有采石之捷。

早在民国初年，当古直读了其师罗翔云的《东三省游记》后，曾写过一首诗，对东北三省的形势表示担忧：“一寸山河一寸金，纤儿撞坏感难任。长围渐合天方醉，抚卷如闻太息音。”现在，昔日忧虑成了现实，古直心中异常悲愤，当他听到齐齐哈尔失守后，又写了一首诗，抒发积郁悲哀的心情：“一寸山河一寸金，当年荐食已駸駸，只嗤杞叟忧天坠，谁料纤儿撞陆沉，华表归仙应有语，湘东持子故何心。茫茫黑水育腾沸，泪尽西风哭寇深！”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古直的爱国思想愈显强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写了《攘倭行》等热情澎湃的战斗诗篇。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古直真象“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杜老夫子一样高兴至极,立即写了一首七律寄给指挥打了大胜仗的李宗仁司令官:“谁云铁瓮古徐州,不见京师一掷休。赖尔精忠能贯日,凭君恩好与同仇。淮肥草木风声入,丰沛英灵旂盖收。侧听西平乘兴急,燕齐父老望津游。”赞颂李宗仁率领将士精忠卫国,缅怀为国捐躯的烈士,表达了人民群众坚决抗日的愿望。

“教育救国,当筑其基”

古直的一生,除了投身政治斗争外,更多的精力用在办教育。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曾在梅县松口公学任教,后又在梅州高等小学堂任教。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在汕头遭通缉,风头过后,他回乡任梅州中学国文教员,又感“乡中教育荒芜,文化不兴,永念敬仲树人之计,沉吟郑风子衿之诗”,遂筹办龙文公学。

1925年任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文科教授。1939年,古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应邀回家乡梅县就任梅南中学校长。中大校长邹鲁曾一再挽留,古直的答文言辞恳切,令人感动:“奉公电,以薪水见惠,感谢难宣。云南旧游地也,夫岂不思徜徉翠海。但有乡学,为少时所建,陵夷衰微,极待整顿,同志挽之无已。窃念大学,人才之海,少直一人,不为轩轻,若乡学则非直不足资提挈也,教育救国,当筑其基,故且周旋乡里,以观其成。”梅南中学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曾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十多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梅县县委和梅南中学的老校友复办学校,十分重视物色校长人选,对古直寄予厚望。古直欣然应邀,就任后积极展开活动,为办好这所学校呕心沥血。他运用自己的影响为梅南中学募捐,不辞辛劳,二次亲到南洋筹款。

为了让学生打好扎实的基础,他特别重视文学、数学、体育三科。他在延聘人才的

信中说:“直蒿目时艰,隐心政理,以为荡荡无纪,由于犷犷无文,而科学不兴,则数学不尽其诚之效也。故已办小学中学,而又继以文学、数学二馆,以待并世之英才。”他电聘著名诗人、雕塑家李金发(中国象征派诗人先驱,梅南人)为梅南文学馆的艺术顾问,聘请黎伯通为数学馆名誉馆长。针对抗日初期招收飞行员合格率极低的现状,古直大声疾呼,为了抗日大业,要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吾粤士民应中央飞航试验者,其体格率十之八九不能中程,此真可谓惊心动魄也,不急图谋补救,将何以共赴必胜之鹄的哉?本校因此,决以地理之优越,山川之映带,造成水陆山参合连环之大体育场,以为梅州五属体育之中心”。他专门电聘潮州专员何春帆为梅南中学体育协会会长。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1941年,梅南中学被迫停办。古直规划的梅南中学的宏伟蓝图虽然未能一一实现,但是,古直的办学思想却是极有价值的。它有明确的教育目的:为抗日,为国家的富强,为民族的振兴而培育人才;它强调打好语文和数学的基础,重视体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这种观点,在今天还仍然有借鉴意义。1946年3月,古直出任象宿中学董事长,后又提任梅县修志馆馆长兼总编纂。

1949年5月,年逾花甲的古直以无比欢欣的心情迎了解放。他为县政府写作对联:“人民作主,天下为公”。不久,又出任南华大学教授。其后,古直调到广东省参事室,并任广东省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广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政协委员等职。他于1959年6月在广州病逝,终年75岁。

综观古直的一生,他不仅是南社杰出的诗人,是一位勇于斗争的革命志士,同时又是一位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爱国者。

注:据赖绍祥、房学嘉《客籍志士与辛亥革命》一书介绍,钟动为秘书长。待考。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责任编辑:陶原珂

萧蓬父先生谈：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

□本刊记者 刘斯翰 冯达才

今年春中，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知名学者萧蓬父先生南来广州，我们趁便作了一次学术性的访问，萧老即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为题旨，纵谈了近年的思考和新观点。我们深为先生的谈话所启发，谨征得先生俯允，将谈话内容略加整理，复经本人过目后，公诸学界同好。

萧：最近学术界有一种新气象，就是高品位的民办学术刊物比较活跃。象北京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出版了好几年，全靠自己向社会募捐。四川的《中国文化论坛》，也是企业界支持。你们广东有个《现代与传统》，听说是由霍英东基金会资助的。北京还办了《学人》、《原学》、《原道》，诸如此类。学术这个事情，我个人感觉，采取简单的一元化的方式处理，恐怕是一个教训。1956年毛主席针对苏联的教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很好执行，但他这个思想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向开放、多元化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近几年我常想这个问题，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学术探讨最好不要“以水济水”，正如黄宗羲讲的：“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真理的发展是多元的，本来辩证法就讲到这个问题，就不承认真理与错误的对立是绝对的，我们把它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是一种偏见。其实真理的发展过程是多元的、多维的、多根系的，是在对立中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而发展的。我们中国的文化、哲学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我称之为多维的两分的发展格局。有不同时代的两分，有不同学派的两分，也有哲学基本问题上唯物唯心的两分，可以说其中有正确和错误的两分。但更多还不是这样，例如齐、鲁两派的学风，道家与儒家的学问，不能说哪个错，都有正确的一面。又如庙堂文化和山林文化，古典文化和民间文化，这样的两分往往是互补的，互相转化的。我们历代的诗人，都是从民间文化中吸取养料，转化为古典的东西。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文化多元化的好处。我们过去的教训是搞简单的一元化，从苏联学来的，苏联科学院曾经靠通过决议来把多种学派取消掉，日丹诺夫主持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什么出来就批什么，系统论出来批系统论，共振论出来批共振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又批相对论，闹了不少笑话，这是糟蹋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人类文明大道上吞吐百家而发展起来的，对人类文明最没有宗派性，最没有封闭性，是最开放的体系。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而已。前一段在成都开了一个道家和道教的会议，在会上我有个发言，说这几年有一种流行的偏见，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单一化，凝固化，儒家化，乃至按少数儒家所讲的样子道统化。象现代的新儒家。我支持对新儒家要作研究，但不应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只是儒家，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应该承认还有其他几家学说。我近年写了几篇道家的文章，似有提倡道家的味道，我欣赏道家的风骨、道家的人格，

它坚持道法自然的观点,反抗人性的异化,用我的说法即“伦理的异化”。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讲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劳动异化,我提出还有与宗教异化相类似的伦理异化,在中国传统研究中应注意这个问题。伦理异化,在后期儒家那里是加以辩护的,而道家是反抗的。在这点上,我赞成道家。道家还注重生命哲学,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关系,有现代意义。我在会上还讲了一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优秀传统,一个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另一个是学而优却不仕的传统。不少人真正学而优则仕,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当然其中有的脱离了人民,走到官僚的道路上去了。也有不少人发扬了学而优却不仕的传统,退隐山林,和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好象在冷眼旁观,其实是采取另一种形式,承担着民族忧患意识、社会批判意识,用来进行学术批判和创新开拓。他们往往少一些传统教条,思想比较解放,这一部分人中道家占大多数。当然山林、民间文化与庙堂文化,彼此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不是截然分割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从官场退下来,诗风就为之一变。柳宗元、刘禹锡,乃至韩愈、苏东坡、杨慎,在被贬后,在民间文化的陶冶下,思想、创作,在各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在海南有个五公祠,五公其实是唐朝以来被流放到那里的五个“罪犯”,苏东坡也是其中一个,他流放到海南后,提倡教育,把海南的整个文化变了个样。在学而优则不仕这个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被迫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跟政治权力疏远之后,反而在文化上、学术上有所创造,有所贡献。历代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对这一部分人采取比较宽容、敬重的态度,或者是朝廷旌表,或派使臣用安车蒲轮去招请礼聘;乃至皇帝亲自出马去拜见、访问。从《后汉书》开始立“隐逸传”,专门记述这一部分人的言行,对于这部分人的历史作用是值得研究的。我讲的另一个意思是,道家比儒家不同的,就是文化心态比较开放。从老子起,就提倡“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大”,懂得宽容,出以公

心,局面就大。宋研、尹文、庄子都主张去掉偏见,强调要用和解、宽容的态度对待百家争鸣。对这一点,孔孟却表现狭隘,他们认为“处士横议”是世衰道微的表现。韩愈更厉害,要“禁杂反之学”,甚至主张烧书、杀人,比较独断专横。庄子不同,例如在《秋水篇》里描写一个人不断地自我超越,不断开拓广阔的视野。从井蛙到河伯到海若,从井底到大江,再到大海,一望无涯,不断扩大境界。庄子所谓“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两行”这个说法,是庄子最先提出来的,以后儒家的《中庸》里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其实是庄子的思想在《中庸》里体现出来。我对这方面比较强调,象《易传》所讲的“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要讲“殊途百虑”之学,不要专横独断之学。道家就有这个好传统。孔子在《论语》里讲过:“朝闻道,夕死可矣。”他的道是静止的。庄子不同,他说:“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把学生送到海边,你自己去发展吧,我就到此为止了。气象境界都不相同。“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认识到真理是个过程,是个无限的发展,是变动不居的。这是道家的精神。

记:对于文化来说,哲学问题带有根本性。先生从传统文化出发对儒、道两家所作的剖判,可谓震聋发聩!90年代以来,哲学界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一些新提法,概括地说,是认为中国哲学应该以传统为本位,或者说回到传统的本位。主张以“天人”、“心性”、“形神”等中国哲学的传统命题作为基本命题,批判吸收一切外来哲学思想,去加以发展,乃是今后中国哲学的路向。先生想必也注意到了这一动向,可否谈谈您的看法?

萧:你们提的是个很尖端的问题。对中国哲学今后怎么发展,学术界有争论,似乎是从所谓“国学热”引起的。据闻张岱年先生等在北大作过报告,主张研究国学,颇受学生欢迎。《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有一股国学热悄悄兴起”。针对此,有不同看法,有

人写文章,提得很尖锐。据我所知张岱年先生一贯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文化进行综合创造。这里有一个文化创造的主体问题,能否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洋为中用,是否以“中”为主体?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事情。以中国哲学为主体,那么马克思主义又怎样摆法呢?照我看,马克思主义自上个世纪末传入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已经包括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当然,其中有不少经验教训还有待清理。毛主席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很高,也正因此,他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有那样伟大的创造,形成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看,中国文化主体本身就早已渗进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如果就这个问题上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很好的现象,不象过去一讨论,帽子、棍子都来了。对这个问题本身,百年来,我们实际上面对着“两化”的任务,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两化”是互相交错的,不留心,也不易兼顾,但是,如果调节得好,这“两化”都实现得好,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对我国的文化,甚至对世界的文化发展,都会有贡献。我认为这“两化”首先是互相联系着的双重过程,要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必须要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其中包括西方文化发展的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在内。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认真研究中国文化,如何使之现代化?那样,西方文化的传统,乃至马克思主义,也就都缺乏在中国本土生根的地方,使它中国化也不能完成。外来文化,再好的东西,如果不和我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不经过民族文化的涵化,都是不能起作用的。只有充分重视中国民族文化,才能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总之,这“两化”的任务是交缠在一起的,怎样做得更好,是我们面临的工作。

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这个提法很好,把中国文

化在当代的转型问题作了高度概括。自从近代西风东渐以后,中国学界就有所谓“体用”之辩。当然,“体”和“用”的具体内容,百余年来与时俱变,不应拘守。但是,“体用”作为一个形上的命题,至今并未失去它的意义,尤其对于中国新文化建设而言。上面其实已对此有所涉及,请先生就此再发挥一下如何?

萧:对于“中体西用”这个问题是要重新考虑。已有同志提出“西体中用”,也有提出“中西互为体用”等等,过去的人例如张之洞对这问题有片面性的理解,同样我们也有很多片面性的理解。我认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过去理解得比较肤浅。如当时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概念,过去理解“民族的”是形式,“科学的”是内容,“大众的”是方向。这不知是谁作的注解,这就有很大问题。“民族”是指形式,属于外部的东西,这就不对。所以当时,1947年的时候冯契同志写了一篇短文,说“民族”不仅是形式,而应该有它的内容,但没有受重视。所以,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几个概念,都应该重新理解,后来毛主席所讲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认为“洋为中用”这里面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在内,假如承认也包括马克思主义,那么“洋为中用”就有它的深刻内在含义。对于发展着的西方各派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洋为中用的问题。我常向研究生们强调,要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象马克思那样博学,要象马克思那样深思,我举了很多例子,本世纪能在文化史上、思想史上站得起来的人,没有一个不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19世纪中叶所出现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思潮,非常宝贵的思潮,比如萨特、海德格尔、容格、斯特劳斯等都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有的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们在思想上、理论上都各有自己的发挥。还有个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的研究也是有贡献的,不可忽视,更不应给以简单否定。我前年春天在德国的特里尔大学讲学,他们来邀请时对我讲特里尔是马克思的

故乡，设有马克思的故居，我去参观了，它的旁边就是马克思研究中心，故居里展出的东西很有意思，是按照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搞出来的。对他们的观点，过去我们都是作为修正主义来批，批得很厉害，实际上有些方面也要重新考虑，究竟伯恩斯坦、考茨基、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在历史上作过什么贡献，要实事求是予以评价。我认为他们有他们的缺陷，但他们的缺陷比斯大林要少。特里尔故居改成展览馆，第一层是关于马克思和燕妮两个家族的情况；第二层摆放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活动情况、著作情况；第三层是摆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和发展情况。我特别注意第三层，主要是把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大的像片、小传和著作摆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和发展这一栏里，也有列宁的像片，比伯恩斯坦的小一些，列宁像旁边是托洛茨基的像，他的旁边还有一大串，都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们这样，对马克思也很尊重，从另一个角度，静下来想一想的话，你不能排斥人家的安排也有理，不能一棍子打死。我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帜下各家各派在内，都应该认真研究，要消化别人，吸收别人，过去我们学斯大林，就把人家全骂成是修正主义分子，那么反过来人家也会骂我们是修正主义。恐怕未来的世纪是一个阻挡不了的多元开放的时代，这里面能不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真正的理论家，能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重新开拓，起到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能否出现这样的人，谁也难讲，也有可能出现在中国，也有可能出现在俄国，甚至也可能出现在欧洲。

记：在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学说之中，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成为“显学”，决非偶然。这与马克思学说在一些根本问题的取向上和中国传统思想比较地一致有关，例如辩证的思维方法和注重实践的思想，还有历史主义（唯物史观）的等等，这些特色颇能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与那些非历史主义的，过于逻辑化的，或者宗教化的学说大不一样。当然20世纪的世界性的革命背景也起了巨大作用，但不能忽略文化这

个更深的根子。另外，“经世致用”的传统，似乎更是个联结革命与文化两大背景的因素，而且这也是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相通的。

萧：对经世致用这个传统，我们过去一贯都是肯定的。特别是宋明以后，讲性理之学，空谈心性，对国计民生都不太过问，这一点我们是批评的，更早的有陈亮已经在纠正朱熹的偏向。我指导一个研究生写论文，把明清两代的经世致用思潮分成三个阶段。我就意识到，有一种简单的经世致用，容易被一定时期的政治所左右。我们搞“为政治服务”就是这一传统，学说就没有什么独立性了，那就随波逐流了。因为有这个局限性，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的学者强调，学术决不能过于功利化，过于实用性，而应保持学术的独立性。这个也不无道理。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当前两个方面都不能偏。现在有些青年人认为，“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政治服务”，全搞糟了，现在要跳出来，学术就是学术，没有任何目的，不去考虑社会、社会利益。他们给了一个新名词，叫“知识分子边缘化”，即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演个什么角色，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这个我也不同意。我想经世致用恐怕要有层次之分。低层次的，为当前社会政治需要服务，也有点意义；有些感性的启蒙运动，就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呼口号，上街游行，这从五四以来我们搞过很多，当然对唤起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深层次的启蒙，应该是理性的。我们民族要真正觉醒和腾飞，更需要的是深层次理性的启蒙。

记：的确应该站在这种“理性启蒙”的高度上，以宽广的视界、远大的抱负来对待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脚踏实地，开创未来。

萧：关于中国消化佛学的问题，从引进、翻译、注释、理解，通过格义阶段，老庄比附，真正理解，到自己再创造一个新的、中国的佛学，花了足足八个世纪，这八百年值得研究。这中间的经验教训，如何消化，拿过来与传统互相结合，层层结合，就是本体论的结合，如僧肇；有心性论的结合，形成《大乘起信论》，以后更进一步和中国的日常

生活实践、生活智慧相结合，产生以后的禅宗。我认为《肇论》、《大乘起信论》、《坛经》三本书，是佛学中国化的三个里程碑。这是我们民族第一次引进和消化外来文化，不仅佛学，当时还有印度的建筑、音乐、美术、医药、历法，还有舞蹈、妇女的装束，都从西域引进来了。那一次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算是胜利完成了。现在我们又面临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引进，从17世纪，从利马窦到中国，1601年他进北京，到现在也就是三百多年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次引进、消化西方文化的任务。如果这第二次引进完成了，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确实很了不起！我们既能消化印度文化，又能消化西方文化（包括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加以文化聚宝，加以重新熔铸，我们也许对全人类会有新的贡献。我想，我们为什么能够有比较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文化？世界各种宗教都来到中国，都不被歧视，都受欢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可以叫作“文化包容意识”。首先是包容，“道并

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殊途同归，一致百虑”。本来三教之间也争得很厉害。但后来三教同归，唐以后全都讲三教合一。这有好处，不象西方搞宗教战争，如俄罗斯的车臣战争，是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之间的矛盾。我们就好一些，我们应该有文化包容意识。孔夫子有两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这里，“和”跟“同”成了一对范畴，这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和”是对立统一，“同”是简单同一。最近亨廷顿发表文章，认为文化冲突，文明冲突，不可调和。用我们这个观点来看，恐怕是刚好反过来：正因为有冲突，才可能进行调和。“一阴一阳之谓道”，正是在矛盾中观其会通，从杂多中求其统一。王夫之讲得好：“异以贞同。”五音不同，恰好可以构成一篇美妙的乐章；五味不同，恰好可以组成一席丰盛的宴席。把杂多看成是统一的前提，这跟西方的思路不太一样。我们认为，正是矛盾、杂多的统一，才是“和”。“保合太和，乃利贞”，才是最高的价值理想。

创建“中华民族学”

——访肖君和研究员

□本刊记者 华 生

肖君和，1945年生，现任佛山大学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任。主要著作有：《肖君和集》、《论人》、《现代人的艺术系统》、《美的奥秘探寻》、《文艺研究新模式》、《文学的奥秘》、《论思维》、《形象思维逻辑学引论》、《华魂·第一卷·中华民族凝聚力》、《华魂·第二卷·中华民族精神》、《华魂·第三卷·中华民族大一统》，主编《中华复兴的曙光》。发表论文150余篇。《华魂·第一卷·中华民族凝聚力》获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

记者（下称记）：肖教授，你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很多，提出过不少新观点。听说你在创建一门名叫“中华民族学”的新学科，你创建这么一门新学科的依据是什么？

肖：创建中华民族学的依据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首先，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伟大的实体，应该有一门科学对它进行研究。《辞海》释“中华民族”为“我国各民族的总称”是不确切的。中华民族不仅仅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总称，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分割的伟大的实体。实际上，这个伟大实体是以中华文化为纽带的包括汉族、中华大地上的少数民族、海外侨胞在内的民族共同体。在这个民族共同体内，人们有共同的语言——汉语；有共同的文字——汉字；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最初是农耕与游牧的互补，后来是农业经济，现在则万众一心奔向现代化；有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这就是创建中华民族学的客观依据。另外，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问题，需要有从总体的角度，对中华民族的总体性、总

体活动、内部一致性进行研究，这就是创建中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依据。近几年来，在“文化热”中，涌现了以中华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热潮。出现了不少从总体角度研究中华民族，以中华民族在某个方面、领域的总体活动为对象，揭示、展现中华民族在某个方面、领域的总体性、一致性、共性的成果。如济南出版社出版的梁自洁主编的《中国精神》，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许苏民著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晓江著的《中华民族精神之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本人著的《华魂》三卷，广东方面出版的四本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论文集，以及专著《中华民族凝聚力论纲》……这些成果的出现，客观上为中华民族学的建立积累了素材、资料，奠定了基础，表明中华民族学的创建具有研究趋势的依据。

记：那么，创建中华民族学这门新学科有什么必要呢？

肖：必要性可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为振兴中华，回答21世纪的挑战，有必要

创建中华民族学。通过总结它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宣传它的特征、特点,找到它的生存、发展规律,就能够更好地振奋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的统一事业,使中华民族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更好地回答各种挑战,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为更好地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有必要建立从总体上研究、总结中华文化的中华民族学。江泽民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新春讲话中指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总结、继承和发扬。但是,从总体上进行研究、总结,把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的特征、特性来研究、总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建立中华民族学,把中华文化作为它的一个重要部分来研究,就能够更好地从总体上,提纲挈领地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第三,为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有必要创建中华民族学。环顾当今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潮泛滥,民族矛盾、民族纷争、民族冲突成为最突出的世纪末现象。我国具有地大、人多、民族多的特点,如果不注意抵御这类世纪末现象的有害影响,如果不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生民族冲突等异常事件,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给现代化事业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建立中华民族学,把属于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作为一个总体、一个整体、一个实体来研究,深入揭示这五十六个民族之间的联系点、一致点、共同点,以及这些联系点、一致点、共同点的历史渊源,从深层次上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实体,就有其必要性。第四,为加强祖国人民与海外侨胞的团结,也有必要创建以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中华民族儿女为研究对象的中华民族学。当今世界上有三四千万侨胞。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儿女、炎黄子孙中的成员。这些中华民族儿女、炎黄子孙离开故土,飘泊海外,艰苦创业,不仅对居留国的经济文化

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关心中华故土的建设事业,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华的振兴出力。把海外侨胞状况作为一个内容来研究,既可以总结海外侨胞的斗争经验,肯定他们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又可以说明海外侨胞的根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华文化里,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实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既可以促进海外侨胞在居留国的各种有积极意义的工作,又可以促进他们与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他们与祖国人民之间的团结。

记:那么,您是否可以概括地描述一下中华民族学的构架呢?

肖:我们既要研究中华民族的物质构造、物质形态,亦即所谓的“肉体”部分;也要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状况及其表现形态,亦即所谓的“灵魂”部分;还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情况。这三者实际上构成了中华民族学研究的主体内容,成为中华民族学的主体构架。

记:您能否把中华民族学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介绍一下?

肖:中华民族学要研究的第一方面内容是对中华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以及它的作用意义,作出科学的界定。通过这个方面的研究,我们将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学是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总体、整体、实体来研究的综合性的新兴学科,也是一门介乎于哲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之间的边缘科学。中华民族学要研究的第二方面内容是中华民族的物质形态。其中主要研究三个问题。第一是中华民族的结构。通过研究,我们将向人们展示,微观方面的中华全息与宏观方面的中华民族族体相结合,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结构。第二是中华民族的特殊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我们将向人们说明,华侨、华裔是中华民族的特殊组成部分,他们为所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人类进步事业所作出过的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事业、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是中华民族的特性。通过研究,我们将向人们揭示,“乐生”是中华民族

本质特性，正是这种注重现世生活，热爱生活，追求更好的生存发展的乐生性，把中华民族与世界上的其他许多民族区别开来。以农为本性、一元性、多样统一性则是与乐生性有关联的中华民族的经济特性、政治特性、文化特性。中华民族学要研究的第三方面内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状况。其中主要研究的也是三个问题。第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第二、第三则分别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形态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大一统。关于这三个问题，我在《华魂》三卷中作过研究。在中华民族学中，这种研究将会有所深入。中华民族学要研究的第四方面内容是中华民族的发展情况。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发展规律。通过研究，我们将向人们揭示中华民族发展的基本规律。其次是中华民族的形成。通过研究，我们将向人们说明，中华民族的

形成是个长达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因而，中华民族是不可能被分割、离散的。最后是中华民族的未来。通过研究，我们将向人们说明，中华民族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人类一体”的中间形式、中介环节，因而有着光辉灿烂的前景。中华民族学要研究的第五方面内容是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

记：创建中华民族学的工作是不是开始进行了？

肖：已经开始进行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已经开始按照我写的《〈中华民族学〉写作大纲》，进行工作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都拥有。《中华民族学》的诞生，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责任编辑：冯 生

建构·阐释·召唤

——评刘海涛的新著《规律与技法》

□周荷初

文学创作都有规律可循。青年学者刘海涛的《规律与技法》(新加坡作协出版)一书,即是探索微型小说的写作规律与技法模式的专著,这是新加坡作协第一次破例为一个外国学者出版的著作。微型小说这一体裁,顺应时代快节奏下人们追求“速效刺激”的审美需求,由崛起而兴盛,已经成为小说家族中一种独立的文体。有感于微型小说的创作理论还相当薄弱,长期滞留在一般经验描述的文章学层面,未能系统有序地展开理论探讨,海涛君从1988年起,便不断排除外界的困扰,而投身于这一难度较大的理论构建工程,至今已出版专著四本,发表论文60多篇,其研究实绩,如江曾培先生在他另一专著《现代人的小说世界》的序言中所云:“已初步构成了一个‘微型小说学’的雏形。”他所作的探索是极富创建性的、也是颇有学术价值的。

任何理论的成熟,必然包括方法论的成熟。由于作者摒弃了以往那种单向度、分解式的研究方法,而把微型小说创作看作一个由作者、作品、接受群体相组合的完整过程来展开理论探讨,促成了该著体系构架具有鲜明性、开放性与整体融合性的特点。首先,作者以微型小说作为“简化艺术”这一本质特征作为体系的支撑点,概括出三条规律。具体说来,即从作家运思的角度,总结出“单一律”。基本含义是:微型小说不是一般的简单一,而是创造一种机智化的、带特征的、有意味的“简化”。所谓“参与律”,是以格式塔心理学为心理基础,将读者的阅

读过程纳入小说的结构范围,通过制造空白点、不定点、多义点,诱导读者参与再创造的积极性。至于“变化律”,则着眼于作品本身的构建过程,根据“偶必概率”的突变原理,在短小的篇幅中,迅速完成一次完整的艺术变化过程。进而,作者又根据这三大规律对微型小说技巧的生成、发展及变化的制约作用,分别从人物塑造、情节处理与环境创造三个方面提炼出不同的技巧模式。如“情节的延变”、“情节的错动”、“情节的省略”、“情节的扩张”等。每一模式又可分解为若干不同的类型。如受“变化律”所制约的“情节的延变”模式,就可分解为“反转”、“曲转”、“骤升”等由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交织的突变性情节。如此一来,便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系列链环,它既体现出作者、读者、作品三位一体的创作过程,又回应了传统的关于小说“三要素”的概念,既揭示出微型小说独特的生命机制,又没有把微型小说和小说家族共有的规律割裂开来。在全书论述的整体流程中,各个元素既相对独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补互济,以此规范着微型小说的文体特征及风格流派。

在理论研究中,预先界定地盘的演绎程序,只会堵塞学术的生机,可喜的是,该著所总结的规律与模式,绝非简单的拼凑,而是作者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与艺术探求中提炼出来的,也是作者在吸收与借鉴它人成果、并解读大量作品、资料的基础上,获得的感受和认识。仅从该著第一章“现状扫

描”与“前景预测”二节中，便不难感触到作者对国内微型小说的创作情状是何等谙熟了。正因如此，该著在论证、阐释的过程中，不仅对“三律”及其系列模式，都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明，而且论述严密而简洁，绝少浮词泛语，绝少过度的情绪化发挥，往往一题在手，便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对象的实质。如该著阐释“变化律”时就指出：所谓“小说味”的体现，并不在于篇幅的长短，而在于本身的艺术结构是否具备小说的要素，微型小说的内容因素可以出现不完整状态，但它的情节的形式因素却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变化过程，篇幅越是短小，艺术变化的质与量越大，那么它的小说味就越浓郁。有些微型小说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选择了一个没有艺术变化的好人好事作为小说的描写对象，这样便先天缺少一种小说味。由此，莱辛关于“富于包孕的顷刻”的原理，迄今仍被微型小说研究者们视为金科玉律。刘海涛在引用这一艺术见解时，充分肯定这一原理并未失去时效，同时又指出，微型小说创作中采用“富于包孕的顷刻”时，并不受莱辛所说的“必须是高潮顶点那个‘顷刻’”的限止，选择高潮前、高潮后、抑或远离高潮的片断都无关紧要，关键只在于选取具有丰富的内涵的艺术空间。以上这类凝聚着高度概括力、辨析力的论述，在该著中恐怕不在少数。其中博观约取，指点迷津，的确不乏独到的闪光。它对微型小说创作的实际指导作用不可低估。

当然，不管标举何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法模式，都不能忽视理论与对象之间相一致的感性形式，不能规避对艺术形象本身的直接审美体验和富于感悟的把握。海涛君在大学时代即是校园文学社团的活跃分子。毕业后长期从事文艺理论与写作教学，磨砺了良好的文化理论素质与敏锐、精微的艺术感悟

力。这一潜能与优势，体现于《规律与技法》一书中，便促成了该著溶思理于鉴赏的特色。该著整个的论述阐释过程都融汇着对具体例作的细腻剖折与深切的体味，通过感悟鉴赏这一台阶然后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故往往能以贴近艺术本质的尺度，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进行抽象与概括。譬如阐释“多重反转”这一命题时，作者从赏析白小易的《意外》、《正常》等作品入手，指出一般微型小说的写作只设置一重“反转”，而白小易却别出心裁地设置二重以上的“反转”，在短暂的艺术时空里，让读者吃了一惊后，接着再吃一惊，其结局大大超出读者的预测，藉此构成情节的奇特性、趣味性。此外，说明“参与律”时，对于刘国芳《黑蝴蝶》的剖析，揭示微型小说讲究结构层次多义性的特点；论述“情节扩张”模式时，对贾平凹《老人与鸟》的表层故事与深层意蕴的赏析，都能洞幽发微、言简意赅地道破艺术的“机心”。

为寻求多面、多向的“参照系”以激活理论细胞，该著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哲学与艺术理论的某些合理成份，如系统论、接受美学、文艺符号学、格式塔心理学等，甚至连法国数学家雷内·汤姆创立的“突变原理”，也借来作为理论依据，且都能化为小说理论的活的血脉，使批评文体丰赡多姿。该著结尾部分是中西微型小说比较论，作者从“史传实录与传奇虚幻”、“以形写神与以神写形”、“错位描写与倒反构思”等方面进行类比鉴别，探源流、理变通，论述虽然精要，却充满了史的意识，使读者能从较高的文化层面把握微型小说的写作规律与审美特征。

作者单位：长沙职业技术师专文史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4/95

ISSN 1000-7326



ISSN1000-7326
CN44-1070

逢双月 25 日出版

定价：3 元/册